



砂给日方的合同无条件地取消。这是我们钢铁业建设的前提，也可以说是我们重工业建设的前提。

照目前的水准算，中国每年需要的钢铁大概为六十万吨，这实在是个太小的数目。当我们一般的建设能够猛进的时候，钢铁的需要量最少要增加十倍。在最近期内我们还免不了要从国外大批输入钢铁，（目前每年输入额在七千万元至九千万元之间），而且要奖励输入。

三、铋钨等矿的生产

铋矿和钨矿都是军需工业的重要原料。铋矿是制造军器如开花弹等所必需的材料，而钨矿却是炼钢所不可少的东西。中国的铋矿藏量占全世界的首位，产量占全世界百分之六十至八十。钨矿产量约占全世界产量百分之三十至四十，然而可怜得很，因为中国本身没有大规模的炼钢业，更谈不到军火工业，所以我们所开采的铋矿和钨矿完全供给了各个帝国主义。比方在一九三五年中国输出的铋矿达七百五十万元以上，输出的钨矿也在七百万元左右，这些矿的生产以后应当逐渐扩充，完全由国家经营，取消以前所订的包销某国或由外商包销的合同。

四、机器工业

制造机器的工业部门又是重工业中主要的部门，同时也是整个工业部门中的重心。中国可以说还没有机器工业；以后我们应当由政府在内地安全地带如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筹设大规模的机器厂，制造工业机器和农业机器。

五、电力生产

目前中国的电力生产还可以说没有运用到生产部门去，同时目前的生产可以说在美国资本的独占底下。以后，此项生产应当跟美国在平等基础上重新订立合同，由政府利用外资办理。此外我们仍须建立规模较大的水电厂多所。



六、军需生产

此项生产当然是国防经济建设的中心，然而可怜得很，这种近代生产的奇迹在中国还只能算是一张白纸，要说建设，就要从根本做起，谁都知道，这种生产需要最高的技术，同时又需要其他工业，特别是重工业的高度的准备。所以，说到军需工业的建立，先得把上述各部门工业生产做到相当的阶段，要不然，只是一句空话。自然，我们并不是说现在就根本谈不到军需品和军火的制造，中国今天也并不是没有兵工厂。我们在目前的条件下，还得尽量利用外国的技术，制造一部份军火，同时以平汉路以西的地带作为总根据地，建设新兵工厂。原有在汉阳成都石井等地的兵工厂都须扩充，德州的兵工厂还需要斟酌地位是不是适当。是的，地点的问题多半还要看我们整个的政策来决定，比方沈阳的兵工厂规模是相当大的，然而因为政策的关系，就轻轻落在敌人的手里了。所以我们讲，军需工业在国防上是最必要的事情，同时也是最危险的事情，保证这种必要，而完全避免那种危险，那完全要靠我们的政策来决定。

B轻工业

一、棉纺织业

中国现有的轻工业中，或者说在我们的民族工业中，稍稍像个模样的便是棉纺织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曾经做了我们民族棉纺织业的摇篮；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的话，那末它将变成我们棉纺织业的掘墓人。现在中国棉纺织业的领导权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也不在英国手里，而在我们的敌人手里。

中国今天不谈棉纺织业的建设则已，要谈这方面的建设，则下面几点是一切的前提：



第一，我们必须立刻停止或限止日本在华纺织厂的生产，严格禁止日厂收买华厂，和华商纱厂向日厂抵押的情形；

第二，我们必须立即提高棉纱棉布的进口税率，绝对禁止走私；收回东北和华北的棉纺织品的市场；

第三，我们必须立刻收回华北的棉产根据地，要使“农业的中国”自身变成“工业的中国”，而不要沦为“工业日本”的奴隶。

此外，我们因为资本和技术的关系，要和英国合作发展棉纺织业。国内已有的工厂应当设法集中和合并，避免内部无谓的竞争。同时在棉花的区域应当发展中小规模的纺织厂。

二、缫丝业

这也是民族工业中很重要的一个部门，在缫丝业的恢复和建设过程中应当设法促成各个私人企业的合作和集中，成立大规模的永久性的企业组织，减少企业的投机性质和季节性质。

三、面粉业

面粉业对于战时前方和后方的粮食问题有极大的关系。现在面粉业每年的产量差不多有一万万袋，将来必须大大扩充。要扩充面粉业第一要恢复原有的东北市场——它原来是华粉最大的市场；第二要由中国自己的资本来独占华北的小麦；——目前这个广大无垠的小麦根据地又快要给日方偷偷“提携”去了。面粉业的发展一部份必须用国营的方式，因为面粉的生产，运销和分配，在战时是非常重要的问题，这个问题必须由国家来处理。

四、其他像原有的造纸业，茶业，桐油业和火柴业等都须由国家出资积极整理扩充。同时将来还得建立新的工业部门，像人造丝生产等。

农业政策



农业建设的目的并不在“以农立国”，在今天提倡“以农立国”恰巧就能完成“农业中国”“工业日本”，完成中国沦为日本殖民地的全部工作。那末我们今天的农业建设的基本任务是什么呢？

第一，我们要扩大粮食的生产，使我们在前方和后方的粮食供给不感觉缺乏。最近绥远的抗战告诉我们，有些英勇的将士们在战壕里面甚至一两天吃不到东西，而他们的英勇未尝稍衰。是的，我们有充分的把握保证我们在前线的抗战兄弟决不会因为粮食稍感缺乏，而减少他们的抗战决心和勇气；然而同时我们却必须指明：抗战的彻底胜利，也决不是饿空了肚子的同胞所能完成的。所以，我们必须利用高度的技术与组织，运用国家的权力，扩大粮食的生产能力。

第二，我们要提供工业建设所必需的原料。我们还是就战时的需要来讲吧，在抗战的时候我们的棉纺织业和毛织业必须大大地扩充。谁都知道，在我们未来大规模的抗战中，主要的战场大概位于比较低温的地带，这里在一年三季中需要厚暖的棉衣和毛衣。百灵庙头的战士要求我们供给他们暖和的棉袄，皮袄和手套，这就是要求我们要发展棉织业，和毛织业，也就是要求我们在农业方面供给更多的原料。

第三，我们要保证中国三万万以上的农民能够热烈地参加抗战，援助抗战。要得到这种保证，我们就得在农业上有种种的设施，这些设施可能减少农民所受的种种束缚和负担。

我们要完成上述的任务，必须要做下列几项工作。

一、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国家发行公债，按照一定的计划和步骤，收买全国大地主和中地主的土地，然后由国家照合理的比例，分配给农民耕种。农民在最初几年里面按照农田收获的百分之四十向国家交租。国家就以此项田租作



为偿付公债的基金。以后农民所缴的租额逐年递减到百分之十。（农民前此向地主所缴的小租，田鸡租和各种劳役必须一律免除。）公债的息金就由国家从田租金额内摊付。在此时期地主如有阻碍抗敌御侮工作的便没收他们的土地；农民如有同样的情形，就不得领地耕种。同时农民参加抗敌战争及在后方担任防御军事工作的，得领份地雇人耕种，或者租给人家耕种，自收田租。

二、改进农业生产 由国家设立大规模的农业改良机关，进行农业技术的改良工作；政府在农民选种，播种和施肥各方面必须尽量加以援助。对于现有的农事改良机关和学校要重加调整，对于国外和国内的农业技术专家必须予以充分的和适宜的工作。在一部份区域内可以做集体农庄的试验，提高生产效率，同时增进农民在生产上的合作精神，加强经济过渡到更高阶段的准备。所种作物，全国须有整个的计划，关于粮食和原料作物必须有适当的分配。

三、改进水利事业 用大量的资金完成黄河长江筑堤的工程，和疏浚滹沱河，淮河，西江和其他成灾河流的工作。各省河渠和其他灌溉系统必须切实整顿，同时推进造林事业，增进水利。

四、调节农村金融 用大量资金扩充农民银行。这个农民银行必须成为真正调剂农村金融的中心，各省各县甚至各区设立分行支行或代办所。全国农村都要组织合作社，目前合作社十之八九都由豪绅官吏把住，大部份农民根本没有入社的资格，因此合作社者，只是少数地主富农和乡镇商人“合作”括剥削穷人的机关吧了。以后要设立的合作社必须是真正农民的组织。这种合作社和农民银行的联系必须非常密切，合作社对贫苦农民社员举办低利放款，利率不得超过年利六厘。



在这里我们必须指出一点，农民旧有的债务如果不能减少或豁免，那末大部份农民简直还得过奴隶的生活。因此我们在建设期内，必须豁免农民一部份的旧欠。

五、办理移民垦殖 国内人口较密各省如山东，江苏，浙江，安徽，广东和广西的农民和各省的灾民必须大批移往我们自己的东北和西北去。据可靠的估计，东北的松辽平原可移民二千万；西北各省的平原，面积共四万七千方里，还可容纳八百万至一千万人。

金融财政政策

我们的新金融政策要完成那些任务呢？

第一，我们要完成比较健全和稳固的金融组织，使我们在战时资金的流转和货币的流通，都不发生严重的问题。

第二，我们要有那样的金融结构，使民族工业和农业的资金都有充分的供给。

要完成上面两种任务我们必须：

（一）和英美法等国在平等的基础上建立更密切的联系。英美法三国原来是世界三大金融集团的首脑，我们可以跟它们建立较密切的联系，以应付准战和战时金融财政上的急需。谁都知道，战争一旦发动，所需的经费非常浩大，中国如果向敌人作全国规模的抗战，正式动员的人数假定有一千万人，那末每月平均饷需和军火费用至少在一万五千万元以上。在这时候，我们对于资金的取给，必然有妥善的布置。此外，在战时法币的价格务必令其稳定，所以法币的准备必须设法令其充足，而透过外资的关系，使法币汇价相当稳定就非常需要。在这一点上，我们就更得和英美法诸国取得更好的联络。

（二）金融中心的布置 我们对于上海和其他沿海和华北的金融中心必须妥加保护；并且设法使它们逐渐移向内地。同



时通货的现金准备也必须分散后方，“免以资敌”。

（三）金融机构的改造 中央银行必须从速改成真正的中央准备银行，使其他银行把它们的现金准备，按照存款的法定准备定比率，存放在中央银行。中央银行应当完成其“银行之银行”的任务，它和其它银行之间的关系应当更行密切。实施贴现政策，调剂资金的市场，避免准战和战时的金融恐慌；同时实行公开市场政策，调节通货的供求。

此外，其他特殊银行也应当使它们发展它们的特性，完成它们特有的任务。比如目前的中国银行，原定是国外汇兑银行，我们要令其扩充，向外发展，而对于华侨经济的发展，必须特别注意。交通银行应由国家扩充资金，在国内各城市遍设分行，他营业的中心任务就在扶植民族工业，使各部门工业的资金都能顺畅地流转，以完成其全国实业银行的使命。至于其他商营银行，应当集中合并，避免无谓的竞争，同时避免一部份不一定发生的恐慌现象。

（四）统制法币的发行 法币的发行必须按照一定的计划，这种计划是根据于商品和资金的流通额而确立起来的具体计划。应当用国家的力量排除法币流通的一切障碍，同时绝对避免随意增发纸币的现象。在战时，通货膨胀是不大可能避免的事情，然而膨胀必须是有计划的膨胀，而不是无计划的滥发。当然，在通货膨胀的过程中间，我们对于人民大众的生活，必须从他们的收入和物价上设法，补偿其因通货膨胀而受的损失。

我们再谈到财政问题。我们的财政政策要完成那些任务呢？

第一，我们必须调度充分的资金以作国家总动员时必要的经费；



第二，在调度的时候，务使全国国民没有不平等的负担；相反的，这种政策还要积极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建设。

我们要实现上述的任务，至少必须做到下列几点：

一、整理外债 据外人的估计，中国外债总额约五万八千六百万美元，其中日本占百分之三八，英国占百分之三六·一，法国占百分之一六·六，美国占百分之七·一，德国占百分之二。我们在整理这一大批外债的时候，第一对于敌人对我的一切借款必须完全取消。从一九〇四年中日第一次借款成立以后，日本对华借款当在一百种以上，其中没有清偿的，还有七八十种。这七八十种都是侵略者缚我们的锁链，我们当然无条件地废弃它们。

至于其他各国的借款也必须根据平等精神郑重清理。在整理外欠之外，却又不妨以平等条件成立新债。

二、筹募内债 首先我们对于旧时公债必须清理，然后动员全国有钱人的资金，以公债形式，交给国家从事国防和建设。

三、增加税收 我国原有税收中间，关税一项占到总额百分之五十五，而进口税又占大宗。我们必须运用强有力的国家力量建立起一个坚固的关税壁垒，而这样的关税壁垒将是我们建设国家资本主义有力的武器。的确，中国关税的进口税率如果和别国相比，简直低到太不成话。所以我们必须一面根据我们的外交政策，而另一方面根据我们国防和经济建设的需要，把原有的税则完全重新改订。我们对于一切妨碍我们建设或是不必要的商品要用最高的税率徵收进口税，同时对于国产商品如果识为在这期间不能输出（如粮食，食盐和国防资源）的也课以最重的出口税，这样税收自然增加了，而我们国防和经济建设的工作也能更顺利地推进。这是加税的一端；其他像所得



税，遗产税，财产税等当然应当徵收。另一方面对间接税减到最低限度，因为这种税收在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上固然是得不偿失，徒然苦了一般老百姓。

贸易政策

贸易政策的任务第一是调度战时所必需的物资，确保战时各种物资的接济；第二是促成民族产业的发展。要完成这两个任务，在对外贸易和对内贸易方面应当采取下列的步骤：

一、对外贸易方面：

（一）对外贸易一律改为国营，特设国际贸易的专管机关，禁止人民对外自由贸易。

（二）关税完全自主，绝对禁止走私。

（三）禁止或限制输出下列商品：和军事有关的及为民族工业所必需的原料和半制品如矿产，棉花，纤维，粮食，棉纱等。

（四）禁止或限制输入下列商品，我们自己能够生产的和那些不必要的商品如糖，棉织品，人造丝，玩具等。

（五）奖励输出无关军事和那些我们过剩的商品；这一方面的商品在目前讲还是很少。

（六）奖励输入下列商品：我们所不能生产或是虽有生产而产量不够的商品，如军火，军需原料，机械和一部份粮食等。

二、对内贸易

（一）国内贸易政策主要要完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完成民族经济发展的最有利的条件。各项商品应当由政府统盘筹划，规定统一的办法和大致上统一的价格，妥为分配运销市场，排除一切省与省间贸易的障碍，废除一切变相厘金如过境税之类的苛捐杂税。



(二)发展合作社的组织,使全国小生产者的生产和消费,能够多半经过合作的组织,以节省成本,增厚利益。

(三)国内贸易的流通资金应当由交通银行尽量支拨。对于一般正当商人的利益,应当妥为保护。

交通运输政策

在战时动员的过程中间,海陆空的交通和邮电的通讯都占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这里我们只能大约举出几点来加以讨论:

一、铁道的建设 战争要求运输机关的急激改进,尤其是对于铁道。在第一次大战时,法国铁道所运输的货物除前线所在的地带以外,也激增了四〇%。这说明战争对于铁道是何等的需要。当然在我们战前的国民经济建设中,铁道的建设也是很重要的一环。我们对于中国铁道的建设有下列的意见:

(一)全国铁道必须集中在统一的国有系统之内。

(二)对于已经落在敌人手里的一切铁道系统必须无条件收回,对于敌人想在我领土以内赶修的铁道,必须用实力来阻止。

(三)对于其他借用外资建筑的铁道,必须停止下列的现象:

(1)外人参与路局管理权——这一点对于我们的国防大有妨碍;

(2)外人控制各路财政权——这一点破坏我们统一的财政制度;

(3)外人干涉运价政策——这一点能够阻难我们的经济建设。

(四)全国已成的铁路必须配置战时的准备,使随时能够供抗敌之用。

(五)必须在最短期内完成下列方面的铁道:(1)能够



增进国防前线的运输效率的；（2）联络国防前线和后方的；（3）准备沿海被封锁以后通达国外的出路的。

二、航运方面的建设 目前中国航运方面，日本资本所经营的倒占百分之二十七以上，这些航线必须立刻停止它的航行。同时我们必须筹设大规模的国营输船公司，扩充内河航行和海外航行。国家对于内河航行权必须重加改订，使民族航运事业得以顺畅发展。尤其是和国防有关的航线，必须全部由华方输船航行。

三、航空建设要注意军用航空的扩展。特别要注意的，东北和华北的领空权也必须全部收回。民用航空方面必须注意开辟航线的增加和飞行场的设置。

四、电信事业可以和英美法等国合作经营，不过我们必须保留最高的统制权和收回权。

改善国民生活

我们在上述各部门经济的建设政策中，尤其是在农业政策中已经说到一些关于改善人民生活的办法。谁都知道，改善国民生计是一切建设和一切奋斗的最后目标。我们在实行国防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国家应当用最大的力量，进行改善民生的工作。这里最重要的，国家对于工人应当重新制订更能保障劳工利益的劳工法和工厂法，规定工人的最高工作时间和最低工资，禁止雇用童工，规定男女工人有同样的报酬。工作时间如遇国防的需要，可以酌量延长，可是必须跟着增加工资。政府必须规定工人有自动组织工会，参加一切抗敌救亡运动的权利。

关于农民方面，除在农业政策一节所说以外，国家对于灾区的灾民必须有妥善的救济办法。规定农民有自行组织要求改善生活，和参加救亡工作的权利。



其他关于一般店员，苦力，知识份子，和一般自由职业者，政府都要确定计划，帮助他们去改进生活；对于旅居各国的华侨应当由国家的力量尽量保障他们的生活。

建设的资金何在

我们要进行上列各部门经济的建设，不消说得需要巨额的资金。那末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呢？

有人说，建设的资金应当“书求诸己”，这句话大部分是对的。尤其是有关国防的经济建设，我们非用自己的资金不可；要不然，我们防盗又防贼，真是防不胜防。那末用我们自己的钱来做我们自己的建设工作是不是可能呢？我们说，这一部份是可能的。不错，我们中国资金的垒积非常贫弱，然而如果全国富豪都能把他们休闲着的资金，投放在各项建设里面，那事情确乎“尚有可为”。近据里文斯氏（Leavens）的估计，中国白银的贮藏共有二十五万万盎斯，其中货币白银为十七万万盎斯，非货币白银为八万万盎斯。不过据我们自己的估计，中国目前所存的白银因为近年来流出国外的很多，至多还有十八万万盎斯。此外，全国人民在国内和国外银行的存款大约估计有四十万万元。（据各方调查，上海一埠存款已达二十一万万元，汇丰一家存款不下十二万万元，其中大部份是中国人的存款）。这样，中国人民可能投资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方面的假定有五十万万元。这笔数目虽然不能算顶大，然而也尽够一个时期和某些部份的建设用途。这些资金国家必须用种种方式，像募公债，招股款等，尽量吸收，从事建设。

显然的，这些资金要用来完成全部的建设，还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还要利用外资。

关于利用外资的来源问题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顶可笑而顶可怜的，竟有些人还在那里提倡中日借款，来做我们的建设



工作。这不要说日本本身已经穷个不了，它自身的国债已经在二百二十亿元以上，决没有什么余力来投资到我们这边来；即使它还要硬扮阔绰，向我们投一分资本，取十分利润，那我们还有这样的本领来受它的好意吗？所以如果今天还有人主张从日本怀里掏钱来开发我们的经济，那不是“寡廉鲜耻”的汉奸或准汉奸是什么。

还有一部份主张从德国借款和利用德国的技术来进行我们的经济建设。作这种主张的人们认为德国的技术高明，有时还价廉物美；至于借款的条件还能特别客己。这些都是事实。然而如果我们能够知道：德国已经公开宣言它是我们敌人的同盟者，它已经在军事和经济上给我们的敌人以种种帮助的时候，那我们还能相信德国高明的技术，价廉物美的商品，以及条件特别客己的借款，真的能够对我们有利吗？能够相信这点的人，也就是相信中日经济提携是真能够帮助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人。然而我们相信，中国人能够这样相信的人还很少。更何况德国跟日本一样是个穷光蛋，它的国债在三百万万马克以上，它也和日本一样只能假扮假扮阔绰而已呢？

所以关于利用外资的来源，我们应当绝对确立这样的原则：我们决不借用我们敌人的资本，我们也决不借用我们敌人的帮手的资本。因为这种资本是吃人的资本。

然而我们却能借用英美法国的资本。这不仅是因为英美法等有借债给我们的可能，而且因为这些国家借债不一定立刻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所以只要我们能够下列条件之下，即：

- 一、绝不损害国家的主权和利益；
- 二、国家和地方的税收不作为利用外资的担保；
- 三、一切事业的经营管理权不作为利用外资的保证；



四、一切国家的富源和利权（特定的租让concession除外）不作为利用外资的交换条件；

五、中国能聘用外国人材和采用外国原料，然而这不作为利用外资的交换条件；

这样借用那些国家的资本，那末利用外资的确可能增加我们民族的生产力，加强我们抵抗敌人的力量。当然，我们在利用外资的时候，一定要付以极大的代价，然而我们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呢？

假如有人回答说，他有这样更好的办法：

“你说英美法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吗？它们不想侵略我们中国吗？”

“那末日德不只是也和英美法一样的帝国主义国家吗？”

“你说我们可以借用英美法的资本来建设中国的经济，难道我们就不能借用日德的资本来开发中国的经济吗？”

如果有人这样说，那末必然有人会告诉他：

“聪明而孤寂的绅士呀，你难道已经放心到这般田地，以为人类已经丧失了一种本能——一种‘笑’的本能吗？”

（1937年2月13日）



中国国民经济的总动员

我们在本刊第二期说过，假使我们的确能够向我们顶主要的敌人抗战，那末最后胜利的把握一定是在我们手里。我们在那里曾经指出某帝国主义在技术经济上的缺陷，特别是社会内部的缺陷，会最后粉碎他们一口气吞灭中国的野心。

但是我们绝对不是乐观的定命论者，我们决不会抄袭那些“中国民族无论如何不会灭亡”的呆子理论，来安慰自己，来欺骗别人。某帝国主义决计不是元代的蒙古游牧民族，它也决计不是十足封建的满洲民族，它之侵略中国在意义上跟蒙人满人“入主中原”根本不同。某帝国主义虽然跟我们“同文同种，”“谊同袍泽，”然而为要满足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欲望，为要延续和扩大他们军阀资本家的统治起见，他们是会“大义灭亲”的。所以，尽管中国具备战时的各种有利条件，然而倘若我们富裕的资源尽是躺着不动，或是被人家“鲸吞蚕食，”我们广大的人力，尽是听便人家用毒物斩丧，用枪炮来轰炸；我们比某帝国主义好过百倍的社会基础；只是长此自己戕害下去，那末中国终有灭亡的一天。

要求我们的生路，而且要使我们中华民族“永生”下去。我们从此刻起，便要在这方面动员起来，对我们的主敌作殊死



的抗战。我们立刻要动员全中国的物力、人力、财力、在一个集中的目标之下，有计划地有组织地进行决定我们命运的工作。

全部国力的动员应当包括陆海空军的军事动员，全国文武机关人员的动员，整个国民经济的动员等等。在这样一篇短文章里，我们当然不能说到全部国力动员的计划，这里我们所要说的，只是国民经济动员的计划，而且只想在原则上指出几点比较重要的地方吧了。

谁都知道，一个现代战争，决不是单单前线士兵的战争，而是整个前方和后方的“拚命”。战争的技术愈是“新法”，战争的规模愈是广大，战争的时期愈是长久，那末决定战争胜败的重心，越是从前方移到后方，越是从前线士兵的厮杀移到整个国民经济的“交锋”。我们从“一二八”的经验来看，从阿比西尼亚的长期抵抗来看，我们一定能够推想到，倘若全国上下决心抗战，那末未来的战争，一定是大规模的长时期的战争。因此，全国人力和各部门经济的健全的动员，在未来的战争中间，的确是有决定的重要性的。

讲到全国经济动员的计划，我们要提出一个最高的原则，那就是说，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动员，应当以保证全国人民踊跃地有效地从事抗战，保证抗战在战略上最高的优越性，为其唯一的任务下面我们略说各经济部门——工业、农业、金融、交通、运输、贸易、劳动力等——的动员，指出几个原则。

在前线应用的东西，大概可以分做下列三类：第一类当然是各种战斗用具、如军器、弹药以及一切作战用具。第二类是轻工业的产品和农产品，包括人和牲畜的生活用品和粮食等等。第三类是补助的物品，如各项辎重，卫生用具，燃料，机



械油类，交通通信材料等等。

整个工业部门在作战的时候，应当按照战争的需要全部改造过。中国现有的工业，在供给上述第一类用具上，将表显出最大的弱点，因为中国军需工业可以说还没有存在。关于这一点，我们除掉动员全部现存兵工厂，制造军火以外，我们特别要维持并建立较好的外交关系，使得国外军火的供给，有确切的保障。

中国的工业在作战期内所能供给的物资，以轻工业的产品居多；至于各项最重要的补助用具，如燃料（煤、煤油等）和各项战略金属（如铋、钨、等）的生产，正要用最大的力量来发展。这里我们一定要确定一个原则，那就是说，因为我们主要的敌人在中国工业部门所占的力量实在太大了，所以当战争开始，我们就得把敌人的企业无条件地收归自己国营。比方棉纺织厂在战时所起的作用，是非常大的，可是中国的纺织业却受日本资本的压迫，日本在华的纱厂把中国自己的工厂压得透不过气来。这里，倘若一旦战事爆发，我们为要巩固我们的经济阵线，同时为要削弱敌人的供应能力，我们能不把敌人的企业收归自办吗？在那时候，一切关于经济的不平等条约和协定，当然要全部撕毁的。比方，日本因为自己煤矿不够，在一九一三年跟汉冶萍公司订结协定，规定该公司必须供给日本铁砂三千五百万吨。那样的协定只有愿做亡国奴的人们才愿意负担遵守的义务呢！

其次，重工业方面应当集中于跟军事直接有关系的各项生产，我们要用最大的力量开发我们丰富的煤矿、铁矿、油矿和钨铋矿等。在轻工业方面，要尽量改变装置，适合于战时日用品的制造。

现在来讲农业。农业生产在战时前方和后方都非常重要。



首先，我们应当赶快提高粮食的产量，我们应当设法在最短期内，弥补我国百分之五的粮食不足量。这里我们自然不是说，农民拚命增加生产，给地主多收点租籽；我们应当规定，在作战期内，全国农民所生产的粮食，除开留下一部份，供给农民自身之外，应当由各地方设置战时粮食委员会，集中储藏，输送到前方去，一部份运到城市里，供给备战的和工作的大众消费。

除开粮食以外，我们要增加棉花和桐油等等的生产。这一着，可和目前日本替我们来“提携，”劝诱华北民众增植棉花，丝毫没有相同之点。恰恰相反，我们主张，中国棉花应当绝对要由中国人用，中国桐油绝对要由中国人用。这一点，我们不是要向各国的自足自给政策（autarky）学样，我们为的是要保证战略物资不被人家——尤其是主要敌人夺去，也就是要保证我们胜利的前途。

第三、讲到金融。这一点我在本刊二期已经指出，中国全国十八万万盎斯的存银，在抗战的前提之下，是有全部集中起来的必要；而且也只有在那样的前提之下，才有集中的可能。白银和黄金的国有，应当是战时经济政策的中心任务，到那时我们一面要用现金现银，买进外汇，作为稳定币价之用，同时可以向国外购办大批军火，从事抗战。那时候的财政一定发生膨胀的现象，然而事情毫不可怕，到那时候，我们为要维持市面的平稳，可以发行大宗纸币来救急的。

此外在财政方面，我们当然不能忽视各种健全的来源。我们一定要没收敌人和汉奸的资产，徵收所得税和遗产税，以及徵收从军代金（不参加作战便要出一定量的钱，充作战费）等等，增加当时的收入。

第四、军用交通的开拓，在战时是非常重要的。战争胜利



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军队能很快的动员和集中，这样才能进行迅速的袭击，取得最初的胜利；或是作出人意外的反攻，以转败为胜。这些都必须有便捷的军用交通。中国近年来铁道的建设大有进展，南京铁道部以及各省各商办铁路公司，共定有建筑二千五百公里新铁路的计划，一九三五年已完成五分之三。全国公路建设更加可观，到一九三五年十月末，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协筑的公路已在两万公里以上，已敷路面可通汽车的，约居半数。在这里我们应当提出两个原则，来统制全中国的军事运输。

（一）中国各项交通运输工具，无论铁道、内河及沿海航行，乃至航空路线，都受列强的控制和掣肘，在这一方面，我们在发动抗战之初，就应当将敌人对我们的控制，全部解除；对各中立国的控制，应当成立友好协定，这样才可以保证我们自主的军用运输。

（二）今后一切军用交通运输的建设，应当集中在对敌作战的战略地带，如华北，邻近华北以及沿海各省。目前一切不必要的建筑应当全部停止，将经费人力集中到为抗战必要的建筑上去。

第五、现在要讲贸易。这里我们特别重视对外贸易，一旦战争发动，对外进口出口贸易，如果毫无统制，结果一定“一塌糊涂。”为什么呢？比方，我们刚才说过，我们战时对于粮食和棉花是非常需要的，然而像目前苏北山东和河北等省的粮食，正由大批浪人收买到日本去，而我们中国老百姓反没有粮食吃，一定再要用高价向国外采办。中国的棉花许多都给日本用去了，中国自己的纱厂却因原料缺乏而关门停工。这样情况倘使继续下去，我们能够保证抗战时期不发生粮食和日用品的不缺乏吗？所以第一我们必须禁止或限制必要品的输出。



其次，我们在战前和战时，需要大批的军用品和一切技术用品，这些我们在抗敌的条件之下，必须规定免除或减低税率办法，替各中立友邦订结协定，奖励它们的进口。

最后，我们要说到劳动力的动员。这里我们一面要设法将全国的劳动力完全改编，使得一部份的劳动大众能够直接参加前方的抗战，而另一部份就得留在后方，一面受军事训练，一面积极从事上述各项生产和别种工作。

上面我们对于整个国民经济的战时动员计划，已经说了一个大概，详细的规划还得要靠大家的实践来完成。在本文的末了，我们还要重申过去的说话，我们在作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动员的时候，虽然有种种困难，可是最后的胜利还是操在我们手里。中国的民众和军队在抗战进行的时候，一定能够像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民众一样，不但表现出伟大的潜伏的力量，而且会完成伟大的创造，订正旧的战术，编制新式的抗战军队。这种优点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者所梦想不到的，然而这却是决定我们抗战胜利最主要的条件。

（《永生》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六年四月十一日）



国民经济建设方案

甲、任务、环境及期间

一、基本任务 目前中国国民经济建设之基本任务应为：

- (一) 在抗敌之前提下完成适应于国防需要的经济建设；
- (二) 巩固并扩充独立的民族经济，建立国家资本主义；
- (三) 改善人民的生活。

二、实施环境 本项计划在下述国际国内环境下实施之：

(一) 国际政治情势异常紧张，日德意等国积极扩张，其他国家亦积极备战。在本项计划实施期内世界大战有爆发可能。

(二) 国际资本主义经济将发生新的更严重的恐慌，日德等国或将首先爆发新恐慌；彼等对我经济侵略将空前加强。

(三) 我国国难日亟，日方对我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方面，肆力进攻。

(四) 我国国民，抗敌救国之心日切，统一政治机构之初步条件粗粗具备；全国对敌抗战可能爆发。

(五) 我国民族经济形将破产，人民生活不堪憔悴；同时国内资本积累极为贫弱。



三、政治前提 本项计划实施时必须具有下列政治的前提：

(一) 实行民主政治，存在有全国统一的团结各方实力的执行抗敌政策的中央政府；

(二) 内战须完全绝迹；

(三) 在整个计划下集中各方面人才，共同努力，推行建设工作；

(四) 中央能设置统制全国经济建设事宜的权力机关，取消一切骈枝机关，(关于执行机关详细办法须行另订。)

四、本项建设计划之实行遵照一九三一年国民大会通过之决议，期间定为六年，即自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

乙、各部门经济的建设

一、工业

(一) 用国营方式发展重工业

1. 煤炭生产

(1) 东北四省煤矿(储藏量占全国18%以上)及中日合办之煤矿(投资额数占全国煤矿投资23%以上)必须全部收回。

(2) 用国营方式发展煤矿生产 目前纯粹华资煤矿仅及48%，六年以内须投资三万万元；使纯粹华资经营之煤矿占投资总额80%以上，其余与英美法合资经营。

(3) 煤矿投资百分之八十须集中在晋陕两省。

2. 钢铁生产

(1) 辽宁及察哈尔铁矿(占全国藏量80%以上)须全部收回；目前全国铁生产中80%以上为日资支配，必须改为纯粹华资，一部份与英美合资经营。



(2) 钢铁生产完全国营，六年以内每年平均生产须达一百二十万吨之标准，逐年递增。(按照现有生产能力，如能将鞍山及本溪湖之铁矿收回，则生产量已能完成一百万吨。)新添投资四万万元，建设钢铁公司，整理原有铁厂，并将原有炼钢厂迁至内地铁矿区内。

3. 煤油生产

(1) 辽宁热河吉林黑龙江所藏煤油占全国藏量70%以上，必须收回。

(2) 国内油矿产量目前仅二三千桶；在东北未收回前，须由政府开采陕西，四川，广东湖南等省之油矿，其产值必须增加至三十万桶。在广东必须扩充由页岩油提炼石油之生产；在云南，山西陕西等省尽量用低温软溜法提炼飞机用汽油，此点对于国防异常重要。

4. 锑钨矿之生产

锑钨为重要军火原料，目前我国锑矿生产占全世界60%，钨矿以前亦占首位。此项生产须全部国营，在本项建设期内，锑矿生产须恢复过去占世界80%之水准，钨矿生产须增至四万吨，重占首位(现为缅甸所夺。)

5. 机器工业 在内地安全地带如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政府应筹设大规模机器工厂，制造轻工业机器，农业机器等。

6. 电气生产 初步与英美合作实行国营，投资四万万元，添设水电厂八所。

7. 军需工业 我国军需制造当以平汉路以西地带为总根据地(根据军事学专家蒋方震氏意见)汉阳成都石井等兵工厂均须整理扩充。军事化学制造事业须积极建立。

8. 其他化学工业，水泥工业均须国营，积极扩充。

(二) 用合作及集中方式发展轻工业



1. 棉纺织业生产

(1) 促成各企业之合作与集中化，在政府主持之下完成统一组织，避免内部竞争。

(2) 停止或限制日本在华工厂之工作，严格禁止日资收买华厂，及向日厂抵押之情形。

(3) 收回华北棉产根据地，不准日方收买。

(4) 与英国资本在平等基础上合作发展纺织业。

(5) 在棉产区域发展中小规模的纺织厂。

(6) 六年内棉纺织业投资须有五万万元（目下投资总额约五万万元。）

2. 缫丝业

(1) 促成各私人企业之合作与集中，成立大规模的永久的（绝非季节性的）企业组织，发展缫丝业。

(2) 以一万万元之资本改进栽桑，制种及缫丝工作。

3. 面粉业 由本国资本独占华北小麦，开办国营面粉厂。此项生产须大为扩充，准备战时粮食（欧战时我国面粉曾有输出，每年达二三百万担。）

4. 造纸业，茶，桐油及火柴业等均须由国家出资改进并扩充。

(三) 由政府改进工人生活 政府应重新厘订工厂法及劳工法，规定工人最高工作时间，及最低工资，男女工人，同工同酬，禁止雇用童工。工作时间如遇国防需要得酌量延长，唯须增加工资。政府规定工人有自动组织工会之权。

二、农业

(一) 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 政府在六年以内发行公债，按照一定计划与步骤，收买全国大中地主的土地，合理的分配于农民耕种。农民于最初三年内按照农田收获



40% 交租，政府即以此项田租为偿付公债基金，以后租额递减至百分之十，（其他小租及劳役一概免除）公债息金即由政府从田租金额内拟付。在此时期地主如有阻碍御侮工作者则没收其土地，农民如有同样情形，则不得领地耕种。又农民从事御侮军事工作者，得领份地雇人或佃人耕种。

（二）改进农业生产 由政府设立大规模农业改良机关，进行农业技术改良工作；政府在农民播种及施肥方面尽量予以援助。一部份区域内，可作集体农庄之试验，以提高生产效率。六年计划完成每年粮食须足够全国消费（现每年输入米麦杂粮约二千万公担。）

（三）调节农村金融 以十万万资金扩大农民银行组织，各省县设立分行支行，调剂农村金融。全国农村均须组织合作社，但务须避免豪绅把住。合作社对贫苦农民举办低利放款，利率不得超过年利六厘。

（四）办理移民垦殖 六年以内鲁苏浙皖粤桂等省农民须有五百万人以上移往西北及东北垦殖（东北抚辽平原可移民二千万人；西北各省平原，面积四万七千方里，尚可容纳八百万至一千万人。）

（五）改进水利事业 用五万万资金，初步完成黄河长江筑堤，疏浚漳沱淮河西江等工作。各省灌溉系统切实整顿，造林事业亦须积极推进。

三、金融

（一）在平等基础上与英美两国成立更密切之联系，以应付准战及战时金融财政之急需；尤宜注意于法币准备之巩固。

（二）布置后方金融中心 沿海及华北金融中心应妥加卫护，并须逐渐移向内地，通货准备，亦须分散后方，免以资敌。



(三)改造中央银行 中央银行应从速改为实际上的中央准备银行，使其他银行依存款之法定准备比率，存放其准备额于中央银行。中央银行与其他银行之关系应更为密切，实施贴现政策，调剂资金市场，避免准战及战时之恐慌。同时实行公开市场政策，调节通货的供求。

(四)发展特殊银行 扩充中国银行，令其向外发展，完成其国方汇兑银行之特性，对华侨经济之发展，须特加注意。交通银行应由政府扩充资金，在国内各城市遍设分行，其营业中心任务为资助民族工业，完成其全国实业银行之使命。中国农民银行应力加扩充，调剂农村金融，使农村高利贷逐渐绝迹。以上所述均为国家银行，其增加资本概以政府出资为原则。其他商业银行，应行合并集中，避免无谓竞争。

四、贸易

(一)对外贸易

1. 关税完全自主，绝对禁止走私。

2. 禁止或限制输出下列商名：与军事有关的及为民族工业所必需的原料及半制品如矿产，油类，棉花，纤维，粮食，棉纱等。

3. 禁止或限制输入下列商品：我国自能生产及非属必要的商品，如糖，棉织品，人造丝，玩具等。

4. 奖励输出下述商品：无关军需及为我所过剩的商品，其法用免税出口，或由政府银行予以出口补偿金。

5. 奖励输入下列商品：我国所不能生产或生产不足的商品，如军火，军需原料，机械，一部份粮食等。

(二)对内贸易

1. 各项商品由政府统盘筹划，规定统一办法及大致统一的价格，妥为分配运销市场；排除一切省际贸易之障碍，如变相



厘卡，过境税等。

2. 发展合作社之组织，使全国小生产者之生产及消费，多半经过合作组织，以节省成本，增厚利益。

3. 国内贸易之资金应由扩大后之交通银行尽量调拨。

五、交通运输

(一) 铁道建设

1. 全部铁道集中在统一的国有系统之内。

2. 已筑铁道须严加整顿改进，以增厚收入，作为增设国防铁道之基金。

3. 对于借用外资建筑之铁道，须停止下列现象：

(1) 外人参与路局管理权——此点对国家防务大有妨碍；

(2) 外人控制各路财政权——破坏统一的财政制度；

(3) 外人干涉运价政策——破坏我国国民经济。

4. 全国已成铁路配置战时设备，使随时能供抗敌之用。

5. 六年以内应筑成或兴筑下列各方面的铁路：

(1) 增进国防前线的运输效率者：如在北方须增筑津，浦与平汉联络线，及烟潍路，在长江以南须增筑由浙赣通闽北，由奥汉相南段通闽南及东江，以及广汕，金，温，江钦，邕钦各线，如此则长江以南海防得以巩固。

(2) 联络国防前线与后方者：如完成陇海路，实现川湘，宝蓉成渝诸线之建筑，在江淮间建筑联络平汉，津浦的浦信线，西安与武汉间的直接联络线等。

(3) 准备沿海被封锁后之国外出路者：展筑陇海路至新疆以通欧洲；由粤汉及川湘两路经黔滇以通新加坡以西之海洋，及建湘桂线以连越南铁道等。

(二) 航运



1. 国内航运方面，日本资本占27%以上，必须立即设法处置。

2. 筹设大规模的国营轮船公司（或将招商局加以整顿与扩充，）扩充内河及海外航行。政府须整饬内河航行权，使民族航运事业得以顺畅发展。六年以内民族资本须由今日仅占全部航船资本20%之情形，增至60%。

3. 积极扩充联运事业。

（三）航空建设特别注意军用航空之扩展；在民用航空方面注意自辟航线之增加，及飞行场之设置。民用机至少须增至三百架（现共有三十七架。）公路建设须扩充至一百万公里（现约二十三万公里。）

丙、建设之资金

综上所述，六年以内各部门经济筑设资金须有五十万万。唯我国资金蓄积非常贫弱。近据里文斯氏（Leaveas）估计，中国白银贮藏共有二十五万万盎斯，内货币白银为十七万万盎斯，非货币白银为八万万盎斯。据吾人所见，中国目前所有白银因近年输出颇多，至多尚有十八万万盎斯。此外，全国人民在国内及国外银行之存款大约估计为四十万万（据各方调查，上海一埠存款已达二十一万万，汇丰一家存款不下十二万万，其中大部份为国人存款。）如此则国人可能投资于经济建设者假定为五十亿元。此项资金务须由国家用种种方式如募公债，招股等法，尽量吸收，从事建设。吾人须知国防建设，攸关民族存亡，绝不容他人有所染指或竟借端控制，故动员国人资金，进行此项建设最为必要。

除此以外，吾人尚须利用外资。据南京中央政治会议决



议，利用外资办法共分三种：（一）借款与中国，外人应居债主地位（Bondholder）；（二）外人与中国合办各种事业，可居股东地位（Shareholder）；（三）特许或租让（concession），外人在中国法律范围内，得自由使用其资本与技术，在中国经营实业，规定年限，期内须负训练中国人材等作用，期满所有全部财产，有条件的，或无条件的交还中国政府，自行管理。

凡此决议仅为利用外资之方式，至于利用外资之原则，则似应规定如下：

（一）借用外资决不借用谋我最急的国家的资本，此等国家实际上亦为竭度贫乏之国家，如日本国债在百廿亿圆以上，德国国债在三百亿马克以上，其财政金融之危机非常深刻。同时为避免新银团之牵制计，可向英美等国在平等基础上，单独借款。

（二）所借外资仅用于国防及经济建设事宜，拒绝一切束缚中国的政治借款。

（三）借用外资必须遵守下列条件：

1. 绝不损害中国之利益与主权；
2. 国家及地方租税不能作为利用外资之担保；
3. 一切事业之经营管理权，不能作为外资之保证；
4. 一切国家之富源与利权不能作为利用外资之交换条件；
5. 中国得聘用外国人材，采用外国原料；但不能作为借用外资时强制的交换条件。

原载于1937年1月16日（现世界第二卷第一期）



论民生主义的本质：资本主义乎？社会主义乎？

一，一个严重的论争

从三民主义伟大的创造者孙中山先生逝世以来，人类，尤其是中国人民，已经写下了一页极端严重的历史。这页历史充满着空前丰富的内容和空前深刻的教训。比方，在全世界，一面有资本主义国家民主主义的极端无能与屈辱，有法西斯主义的极端无耻与残酷；另一方面却有社会主义的发荣滋长，有全世界人民反侵略运动的汹涌澎湃。至于在中国，我们曾经经历过各阶级联合起来反帝反封建的伟大革命，经历过残酷的反民主主义与争取革命民主的长期斗争，经历着各帝国主义的加紧侵略，尤其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无比的进攻；最后到现在又在进行着全民族用空前的团结和统一，用渗透着民族生命的血和肉，与日本强盗拼命的搏斗。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人民接受了这样丰富的历史内容，来承继、咀嚼和发展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历史对于中国人民的作弄是深刻的。他安排好各种条件使



得一切非三民主义的信徒，不得不服从三民主义，使得一切自命为三民主义信徒的人，不得不真正来实行三民主义。这表示历史已给我们以新的刺激和新的任务。

抗战以来，国际和国内的生活使两个因素在中国特别迅速特别有力地成长起来：一个因素是民族资本表现出一种强烈的倾向，要照他自己的轨道向前发展。这个倾向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之加紧武力进攻，由于我之发动与坚持武装抗战，由于英美资本之对我相当支持，在由于国内封建势力之部分的削弱，而在一天天加强起来。另外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国内广大人民因为自身生活的痛苦，同时看到苏联和平建设的成功，所以强烈地憧憬于社会主义；但终于因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残杀，尤其是因为神圣抗战的掀起，更加在实践中觉悟到非争取民族解放，并打倒日本强盗，就不能建立合理的社会制度。这个贤明而深刻的觉悟，给中华民族的推进以莫大的力量。

然而中国社会生活的矛盾也正就在这里。广大的人民大众老远看到社会主义的理想，但原诚心诚意地，脚踏实地地献身于民族解放，献身于三民主义，而从实际的奋斗中将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与革命策略继续发展，继续发扬光大，令其成为吸收十五年来全世界和中国革命的经验，指导群众彻底进行民主斗争而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最高准则。可是中国社会的上层（他们由落后的知识分子做代言人）却在走另一个方向。他们因为对自己社会轨道的忠诚，同时因为对于社会主义的警戒（这是由他们本身阶级根性的限制，他们反民主斗争的回忆，以及国际帝国主义的保守性所决定的），所以不是故意地把民生主义解释为彻底的社会主义而歪曲社会主义（他们看到广大人民对社会主义之憧憬），同时特别提高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或知识分子的领导权，便是干脆地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干



脆地说明民生主义就是资本主义，或民生主义只是资本主义，而不能有社会主义的前途。

这就是目前中国社会生活的辩证法。他反映到思想上来便是目前进行的关于三民主义，尤其是关于民生主义之本质的剧烈的论争。这个论争将在中国政治生活上发生重大的甚至决定的影响是无疑的。同时，这个论争，将由中国大众的实践来给以最后的结论，也同样是无疑的。

二，三民主义是革命的民主主义之高涨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是东方伟大的民主主义的结晶，是革命民主主义在中国的具体化。百年以来中国人民掷了无量数的头颅，流了无量数的热血，所要争取的就是这个伟大民主运动的胜利，就是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就是中国人民要在‘国际地位上平等，政治地位上平等，经济地位上平等’。

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不仅反映着中国民主运动的高涨，而且有力地加强这个高涨。同时更由于国内民主运动广泛和深刻的发展，而成为不是单纯的民主主义，而是革命的民主主义之高涨。

在前世纪末叶中山先生因为看到“堂堂华国，不齿于列强，经济衣冠，被轻于异族”，所以要提倡民族主义。因为看到满清政府“政治不修，纲维败坏，朝廷则鬻爵卖官，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所以要提倡民权主义，建立民国。因为看到“伏莽时间，灾荒频见，完善之地，已形觅食之难，凶侵之区，难免流离之祸”，所以要提倡民生主义。

这就说明了当时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运动的全部内容。假如当时中山先生的主张能够实现，那很可能来上一个‘民治



维新’第二。然而三民主义却跟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强，跟着中国民族资本的长成，跟着国际社会革命运动的澎湃，而继续不断地发展。民族主义的内容不单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而以进一步求得“中国之自由平等”和“承认中国以内各民族之自决权”，（见二中全会宣言）为根本原则了。民权主义的内容不单是‘揭出民权主义来建设共和国家’，而是进一步主张于‘间接民权（即选举权）之外履行直接民权（即创制权，否决权，罢免权’了。民生主义则发展得更远。他不但在‘平均地权’之外，加上‘节制资本’；而且从平均地权与节制资本两个‘单纯的社会政策，进化到主张打倒资本制度’，而最后提出“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来了。

这就是说：三民主义不仅已经被中山先生发展为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民主主义，而且已经在主观上突破了民主主义的藩篱，（这以这个主义与政策之社会发展阶段性看来是如此，从资产者民主主义之实践的限制性看来更加是如此）带上浓厚社会主义的理想。

这就是说：中山先生生前的伟大思想已经发展成为如下的公式（这里的‘+’号是统一的过程）：

三民主义——革命的资产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理想。

我们应该承认：中山先生的哲学思想基本上是唯心的哲学思想，（虽然带着许多新兴的进步的因素），因此三民主义无论当作它是完整的思想体系来看，或是当作他是伟大的政治主张来看，在它自己更进一步发展的道路上，终存在着许多不可避免的限制。然而正唯是这样，我们对三民主义思想发展的如此勇猛，如此其尖锐，应该特别表示崇敬。我们敢说，只有黑格尔对于世界思想的伟大贡献，才实堪比拟于中山先生对于东



方思潮和东方政治生活的伟大贡献呢。

不但这样。我们应该进一步指出：中山先生的伟大不仅在于能够发展和执行彻底的资产者革命的民生主义，也不仅在于能对社会主义抱着无限的同情和高尚的理想，而且在于（或竟主要地在于）他之提出对社会主义的理想（虽然这种理想是小资产阶级性的），并没有剥蚀或损害他的进行到底的民主主义，更没有利用这种理想来作为阻止社会向前发展的护符，相反地，中山先生能够以远大的鹤的来号召全国人民，动员和助长各种革命的社会力量，来走向他所想望的‘大同世界’。

这就是说：中山先生特别伟大的地方，就在于，他能够不以其本身的社会地位和社会成见作茧自缚，能够不去阻止社会的必然的发展过程，能够不断地扶助革命民众的力量而发展之，扩大之，再凭藉着这个，来发展自己的理论和政策。他一生能够永不间断地靠在大众这一边来发展政治，靠在进步这一边来发展思想。

因此，中山先生可以凭着他一生辉耀的功绩，用他彻底执行资产民主主义的精神，来教训全世界的甘地主义者；用他的对社会主义抱热烈的同情与理想，来教训全世界的基玛尔主义者，最后可以用他的对社会主义抱有理想而决心扶助工农，依靠工农，来教训全世界的民粹主义者。

中山先生的教训当然不尽在此。我们应该更进一步指出：三民主义中超过革命的资产民主主义的部分不仅表现于民生主义之中，而是表现于统一的三民主义的整个内容之中。当然就三民主义思想的社会发展阶段性来讲，民生主义确是个突出的部分，即突破民主主义的围墙，而向社会主义敲门。但是，也正唯因为它之突出就使三民主义的发展受到社会力量所必然给予的限制，同时正唯这种突出的现象（特别是民权主义较之民



生主义之相对的落后性），说明了三民主义真实的本质。

可是从社会的实践来讲，三民主义有机的统一性就非常清楚。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的内容完全配合着民生主义实践的（不是理想的部分）前进部分。比如民族主义不但要求得自己的民族自己平等，而且要求得国内一切民族有自决权，要求其它弱小民族之共同解放。民权主义主张‘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有广大的民众来参加，而工农民众，尤其必须’。

主张中国工人‘既有了团体，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可以做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民十三年对各工团讲演）主张‘农民是我国人民之中的最大多数，如果农民不参加革命，就是我们没有基础’。‘中山全集四七二页’。中山先生特别着重地指出‘民权须要与民生主义的连带的解决’，否则民权革命就不彻底，就要‘再来一次革命’。

这就是说：中山先生为要使三民主义进一步向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发展，他不但要求采取进一步的民生主义政策，而且要求民族主义和民权主义同时升华，同时向更高的阶段发展。中山先生这个民生主义与民族主义民权主义的平行发展性，和有机的联带性，对于中国的‘经济主义者’（假定他们够得上这样称呼！）给以严重的教训。这些‘经济主义者’，今天正在孤力地解释民生主义，脱离了革命的民族主义，尤其希望脱离革命的民权主义，（不要民族自动的积极参加政治，只要百姓做应声虫）而实现他们幻想的或是乔装的社会主义。

三，民生主义是本质上发展资本主义 与主观上企求社会主义之统一

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者若是当作一历史范畴来看，并没



有超过资产者革命的民主主义的要求，因为革命的民族资本确乎要求民族的完全独立与解放。虽然在实践的范围内，民族主义的一部分任务已经为正常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不愿解决和不能解决（如国内民族的完全自决，如援助弱小民族的解放）。

同样的，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若是当作一个历史范畴来看，也并没有超过资产者革命民主主义的要求，因为革命的民族资本确乎要求平民之参加政治与管理政治。虽然在实践的范围内，民权主义的一部分任务已经为正常的资产阶级革命所不愿解决和不能解决（如工人农民的彻底动员，如真正赋予民众以四权等）。

可是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就有些不同。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中所规定的两大政策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这两个政策都承认私有财产制度（当然是近代的私有制），因此他在基本上并没有否定资本主义。恰巧相反，他正要发展资本主义，比方平均地权的最终目的是土地国有（用国家收买土地和高涨的地价交给国家的办法来实现），而‘土地国有’却是最彻底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因为只有土地国有才能在农业上尽量铲除中世纪的垄断和一切封建残余，只有土地国有才能保证资本主义农业最通畅的发展。而中山先生在民主主义讲义中所提出七个改良农业生产的问题即（一）机器问题（二）种子问题（三）肥料问题（四）除害问题（五）制造问题（六）运送问题（七）防灾问题，都是使农业在资本主义途上欣欣向荣的具体办法。

其次，讲到节制资本，节制资本的真实目的是发展生产和减轻资本主义的弊害。其方法不外发展国家资本和限制私人资本。所谓发展国家之本照中山先生的说法，就是‘发展国家实业’，具体计划‘已载于建国方略第二卷之物质建设’，也



就是‘实业计划’。（见民生主义第二讲）。在实业计划中规定，‘凡天然之富源，如煤铁水力矿油等，及社会之恩惠，如城市之土地，交通之要道等，与夫一切垄断性质之事业，悉归国家经营，以所获利益，归之国家公有’，这样来预防‘私人之垄断，渐变成资本之专制’。而节制私人资本，也就是‘一种思患预防的办法，来阻止私人的大资本，防备将来社会贫富不均的大毛病’。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可以说是一种国家资本主义的建设计划，（详本文第六节）。他要发展生产，他不否认资本主义，但他要用国家来调节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

但我们能不能说，民生主义除了本质上积极发展资本主义之外，就没有别的内容了呢？不，决不是的。中山先生看到欧美资本主义统治的罪恶，又看到苏联革命的成功，所以在主观上对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抱有极热烈的同情和憧憬，他说‘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实行’。又说，‘鄙人对于社会主义，实欢迎其为利国福民之神圣，本社会主义之真理，集种种生产之物产为公有，而收其利。实行社会主义之后即我民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我中华民国之国家，一变而为社会主义国家矣’，（全集第三集页二六）。又说‘三民主义在中国完全达到目的之后，将来变成一个甚么世界，我们突然一想，或者不容易见到，但是把俄国现在是一个什么景象来一看，便可以知道。（全集页三六九）。

中山先生这个强烈的理想构成三民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的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所以我们说民生主义，在本质上虽是发展资本主义，但在主观上要突破资本主义的范围。也就是说，民生主义在客观上无疑地是彻底的发展资本主义，但主观上却热烈地指望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或大同世界）之实现。因此



民生主义的公式应该是这样，（这里的‘+’号是统一的过程）：

民生主义客观上发展资本主义+主观上达成社会主义。

这就是说，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同时又不是资本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因为它本质上要求资本主义在最顺利的条件成长和开展，但同时又不是资本主义，因为它强烈地要求‘避免’或‘预防’资本主义，要求实现资本主义之对立面——社会主义，如果有革命的民权主义为补充，的确可能发展为社会主义。中山先生能把这矛盾统一起来，这表示他不仅和一般原意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妥协的分子根本不同，而且比‘法兰西十八世纪末叶的伟大思想家和伟大人物’更来得伟大。

有些人特别强调民生主义的非资本主义性，坚决否认民生，他力主‘民生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变相的资本主义’。他引用中山先生的话来证明：‘民生主义和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地方，就是资本主义，是以赚钱为目的，民生主义，是以养民为目的’。他认为“凡承认私有财产，即是资本主义，也就不是社会主义”的说法为不当，因为照他的意见‘私有制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他又说：‘民生主义是一种信仰，是一种根据事实去推进的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则不过是自然发展的一种经济组织……。所以从来没有看见一个所谓资本主义的信徒。’因此他说：‘无论在出发点或归宿点，都可以证明’‘民生主义之不是资本主义’（见青年向导第十二期）。

实在罗先生的理由是并不充分的。他抹杀了民生主义的现实性及其在社会发展史上的规定性。第一，他所引中山先生的话（孙先生这一类的话或更透彻的话多着呢，假如‘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只是表明中山先生抱有这样伟大的愿望与理想。依照着中山先生生前所规定的具体政策所能实现的社会，



确乎也只是比较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更能‘养民’的资本主义社会，或是比较正常的资本主义国家，（如欧美列强）较少由私人“赚钱”的“变相资本主义”社会。当然，中山先生愿意将这个社会继续发展成为如罗先生所说的民生主义的理想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但在中山先生的实际政策中并没有跳过这个社会。实业计划便是个最好的模型。

其次，罗先生认为“私有制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所以不能说因为民生主义“承认私有财产，就是资本主义，也就不是资本主义唯一的特征，但私有制的消灭却是社会主义的最重要的特征，民生主义承认私有财产，所以决不能说是社会主义，所以决不能指责“民生主义……就不是社会主义”为不对。此其一。其次，私有制不是资本主义的特征，这只有当资本主义对封建主义或奴隶制度比较而言，还可以这么说。但资本主义，确乎是私有制度最完成的形态，而私有制度又确乎是资本主义的根源和基础。现在所流行的论争，当然不是而且不会是“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呢，还是封建主义”。（如果问题是这样提出，那么罗先生之所谓“在资本主义之先即有私有财产”云云似乎还有些道理）三民主义的根本任务首先就是反封建的民主主义之任务，也就是资本主义的基本要求，民生主义不否认私有财产完全说明了民生主义具有资本主义的（当然不会是封建主义的）本质。

第三，“民生主义是一种信仰”。是的，但这种信仰所要实现的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经济组织”。现在的问题在于，民生主义所要实现的那种“社会制度”或“经济制度”在社会发展史上是属于那一个阶段，是资本主义呢？还是社会主义？至于本质上为要求发展资本主义，而要为这种信仰定一个名称，那么这个名称当然不一定就叫做资本主义（而且



很少干脆叫它为资本主义)。如若不信，请看在历史上所存在的民主主义，共和主义，人文主义，民粹主义乃至急进社会主义，他们所表现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有些人在口头上竭力避免资本主义，而客观上却积极拥护资本主义。这才是真正的“资本主义的信徒了”，俄国的民粹派就是这一类的信徒。这是一方面。

在另一方面，国内有些人却只看到民生主义的资本主义性，而抹杀其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胡秋原先生便是一例。胡先生张着穆勒氏罗辑的大，（见血路五三期“一封公开信”）大喊其“在投票之时，赞成反对之外，并无第三态度”。因此断定民生主义，就是资本主义，至多是“一种附保留的资本主义”。什么叫做“附保留的资本主义”呢？“因为中山先生还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最后理想，所以民生主义是保留最后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资本主义”。（见时事新报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专论）。但这个保留对于胡先生显然“毫无道理”，因为据胡先生的意见，社会主义只是中国士大夫的“迷”，因此他说，“我不信社会主义。第一，中国不需要社会主义；第二，社会主义本身也就概念不明（胡生一定要相信张伯伦父子和荒木木壮之类都是社会主义者，那概念就相当明确了！）第三，即使是欧洲，我也看不出社会主义之前途。”（血路五十三期，‘一封公开信’）。胡先生过去模模糊糊地相信社会主义，而今天‘是不相信社会主义了’，更进而在欧洲也‘看不出社会主义之前途’，那么他之认为‘在中国，它是一个没有逻辑内容的东西’，和‘中国不需要社会主义’，当然已经谦抑到万分。所以他就老实说出，如果有人‘以为中山先生曾经有几处说到社会主义，就来附会，那和附会民生主义是共产主义一样’。但胡先生请注意，



在半年以前替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保留着最后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正不是别人，而是胡先生自己。大概半年以前胡先生还‘模模糊糊相信社会主义’，而今是‘根本不相信’社会主义，所以也根本用不到‘保留’了。但这显然污蔑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把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根本去了势。可是我们必须知道，胡先生是绝对相信‘三民主义是中国立国的原则’的绝对相信‘三民主义解决一切中国问题的’！而且这种‘相信’现在是绝不‘模模糊糊’了！（以上引用语均见血路第五十三期）。

实际上胡先生这种鼓吹抹杀了社会主义前途的资本主义的壮举，如今也并不会感到孤独。陈独秀先生早在去年七月就大声疾呼要发展‘本国的资本主义’，‘因为现在还没有相当力量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见时事新报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专论）他要我们‘必须毅然决然采用资本主义制，来发展工业’。又说‘列宁会劝俄国的民粹派学习中国的孙中山先生，他认为孙中山先生发展中国资本主义的工业计划是革命的’（见政论第二十三期）。陈先生要我们的资本主义‘快点来’，为的是要培养有力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来一个社会主义革命。这种见解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讲演中，已经批评得很透彻，他名之曰‘先穿起大毛皮衣，再来希望翻北风的方法’。至于说到列宁劝告民粹派学习中山先生的实业计划云云，大概是陈先生误解了。据我个人所知，列宁曾极力高扬民粹派之先进的民主成分，而严厉批评之对社会主义的‘幻觉’，他要俄国民粹派学习中山先生谋中国‘维新’的‘正确的’道路，即‘在政治改良及土地改良事业上，尽量发展农民群众的自动性，坚决心及勇敢性’的道路，即发扬‘革命民族的英勇精神’的道路。因为俄国的民粹派是害怕群众，厌恶群众的。



（引文见‘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

陈胡两先生努力提倡建设资本主义，在号召上可说是桴鼓相应，在问题的实质上可以说是相互说明，相互补充。

同时，汪罗等先生的极力否认民生主义的资本主义性，与陈胡^④等先生的极力提倡资本主义，看来好象极端矛盾，实在是相互补充，相互说明的，因为他们都代表着中国今日社会矛盾的一端，而且代表着同一个方面。不过陈先生等能够和汪精卫一样，劝人家‘不好有丝毫虚矫之气’，要‘负责任，说老实话’就是了。（见陈著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政论二十三期）

四，民生主义不是社会主义

民生主义虽然在主观上突破了资本主义的范围，但民生主义却决不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在主观上要达成资本主义。民生主义要想而且可能由其它条件的配合，完成其客观上发展资本主义，主观上要求社会主义的统一斗争的过程。这些都是事实，因此只是在主观的意义上，更正确地说，只是在理想的意义上（中山先生并没有具体规定他所理想的社会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具体内容——除了引用‘礼运篇’和苏联的模型以处），民生主义才有社会主义的内容。中山先生所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只有就他所说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这句话的意义来了解，才能把握中山先生的真意。

在半年以前，有人特别强调民生主义只是资本主义，提倡资本主义的建设。今天在同样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上特别强调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便是叶青先生。他在号召中国‘整



个民族’，号召‘无产阶级’，号召国民党，号召所有三民主义者，都来‘益为将来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即社会主义任务而奋斗’。（见前途三四期合刊，‘不断革命？阶段革命？一次革命？’）

为什么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呢，让叶青先生用他的‘辩证法来告诉我们吧。

1，第一个推理：

第一段：‘民生主义以国营实业为基础’。

第二段：‘国有不是私有，乃公有之一种’，‘而公有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

第三段：‘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2，第二个推理：

第一段：民生主义的基础是‘国营实业。国营实业形成国家资本主义。’

第二段：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资本国有和剩余价值国有’。
‘所以是社会主义之一种’。

第三段：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3，第三个推理：

第一段：‘民生主义形成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亦‘可以名为国家社会主义’。

第二段：由国家社会主义走到社会主义，只须没有国家即得’。即只须叫幼稚班学生做个简单的减法‘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即得）。所以‘从国内说来，国家社会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第三段：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

叶青先生这类有条有理的推论正多得很呢。好，且让我们来学习叶青先生所特有的非‘机械论的’‘非公式主义’的



‘辩证法’来研究一下他所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吧。叶青先生的‘辩证法’似乎也 and 穆勒先生的名学一样，要求我们只要把三段论法的前提推倒，那么结论就根本不能成立。让我们来凭着一些社会经济的初步常识来研究一下，这些推论的前提到底牢靠不牢靠吧。

先看第一个推理。第一段：‘民生主义以国营实业为基础’，这个前提可以确立，虽然国营实业并不包括民生主义全部，但无疑是它的基础。第二段：‘国有不是私有，乃公有之一种’。又‘公有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个前提就有问题。社会主义的基本条件是私有财产的废除。但国有就不一定就是在事实上废除私有财产。例如革命前的中央亚细亚，有一大部分土地属于当时的‘国家’，但这种国有只能算是封建领主变相的私有。再则，如果在资本主义国家，土地真能成为国有，那只能算是资本家变相的私有，这种所有形态倒反能够保证资本主义的通畅发展。所以民生主义的国营实业和国家资本，决不能等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叶青先生也承认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任务，所以社会主义的公有必须一切生产工具属于直接生产者阶级——无产阶级的国家）。所以民生主义决不等于社会主义。

但叶青先生也许以为一切国营实业就‘是社会主义的基础或达到社会主义的起点’。那末请看俾士麦的大德意志帝国，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吧。俾士麦提倡“国营实业”把德国发展成为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之一，并没有造成社会主义。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实行四年计划，“叶青先生一定以为是和苏联的五年计划是同样的国营实业计划”，实行广大国营实业，所造成的结果只把德国变成最反动的法西帝国主义国家，也并没有造成的社会主义。然而叶青先生似乎不在乎这些，即不在乎国



家政权的性质，不在否剥削事实的存在与否，不在乎直接生产者阶级获得了彻底解放与否，只要看到国营实业，他就看到了社会主义。无怪他一看到中国‘一开始离开封建主义时，便实行国营实业’，便要大喜若狂，发现中国在鸦片战争后，‘就是由封建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之开始’，发现‘中国民族是天然的社会主义民族’了。好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差不多在一百年以前已经存在了社会主义！俄国的民粹派双手捧着一个农村公社（由富农统治的，即资本主义性的）便沾沾自喜，以为就拾到了社会主义的宝贝。今天中国的民粹派却拥抱着一条国营铁道，就三月不知肉味，大叫大喊，“看呀，这就是我们可爱的社会主义啦”！历史终爱跟人们开玩笑！今天希特勒先生一定会借着叶青先生的社会主义（反正和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一样）来向奥国和捷克的亡国奴劝慰：“乖乖的，别哭了，也别再胡闹了，让我到你们那里来实施社会主义吧”。

看第二个推理。第一段：‘民生主义的基础是国营实业，国营实业形成国家资本主义’。这前提在基本上可以成立。第二段：‘国家资本主义因为资本国有和剩余价值国有，所以是社会主义之一种。’这个前提就不能成立。因为国家资本主义如果不是在工人执的基础上实行，则所谓资本国有和剩余价值国有，都只能算是资本主义所有的集体形态，决不是社会主义的因素。所以因此而断定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就不可能。

再来看第三段推理。第一段：‘民生主义形成国家资本主义’，而国家资本主义亦“可以名为国家社会主义”。这前提的后半段不但‘概念不明’，而且根本错误。叶青先生所想像的‘国家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它是‘在国家范围内公有生产公具，公有生产产品’，也就是在国家范围内公有资本，公有剩余价值’。换句话说，就严格意义来讲，就是在一国以内实行



社会主义。假定国家社会主义的意义做如此解释吧，（当然我们了解叶先生会如何巧妙地把苏联的一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搅在一起，来鱼目混珠。）那么国家资本主义决不能算在一国以内实行社会主义。依苏联新经济政策的经验，工人专政的国家不过连用国家资本主义来发展生产力，而以社会主义因素的发展作为主道，发展资本主义的要素，同时又克服这种要素。这才能使新经济政策对社会主义建设完成极重要的准备工作。因此国家资本主义决不能就算是所谓“国家社会主义”。因此民生主义决不能说就是社会主义，但如果叶青先生对社会主义的解释别有所指，那只能如四川人所说‘算了吧’！

研究了上面三个推理，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后结论就是：叶青先生所谓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主张，绝对地不正确。但如叶青先生一定要坚持他自己的观点，认为国营实业就是实行社会主义，认为中国的“洋务运动”的业迹就是“社会主义”的业迹。认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便已存在了社会主义，那末叶先生之所谓“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云云，也即是“民生主义只是资本主义”的变相说法，这对于中山先生社会主义的远大理想只是一个重大的污蔑而已。叶青先生的“社会主义”决不是中山先生所想望的社会主义，也决不是中国人民所想望的社会主义，由此可知。

可是叶青先生可贵的功绩也许就在这里。他苦心孤诣地发明了国营实业就是社会主义的真理，大大打开社会主义革命的旗帜，要求我们整个民族，要求有产阶级，要求国民党，要求三民主义者为实现社会主义任务而奋斗。但叶青先生最大的不幸也就在于他没有估计到：今天别说我们“整个民族”，我们的“有产阶级”，中国国民党，我们的三民主义者都在忙于打



日本鬼子，还谈不到什么社会主义不社会主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也正忙着抗战，为建立一个“不是苏维埃，也不是社会主义”的三民主义共和国而奋斗。（见毛泽东著：《论新阶段》）。那末叶先生又未免多问吧。但说实在话，叶青先生这类高呼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我们已经听到好多年了，但也已经为了他的“社会主义”，不断革命了好多年了，还过今天这种口号的新姿势是穿上了中山装，口头上说是“为国民党说话，为三民主义说话”吧了。（以上所引，多见血路三四期合刊）。

安东尼先生（Antony）真个想像罗马人民会永远无知到这般田地，给他煽动起来，来反对勃罗陀斯（Brutus）吗？但莎士比亚把勃罗陀斯描写得对安东尼给以那么稚气的宽纵，终是值得批评的。（见莎士比亚著：凯撒Caesar）。

五，民生主义更不是国家社会主义

刚才我们已经指出：如果把国家社会主义当作在一国以内实行社会主义（当然这决不能称为国家社会主义），那末民生主义既不是社会主义，当然更不能说是国家社会主义。

谁都知道一般所说的国家社会主义，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现在世界上流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就是希特勒的法西主义。

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或称民族社会主义”是什么呢？它是金融寡头的最反动的专制主义，是帝国主义最毒辣的侵略主义。国社党党纲虽然也规定要没收大公司，保证中小资产阶级，但国社党的实际行动完全表示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国社党厉行最野蛮的种族主义，规定日耳曼民族是最优秀的民族，只有它的子孙，才能算是德国的公民（《政策大纲》第四



条)。对于其它民族在待遇上（第五条第七条第八条），在选举权和参政权上（第六条），在这言论出版上（第二十三条）都加以歧视。反犹太人尤其是国社党的拿手好戏。它和意大利法西斯一样，规定劳动为人的义务。为资本努力生产（第十条）。它要求殖民地市场（第三条，尤其是希氏所著《我的奋斗》）对内实行专制独裁（第二十五条），主张实行经济的国会，由职业团体为基本，完成金融资本从上到下的彻底的独裁。

这就是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如果有人要这样的国社主义和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之间划个等号，那不是白痴，便是法西斯魔王的帮手。

另外，有一种国社主义，那就是中国国社党所提倡的国家社会主义。张君先生为要使他国家社会主义有别于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起见，特地把后者改译为民族社会主义，而把自己的主张正名为真正的国家社会主义。

张先生等“认为今后我国之经济建设，惟有国家社会主义”，其目的是“一方求国家之自足自给，或民族自治；他方求社会公道之实现，而将励个人自发自自动之精神”。张先生对国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提出四大原则：

一）为谋个人生存之安全，并改进其智能与境况计，确认私有财产；

二）为社会谋公共幸福并发展民族经济与调剂私人经济计划，确立公有财产。

三）不论公有与私有，全国经济须在国家制定之统一计划下，由国家与私人分别担任之。

四）依国家计划，使私有财产渐趋于平均与普遍，俾得人人有产，而无贫富悬殊之象（张著《立国之道》页一七六）。



社会主义之间尽管没有什么中介的东西，然而国家资本主义决不是社会主义，也决不等于社会主义’。（见拙著中国国防的建设，一九三七年出版，页三二）。

但国家资本主义决不是独立的生产方式，它必须依附于某一种主导的生产方式而存在。它可能存在于历史条件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当然，必须在资本主义相当发展的阶段）而尽其不同的任务。早在两年以前，作者曾经这样说过：

“在一个大资本家和大地主们统治着的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只能是巩固独占资本的基础，增厚大资本家和大地主们的利益，加强对于劳动大众的剥夺的制度。它决不会变成美丽的玫瑰花。（比如在俾士麦的德国，以及目前的第三帝国）。

“在一个工人统治的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只能是强烈的国家政权利用资本主义，扩大生产力和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准备，而在某种程度以内对于资本家给以局部的和暂时的让步的制度。它不可能变成吃人的豺狼（比如在苏联）。

“那么在一个革命的民主国家里，国家资本主义将是怎样一种制度呢？它只能是以强有力的民主国家政权，迅速地肃清封建残余，有效地抵御外来的侵略，从而建立独立的国民经济的制度。它不可能马上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因为这还需要人民的奋斗，它也不可能成为只向资本‘施肥’，而不顾大众苦乐的制度，因为这里存在着大众的奋斗”。（中国国防经济，页三七——三八）。

作者当时曾经分析国家资本主义与人民生活的关系指出：

“国家资本主义对于人民大众的利益，也只能是一种相对的说法。这第一要看，这种制度究竟在怎样一个国家里面实行。在大资本统治的国家里实行呢，还是在劳动者统治的国家里实行？在前者，国家资本主义保障了资本的利益；在后者，



它又保障了大众的利益。如果这种制度在一个革命的民主国家，在一个对外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对内肃清封建残余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实行的话，那么对于民族资本固然有很大的好处；对于大众也能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准，这是无疑的。所以中国的国民经济建设（当时盛倡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如果在对外抵抗的前提底下，在民主的政治前提底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那么人民大众的生活一定有些改善的。在这里，我们不可能避免资本主义的一切本质的弊害，然而我们却可以由此而使中国的经济推进到更高的阶段。让我们重覆说一句吧，这种推进的工作，仍然需要人民的奋斗；这种推进过程的长，短，快、慢，仍然要看人民大众的奋斗的程度来决定。”（同书页三八—三九）。

我们曾经进一步研究中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步骤，指明“在中国，我们至少可以用下面几种方式，在战斗的民主条件之下，实现有进步性的国家资本主义：

第一，国有国营 象一切重工业，尤其是军需工业，以及重要金融机关的国营。在轻工业部门中，关于粮食的生产和改制，都需改为国营。其它象铁道，航运，航空和一切交通工具的国营。（发达国家资本）。

第二，国有民营 在农业生产中，我们必须有急剧的变革。我们要使全国土地化为国有，然后分给农业耕种。这是肃清一切封建残余的彻底办法。（从平均地权到土地国有）。

第三，私有经济的合作经营 由于国家的干涉和督促，大部分的小商品生产者都加入合作的组织。这种经营可以说是私营经济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这种合作的形式比效一般私营经济容易受国家的统制，因此它是接近于国家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同时这种经营形式可能包括多数私人的经营，因此它对于经济向更高阶段的发展，显然有很大的利



益。（节制并保证私人资本，而现在我们已有工业合作运动）。

第四，国有经济的租让经营 国家把一部分资源租让给本国的资本家或外国资本家经营。我们因为生产工具和运输机器的不足，可以把部分的企业，渔区，矿山和森林等等租让给人家经营，以扩大我们的生产力。在这种形式中间，我们当然有不少的牺牲，我们必须以高额的利润支付给外国资本家，然而我们只可以这样才可以从他们身上取得工业生产物，机器以及近代的技术。（中山先生所订的‘实业计划’，主要要引用国外资本来发展我们的生产力）。”（‘中国国防经济’页三九——四一）。

有人以为中山先生反对国家资本主义（见‘科学的民生主义研究’，时事类编廿八期，页一八）。侯先生举出的理由是中山先生在民权主义中曾经反对俾士麦。我以为这点值得蹉商。中山先生因为俾士麦之专制蛮横，剥夺民权而反对俾士麦，但对俾士麦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曾寄以相当的同情。他说“德国当俾士麦执政的时代，用国家力量去救济工人的痛苦，作工时间是由国家规定了八点钟，青年妇女作工的工作与时间，国家定了种种限制。工人的养老费和保险费，国家也有种种规定，要全国的资本家担任去实行。当时虽然有许多资本家反对，但是俾士麦是一位铁血宰相，他便有铁血的手腕去强制他们执行。当实行的时候，许多人以为国家保护工人的办法改良，作工时间减少，这是一定于工人有利，于资本家有损的。再照比例的思想来推，以前十六点钟的生产力，自然要比八点钟的生产力大得多。但是行了之后的结果是怎样呢？事实上八点钟的工作，比较十六点钟的工作，还要生产得多。”（见民主主义第一讲）。当然，中山先生在基本点上，并不赞成



俾士麦，只是他对俾士麦之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并不反对。因为中山先生要在另外的基础上，即在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基础上，来实行国家资本主义，实行与俾士麦完全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在这里我们应该指出，即使有人要想在中国实行象俾士麦那样的国家资本主义也是不可能，首先就因为国内没有像当时德国那样强大的资本主义基础，同时要引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激化社会矛盾。

再有人认为在今天，不可能实行国家资本主义，或‘还谈不到国家资本主义。’例如胡秋原先生。胡先生认为国家资本主义就是苏联新经济政策，新经济政策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结论是：‘我们今日无论在任何方面，没有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所以今天也还谈不到国家资本主义’。（时事新报二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专论）。我想，这是误会。我们知道，苏联新经济政策固然采用了国家资本主义，但决不单是国家资本主义，恰恰相反，苏联新经济政策是以社会主义的成分为主导，利用国家资本主义，以扩大生产力使社会主义的胜利凌驾资本主义的要素而得到确实的保证。更明确地说，苏联新经济政策，“不是资本主义复活之一方面的过程，而是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主义的发展之两方面的过程，是由社会主义要素去克服资本主义要素的过程”。

中国今天没有行‘新经济政策’的条件，所以中国今天不能行苏联那样的新经济政策，这是对的（主要是因为中国今天绝对不存在社会主义的成份）；中国今天又不能实行象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时那样的那样的国家资本主义，这也是对的。（主要是因为社会主义要素的约束和主导）。但我们绝不能说中国今天绝不能行国家资本主义。今天国家有强有力的统一政权的存在，（尽管不是苏联那样工人专政的强有力政



府），有资本主义关系的普遍存在，尤其是有发展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强烈倾向之存在，我们就能建设国家资本主义，建设中国革命民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建设以国家资本主义为基本方式的革命民生主义。

最后，我们必须指出，民生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决不就是一般所说的统制经济，民生主义的基本要求是发展民族企业和民族生产力，而今天的统制经济则往往妨碍这个发展。此外，在革命的民权没有确立之前，决不能实行民生主义的国家资本主义，所以只强调国家资本而不注意发展民权，决不能实现真正的民生主义。

七，民生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发展

民生主义虽然在本质上要求彻底发展资本主义，但却可能突破资本主义；它虽然不是社会主义，但可能发展到社会主义。从民生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从一个社会经济形势（资本主义性的），发展到另一个社会经济形势的过程，这就说明了中山先生的话：“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是民生主义的理想”关于这个过程的发展性，我同意侯外芦先生的意见。他说，“中山先生的伟大思想，不但没有使民生主义在思想上和社会主义计划一鸿沟，而且使民生主义具体了很丰富的社会主义发展性。……如果由中山先生所谓彻底的民权革命的领导，主观性却可以向客观性发展”（‘科学的民生主义研究’时事类编廿八期，页十一）。当然这是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

有人抹杀了这个需要人们奋斗的发展过程，而提出其所说“统一”的过程。这便是叶青先生。他说：“一）从中国内部的历史发展看来，它处在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阶段，或资



本主义初期，所以应走资本主义道路。二）从中国外部的历史发展看来，代表世界历史发展的欧洲则处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阶段，所以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说，中国一面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一面要走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的历史发展和世界的历史发展统一起来。……因此，中国的道路带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二重性质，这是什么呢？是民生主义。……所以民生主义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统一”。（血路三四全期页八）。

叶青先生因为急于要完成他伟大的“一次革命”，所以一步要当两步跨，结果他把中国历史上（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阶段，）和世界历史上（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阶段），一脚踏成了平面，再象孩子捏泥娃娃一样，把它们捏成一团。这个光明的一团便是叶青先生所说“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统一”。所以叶青先生之所谓“统一”过程，实在是意识上的“合并”过程。只是因为叶青先生过于性急了，一时就不分皂白，硬把张之洞张謇之流提倡的国营实业，认定他是社会主义；硬把当时的洋务运动认定它是社会主义的革命，（照他的讲法，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已经发生过‘两次’革命了，第一次“？”是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是资产阶级革命。如今又要来一次统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革命，这样，叶青先生的‘一次革命’论似乎又成问题了。够麻烦的事！反正就那样颠之倒之地”不断革命‘就算了’，那末又何麻烦之可言呢。但这里却泄漏了叶青先生“一次革命”论即‘不断革命论’的本质。假如鲁迅先生在世，他一定可以更加放心了，因为他的住在楼上的绅士亲戚，今天不但要骂康梁为革命，而且要骂李鸿章张之洞等大逆不道，居然干起社会主义革命来了。（故事见鲁迅著：《彷徨》。历史开人们的现实真可算无微不至。



从民生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是一个需要彻底的民权主义的领导的奋斗过程，而不是平面的合并过程。这在上面我们已经说明了。现在我们要问：民生主义到底怎样发展到社会主义呢？保证这种发展的必要条件又是些什么呢？

要预先描写从民生主义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具体过程是不可能的，要预先确定这个过程的情势，也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些都由当时的国际条件和国内所规定。我们所能做到的，至多只能指出这个过程之特点和主要条件罢了。

第一，我们要了解从民生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首先就要明白什么是民生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的意义我们已经研究过了。那么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呢？对于我们，社会主义应该是概念明确的，它必须具备这些特征：一）国家政权属于劳工阶级；二）消灭私有财产，生产手段属于劳动者的国家；三）真正的计划经济；四）以改善劳动大众生活与扩大社会主义再生产为宗旨的分配方法。五）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社会主义在今天世界上是已存在的事实，没有什么概念不明，因此张白伦本庄繁等固然绝不够说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是社会主义的敌人），李鸿章张之洞等更和社会主义朽去十万八千里。

其次，我们就要来研究；民生主义究竟如何向这样的社会主义推进呢？在这里我们首先要了解，无论在中国现存的社会经济体系中，或是在实现了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民生主义社会经济体系中，我们即使用了一万万倍的显微镜也丝毫看不出，“或几乎丝毫看不出”有社会主义的成份。“民生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只是从望远镜里看出来的”。这说明了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代的特征。因为“在封建主义底母胎中成熟起来的，不仅是资本主义底生产力，并且是资本主义底生产



诸关系。可是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却只依靠着由资本主义底发展所造成的生产力；在这种过渡中，完全没有或几乎完全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样式”。（拉苏莫夫斯基著：《社会经济形势》沈志远译本，页三八。）

同时，民生主义虽然因为采取国家资本主义的政策，比较有计划，有条理，可是这决不就是所谓“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因此我们也决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民生主义可以自然生长成为社会主义；从民生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等着就来”的自然生长的过程。

那末民生主义究竟怎样进展到社会主义呢？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一个突变，是一个革命，那末从民生主义到社会主义是不是一定要革命呢？这就是问题的中心。

是的，民生主义中并没有客观的社会主义成份，也不能自然生长成为社会主义，但民生主义——如果民生主义真个照中山先生的规定和继续发展的精神实现起来的话——毕竟和欧美资本主义不同，而且不可能和欧美资本主义相同。第一，因为这个“社会经济形势”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真正在崩溃腐烂的时代，存在于资本主义的罪恶十百倍于中山先生在世的时代，第二，这个制度又存在于苏联社会主义发荣滋长的时代，存在于这个社会主义较之中山先生在世时更加坚定，更加具体化了的时代。第三，而且是特别重要的，这个制度是全民族流血抗战的结果，不是和平生长和循序渐进的产物。

所以这样一个历史时代，用了千万颗头颅争取得来的民生主义国家，“更正确的讲，是三民主义国家因为民生主义不能和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分开”虽然还不是社会主义，可是已经非常接近于社会主义的大门。

要从这样一个异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而非常接近于社会



主义的民生主义社会（是当然不能划为特殊主义发展的时代），和平地发展为社会主义社会，在理想上是可能的，但决不是必然的。

从可能到实，必须具备几个基本条件，必须艰苦奋斗。那些条件是为民生主义和平发展到社会主义所必需具备的呢？

第一，必须实行彻底的民权主义。在这里中山先生的工农政策是我们的模范。我们必须深深记住，当我们在明天（是明天，决不是今天）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候，我们手头真正并没有社会主义成份的遗产，我们所依靠的只是那些（“由资本主义所造成的生产力”，特别是生产力中最强大最基本的劳工群众。中山先生在十五年前对各工团讲演，特别强调中国工人“既有了团体，要废除不平等条约，便可以做全国的指导，作国民的先锋，在最前的阵线上去奋斗”。就可以见得中山先生眼光之远大，他正确地估量到真正革命的动力。其次，他认为农民是国民党的基础，农民不参加革命，革命就没有了基础，他对农民之关心表现得那样透彻“如果耕者还有其田，每年还是纳田租，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全集页四七五）。所以彻底的动员工农群众，真正给他们以民权，是民生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主要桥梁。侯外卢先生说：“这一实在的农工政策之发展意义，成为民生主义和社会主义相结合与统一的契机，”（见科学的民生主义研究）。这话是真理。

第二，国民党必须进步，同时国民党必须与其他党派合作，加强这些党派，尤其要加强工人政党。中国国民党的进步首先应该表现于党员成份的扩大与改进，注重吸收下属大众。关于这点（仅仅关于这一点）我同意于何兹全先生在《政论》（一卷二十一期）上所发表的主张，他说国民党要完成资本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种历史使命，一定“要逐渐把国民党



变成工农阶级的政党，即逐渐随社会的进展改变自己党的成份。”他更进一步正确地指出，“国民党必须这样走。否则，国民党如只能建立资本主义国家而不能更进一步，则他日社会必仍不能免，而让位于他人！打倒自己”。（但何先生在另一个地方。（见政论二十三期何著《民生主义的性质及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这种精神实在已经由中山先生所起草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充分表现出来。他说，“国民党于此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之运动全力助其开展，以期增进国民革命之实力，一方面当对于农夫工人要求参加国民党，朽与为不断之努力，以促国民革命运动之进行。”

国民党除在进步的基础上加强其自身以外，还需要和其他党派亲密地合作。为了要实现民生主义社会主义的理想，尤须加强工人的组织和政党。中山先生在民生主义演讲中主张“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主张“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并且批评反对共产党的国民党员“为不明白民生主义是什么东西”，所有这些，当然决不是说中山先生要求国民党员都成共产主义者，或都做共产党。他以他远大和锐利的眼光，看出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所以希望共产党也做国民党的好朋友。不但这样，中山先生还以宽宏的胸怀和伟大的精神，教育了当时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他说：“共产党员也有不明白共产主义为何物，而尝有反对三民主义之言论，所以激成国民党之反感。但是这种无知妄作的党员，不得归咎于全党及其党中之主义，只可说是他们个人的行为。所以我们决不能够以共产党员个人不好的行为，便拿他们来做标准去反对共产党。”这些教训在今天看来，不仅只在过去有意义而且还有现实的意义。然而中山先生这种伟大的精神，决不是凭空产生的，他主要是从他对于革命动力之伟大的发现，和诚



恳的依靠产生出来的。

第三，民生主义的内容必须继续发展“配合着这点，有民族主义，尤其民权主义的高扬”。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是继续不断发展的过程，所以它是优秀传统与新的革命思想及新的革命经验之统一。在中山先生生前，民生主义之最后发展阶段的具体内容，有手订的实业计划，有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两大政策，有远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我们在本文开始就指出，从中山先生逝世以后，全世界和中国已经产生和正在产生无数新的事实和新的经验。在今天，每个中山先生的战友和学生，应该虚心地学习历史，学习人家；严格地批判自己，检讨自己；最后正确地吸收一切新的革命的因素，继续发展三民主义——在这里是特别注意继续发展民生主义，使它真正能够指导抗战建国的人民生活的建设过程，真正能够具备着从民生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具体步骤。这样民生主义的伟大理想，才不会成为空洞的教条，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民生主义真正和平发展到社会主义。

总之，民生主义向社会主义的和平发展是在理想上可能的，这里基本的保障是革命民权主义的彻底高涨，这是一个奋斗的过程，虽然他可能是和平的，但一切都要由未来的条件来决定。

最后我们必须牢牢记住：这个民生主义到社会主义的发展决不是我们的任务，而是明天的任务。今天我们是“抗战第一”，“胜利第一”，和“三民主义第一”，还谈不到社会主义的革命。我们不要性急，更不能撒谎，因为性急就要坏事，撒谎的结果更成“取消”了。



简单的说明

侯外卢先生在本刊第二期发表了一篇《民生主义的伟大理想》。侯先生自己说，这是对我的那篇《论民生主义之本质》一文之必要的补充和修正。我除衷心表示感谢而外，想在这里简单提出几个要点来就正于侯先生和国内贤明，至于详细的意见，我希望另有机会提出。

一、从总的方面说，我觉得侯先生的补充恰恰补充了拙作原有的弱点，而侯先生的修正恰恰又修正了拙作原有的优点，在我那篇文章里，我曾相当强调了民生主义理想的现实性，民主主义观的客观性，这在我自认是弱点，而侯先生的补充却把这点更强化了。同时在我那篇文章里，我特别着重指出只有彻底民主的高涨才能保障民生主义之过渡到社会主义。这在我自认是优点，而侯先生都以民生主义“自我的”指道修正了它。所以在基本上，我不致苟同于侯先生的补充和修正。

二、在研究三民主义的时候，我觉得有一基本点必须牢牢握着：马克思是马克思，孙中山是孙中山。马克思主义和三民主义是两个完全独立的，不同的理论系统和指导方针。三民主义的创造者孙中山先生尽管主张“共产主义是民生主义的好朋友”，“但是这不妨碍他严格地批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发展者列宁尽管极端赞扬中山先生的伟大精神，但这也不妨碍他严格地批评三民主义。（见《中国的民生主义与民权主义》）。三民主义是革命的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革命的社会主义，其生产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都不相同。它俩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上可以相互帮助，相互发展，但决不能相互转化，相互吞并。我们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可以包容三民主义之全部（当然可以包含



其一部分真理)；同时也不相信三民主义可以包容马克思主义之全部(当然可以包含其一部分真理)。这样我们就不能赞成把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化，也不能赞成马克思主义三民主义化。因为两者都不可能，这是历史的“命运”规定的。

三、根据这，我在原则上，对侯外卢先生研究三民主义的態度颇不致赞同，我的意见是我们研究三民主义就要把孙中山还给孙中山，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就要把马克思还给马克思。而照我拜读侯先生论三民主义各篇文章之后的感觉来讲，侯先生的确把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化了，把孙中山马克思化了。侯先生志在发展三民主义，这是目前中国历史的要求。但三民主义之继续发展必须在其民主主义的核心部份，而决不在其民生主义向社会主义之“自我”发展。这大概就是我和侯先生的意见基本上的分歧之点。

四、因为这，我就觉得侯先生在《民生主义的伟大理想》一文的立论中有许多地方值得商榷。例如：

甲、侯先生以为“关于中山先生理论的发展在社会主义的范畴上，我们应从时代的观点了解多于民生阶段的东西，那就是除了革命的民生主义客观性而外，还增加了社会主义主观性到其客观性的飞跃，即“由实行以进理想”。甚至已“把社会主义的主观性发展到其客观性的实际政纲，亦具体地提出来。”这话顾然是过火。我们在孙先生的遗教中实在并没有见到任何真正的社会主义的实际政纲，也并没有见到“社会主义主观性到其客观性的飞跃”之任何具体步骤，我们认为三民主义十三阶段多于民元阶段的东西，主要是在民主主义之高涨，或者说是“彻底的民权革命”核心之发展。但就在这一点上，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最高表现——工农政策也决不是马克思主义所规定的工农民主专政。此其所以三民主义是急进的民主主义，而



决不是马克思主义也。

乙、中山先生的土地国有政纲，是彻底的民主政纲，是所谓“民生主义之补充”，因为这，使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配合着其他构成部分，成为完成的革命民主主义。（中略）而侯先生的土地政策是所谓“共产主义运动的特别的原始的形式，”恐未免超阶段。

丙、中山先生特别伟大的地方是说工人为革命的“先锋”，农夫为革命的“基础”，因而建立其农工政策。但这不能和马克思主义者列宁所说“将民主主义合理的核心发展”的完成形式混为一谈。中山先生的政策是“扶助农工”的政策，而马克思主义者的政策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策。再则，侯先生把中山先生所提的纲领“一造成人民的军队，二造成廉洁政府”说成“已经取得了巴黎公社式的所谓‘民众政府’以及‘廉价政府’之意义”。我想，这也是过火的说法。中山先生在其纲领中所规定的国家决不是巴黎公社式的国家，而是民主共和国。我们认为遵照民生主义的实际纲领，中山先生要在革命民主主义基础上，进行国家资本主义为主体的经济建设。这在基本上还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以内，而决不同于新经济政策时代的苏联。至于“将发展国家资本制度概念化而为国家资本主义，”那是另一问题。这主要为国家资本在整个社会构成中所占的地位来决定，倒不是概念化的问题。例如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苏联，当然不能说是国家资本主义社会，但在俾斯麦统制下的普鲁士，国家资本主义却占了优势。

我在这里先简单提出上述各点向侯先生和别位先生请教。我十分感谢侯先生的善意批评与补充，因此我认为我有义务认真地来和侯先生讨论。



中国货币制度往那里去

第一节 白热的国际货币战争

记得一九三三年伦敦举行世界经济会议，白头议长麦唐纳说到世界货币战争无法缓和的时候，就不禁感慨系之，说‘世界是不得不饮干这失望的苦杯的了’！

可不是吗？在现存的资本主义一般危机的条件之下，就是少数金融寡头，也不得不饮尽这‘失望的苦杯’；至于一般大众，特别是殖民地和半殖民的‘饥饿之众’，那是更不得不在资本家们‘明枪交战’，‘暗地斗法’里面，做着他们‘举杯痛饮’的牺牲品了！

现今世界经济恐慌——严格地说，是特种经济萧条的特徵之一，就是资本主义各国金融制度的瓦解，货币制度的紊乱，和各帝国主义国家间的货币战争，一天一天尖锐。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国币制多以黄金为基础，金铸币的流通，是异常自由的。银行所发钞票，随时可以到银行里去兑换金子；所以在那时的钞票，终不会跌价。

在大战期内，各国币制就大起紊乱。帝国主义国家为要筹



措战费，不惜滥发纸币，同时停止兑现。这样，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币价，就大跌特跌。

不过，谁都知道，安定货币，对于资本主义是一个最有利的条件。所以，战争一告结束，各国政府便先后安定币价。在资本主义局部安定期内（一九二四——一九二九年），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可以说完全安定下来。

可是一九二九年爆发的世界经济恐慌，又连根动摇了战后世界金融体系的基础。它首先对于弱小国家的货币给以致命的打击。一般债务国家，它们平时固然可以用增加出口和举借外债的方法，来偿还它们的债务；可是一到恐慌时期，债权国的资本几乎停止输出。贸易的额数又急激减少，因此只有把自己的存金和一部份外国货币，来抵偿外债。这么一来，黄金的存额就大大地减少，结果，那些债务国家，就没有力量继续维持金本位了。在一九二九年十二月，阿根廷和乌拉圭首先停止纸币的兑现；只因为它们都是比较小的国家，在世界金融市场上并不占重要的地位，所以一般人都都不大注意。

可是到了一九三一年九月，那号称‘金融帝国’的英国也竟放弃金本位了，这才使世界金融市场受着重大的震惊。到同年十月底，英帝国统属下的自治领和殖民地，除了南非联邦之外，都放弃金本位，其它瑞典，挪威，丹麦，葡萄牙，埃及，玻利维亚和芬兰，也相率脱离金本位。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三日我们的东邻日本，于占领东北‘大腹便便’之后，也宣布禁金出口，十八日并停止纸币兑现。一九三二年四月，希腊放弃金本位，五月暹罗和秘鲁也脱离金本位。最后，资本最称雄厚的美国，于一九三三年三月，也宣告停止金本位了。到一九三五年初，金集团的‘积极分子’比利时也竟放弃金本位，减低币值百分之二十五，荷兰也有在一



九三五年年底贬低币值的意思。

到现在为止，世界上号称维持金本位的，虽然还有法、荷、瑞士、意大利、德意志、捷克、波兰、卢森堡等国，但其中德意捷克波兰诸国，在严厉的贸易统制，汇兑统制，和通货管理之下，事实上金本位已经仅存躯壳；尤其是德国，它的金准备只占发行额百分之二，所谓金本位也者，正和希特勒别种政策一样，只是骗人罢了。

现在我们不谈那些弱小国家，因为黄金滚滚流出，不得已而放弃金本位的情形。我们要问，世界上两大金融霸王英美两国，为什么肯违背资本家们基本的要求（安定货币）而‘甘冒不韪’？

不错的，英美之放弃金本位自然也有其不得已的苦衷。就英国说吧，首先是经济恐慌的加深，使金融界感受强烈的威胁。一九三一年夏季中欧的信用恐慌，德奥的银行挤兑风潮，迫令中欧各国银行纷纷向伦敦提回短期存款。同时，法国也从英国方面提回大批存款，以期在政治上威胁英国。此外，英国海军又发生哗变，英帝国主义发生全部动摇，因此资本逃亡的现象非常严重。在此情形之下，英伦银行的存金，大部份流出。英国政府迫不得已，就停止兑现，脱离金本位，于是英镑价格像瀑布一样，往下直泻。

美国呢，一九三三年空前的银行风潮，一般民众纷纷将黄金窖藏起来，同时又生怕资本大量流出国外，于是美国政府赶快停止兑现，禁金出口。

然而，这样我们已能说明英美放弃金本位的“初衷”了吗？不然的，决不然的。英美资本家看出，停止金本位一举，不单是“防患未然”的手段，而且还是挽救经济恐慌，加紧对入竞争的有力武器呢。大家知道，目前资本家们，左手垄断了商



品，右手垄断了货币。用右手的货币直接去购买左手的商品呢，他们非但没有啻大的消费力，而且也不会那样的愚蠢，（因为这样，那里可以捞得利润呢）。拿右手的货币分散给大众，以增加购买力吧，或者拿左手的商品分散给大众去消费吧，那又都是现社会制度下不能想像的事，因为这样便根本没有了资本主义社会了，在这种情形之下，资本家唯一的出路，只有用膨胀通货的手段，去增加右手货币的数量，企图用币值的跌落，来反映物价的高涨。他们只有运用降低币值，使汇价低落，用倾销的方法，去展开他们的海外市场。而放弃金本位便是贬低币值的前提。这样，国际间热辣辣的货币战争，就开始了。

现在我们明白了，放弃金本位，和货币跌价，在一方面固然是经济恐慌加深的结果，是各国统治者不得已的措置；在另一方面，帝国主义者同时就利用这种币价跌落，来夺取市场，加强自己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阵地。

很显然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用贬低币价的办法，加紧对于工人的剥削（因为工资决不能跟货币跌价同比例地提高），因此它们在出口贸易中，可以得到一笔额外利润。它们就能以这种得到额外利润的可能为基础，在世界市场上廉价倾销，排挤其它国家的商品。

在事实上，英国从放弃金本位后，在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两年中间，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率，确乎大大增加；它竟从美国手里夺回它世界贸易的第一把交椅。但到后来，其他资本主义国家也就‘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日本于一九三一年底放弃金本位，就使大英帝国不大容易招架。日本币价的跌落，比英镑更加‘乾脆’，在一年以内，英镑跌落了百分之三十，而日圆竟跌落了百分之五十。日货不仅很快地排挤了别国市场



上的英货，甚且单刀直入，砍入英帝国的心脏，英国自治领和殖民地（特别是印度）也感到日货为患了。

直到一九三三年春，英国最大的敌手美国也放弃了金本位，美元价格，一跌再跌，于是英国感觉到自己的武装已被解除。它眼快手快，就来跟美国讲交情；它再三跟美国谈判安定货币。一九三三年夏，就在伦敦召集世界经济会议，会议主要的问题就在如何稳定货币。谁知美国竟严厉拒绝安定货币，那也无怪当时首相麦唐纳要悲哀地叫着‘世界不得不饮尽这失望的苦杯’了。英国这种转挽的企图，直到英伦银行总裁诺曼赴美以后，才遭到最后的惨败。

回头再看美国。美国的资本家并不比英国笨些，他们深知老狻英国并不真个挂起免战牌来作什么“城下之盟”，他们毫不相信英国那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善相’，真有什么好心。自然，他们既然握起武器，终要给英国一个“照面”，杀得它一个‘红白不分’。他们拼命利用美元的跌价，加强自己在世界市场上的阵地；夺回英国于一九三一到一九三二两年内所夺去的市场。一面在国内力行通货膨胀，以谋克服恐慌，恢复繁荣；结果，美国在一九三三年夏季确乎来上一个‘投机的繁荣’，但从秋季起，又跑进‘结实的’不景气和恐慌的死路去了。总看起来，英镑和美元的厮杀，在一九三三年美元确占了上风。

到一九三四年情形，就不同了。英国资本家当然不是力主不抵抗的小厮可比，他们在资本主义危机之中，虽然已经没有什么旋转乾坤的法宝，可是在应付美国货币攻势这一点上，还不是一无办法的。我们记得，当一九三一年英国放弃金本位的当初，资本家们对于币价问题，确有很大的出入。在产业资本家和输出业家，固然力主贬低币价，而在银行资本家方面，



他们因为债权孔多（英国是最大债权国之一），生怕币价跌落，影响债权，所以坚持安定币价。不过到一九三四年，他们碍于国际及内国情势，见到非更进一步运用减低币价的利器不可，所以两方面的意见，就渐趋一致。一九三四年十月，英财政大臣张伯伦曾经宣称，英国必须采取独自的通货政策，英镑集团以内的国家应当建立更加密切的关系，同时应当竭力避免镑价的急性的安定。这些话，就可以看作英国资本家的意见已趋一致的表现。

英镑的价格继续跌落了。自然，镑价的跌落并不全是英统治者有意的勾当。事实恰恰相反，英国国际收支的出超（季节地向美国和别国购买原料），美国短期资金的流回本国，这些才是使镑价继续跌落的主要原因。至于一九三四年英国所用的汇兑平准基金政策却很少作用；而据一部份人的估计，英国三亿七千五百万磅的汇兑平准基金，已经亏蚀净尽了。可是，英国资本家之很愿看见这种镑价自然的跌落，毕竟已是事实。

在另一方面，金镑集团各国的关系的确变得格外密切了，它们的影响也一天一天扩大；到现在镑价的决定，不仅为英国本国的国际收支所左右，并且要受金镑集团各国的国际收支的影响呢。这些英镑国家的继续贬价，使全世界酝酿着通货膨胀的气运；甚至还促成金集团内捷克货币的贬值。

美国怎样呢？自然，它是一不做，二不休的。谁不知道，货币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经济战争的最后一幕，跟着起来的便是“真刀真枪”的军事战争？谁不知道，那在帝国主义的武装厮杀期内，谁保有最多的黄金和别的贵金属，谁便能保证最后的胜利？不错，美国是手屈一指的保有黄金最多的国家（约四十亿金元）；不过，它还嫌不够，它还用平准基金来购进黄



金。

现在我们要注意到美国的购买白银政策。根据我们上面的指明，白银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是很大的，这一点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可以充分看出，在那时因为交战各国竞造银币（特别是英国），银价飞涨，一时顿感着白银的饥饿。美国政府在一九三四年八月九日，公布白银国有令。限期将国内白银，以每盎司〇·五〇一元的价格收归国有。根据该项法案，美国购银数量要达国库准备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五；那就是说，它除掉向国内购银以外，还要向世界市场购入一、一五二、七〇〇、〇〇〇盎司以上。

当然，美国购银程序的目的，并不限于准备大战。罗斯福总统之顺从白银派的要求，还有别种因素。罗斯福总统是热衷于减低币值，以提高物价，挽救恐慌的。而美国的通货膨胀派却又竭力为白银派撑腰，他们主张贬低币价，增发银行券和纸币，收买白银，发行银证券，以提高物价。所以当购银法案公布之后，接着便要发行三亿二千万元的银证券，以购进白银。这种办法无疑地是通货膨胀的一种手段，结果，交易所里美元的价格果然跟着低落了。因此，我们可以说，白银政策是美国近年来应付货币战争的一贯政策的一环吧了。

美国政府这种战术的另一目的，我们应当指明，它是有意于将中国拉入美元集团中去的。关于这，将在下节细说。同时，美国提高银价的结果，使一般应用银币的金本位国家感受重大的威胁。银价提得太高，银币就有被人熔毁，而整个币制加入美元集团的可能。因此，英国对于银价提高，印度卢比发生不稳的消息，是不能不特别注意的。

以上，我们对于英镑和美元的斗争，说得已经很多。我们知道，世界上的货币集团除了英镑集团和美元集团之外，还有



一个金集团，或称法郎集团。属于金集团的国家到一九三四年止，还有法、比、荷兰、瑞士、意、德、捷克、波兰，卢森堡诸国。不过意德波捷诸国已经名存实亡。

如上所述，世界大多数国家已经放弃金本位了，这些金集团国家为什么依然留恋着金本位呢？这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欧陆诸国，战后曾经饱尝通货膨胀的痛苦，不愿再度尝试；同时金集团首领法国是所谓“高利贷帝国主义”，它有偌大的债权，所以也不愿贬低币值，减少债权，同时法国进口税的提高，其他国家的贸易统制，也尽足阻止黄金外流，所以也无用放弃金本位。

然而别国汇兑倾销的武器，终究不大容易对付的。法国在恐慌的初期，虽然表现为繁荣的孤岛，可是近年以来，它的经济情形，已变成资本主义国家最坏的一个。金集团其他国家都是如此。一九三四年金集团各国的工业生产都比一九三二年还低；在那些国家非但谈不到景气的恢复，恐慌的程度还在一天天加深。金集团国家在此情形之下，也在做最后的挣扎。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一天天密接；同时采用种种协作办法，防止金本位的“陨越”。它们于一九三四年十月在比京集会，决议将一九三三年在伦敦所订的协定加以扩充。根据此项协定，法、比、荷兰、波兰、意大利、卢森堡诸金集团国家必须相互援助，保持金币的现有平价。同时再由比利时首倡，此项协定还扩充到贸易方面，规定缔约各国须用必要方法，增加相互间的贸易额百分之十。同年法比两国再贷款荷兰，法国也援助意大利，维持荷意的币价。

这是事实的一面，一九三四年金集团各国经济空前的恶化。使一部份资本家的心理，倾向到通货膨胀方面。在金集团的首领法国，膨胀派在逐渐抬头，比荷各国也因此接连引起内阁风



潮。

国内的情势固然如此，国外的环境更觉险恶。当我们谈到金集团的前途的时候，我们决不要忘掉英镑和美元的斗争。英国和美国对于金集团的态度是极端相反的。美国对于金集团的战术，是竭力想维持金本位国家的现有平价；它怕的是金集团各国脱离金本位，因为这样，它们会马上加入英镑集团。英国对于法国和其他金集团国家则力劝其贬低币值，这样，英镑集团可以扩大了，到那时再来和美国谈国际通货的安定。

我们知道美国在一九三四年底对于金集团通货的安定是用过很大的力量的。它在法郎价格达到现金输送点，即有流出危险的时候，就用它的平准基金，购进法郎汇票。它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借给比国国立银行二千五百万美元的资金。无怪当时英国的报纸要说，美国要握金集团的领导权了。

可是在另一方面，英镑跌价对于金集团的威胁，毕竟太严重了。自从英国放弃金本位后，以法郎表示的英镑汇价，是在不断地低落——从一九三一年九月十九日的一二四·〇五一，直跌到一九三五年三月七日的七〇·九六。上面说过，金集团各国在近年来的经济基础异常脆弱，再加上英镑的继续压迫，金本位的维持确乎万分困难。一九三五年春季，金融基础比较薄弱的比利时，便被迫而放弃金本位了。结果，比币减低币值百分之二十五，同时维持对英镑的比价，事实上即等于加入英镑集团。荷兰的前途，也是很危险的。

这里，我们清清楚楚地看到，英镑和美元的斗争，已经伸展到金集团的范围之内。我们知道，金集团各国，它们在经济组织上，在金融体系上，都比中国强固得多，前进得多；难道在这样落后的中国沃野上面，竟听不见镑元的鼙鼓声吗？



第二节 列强对华货币权的争霸

实际上，列强之间的货币战争，早已波及了中国。就列强对华贸易来说吧。各国厉行通货膨胀，对于国内的劳工，固然加强其剥削；而对于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很显明的，在货币跌价倾销之下，不单中国的民族工业受到重大的打击。中国的农民也在外国廉价农产物的倾销之下，很快地破产。就是这种意义之下，列强正在利用货币跌价的手段，拚命在中国争夺它们的市场，单就一九三三年和一九三四两年英美日三国对华进口额来说，英国仅保持其原有的地位（自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一六·七〇，降为一九三四年之一六·一六），日本则因继续贬低币值，再加上别种政治军事的条件，它在进口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乃从百分之一一·三九升到百分之一三·八七；至于美国就因为它厉行白银政策，继续抑低币价的关系，从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二二·一七，增加到百分之二六·六四。

不过，帝国主义列强在争夺中国市场的时候，只靠它们自身币价的上落来加强它们的阵地，力量还是不够的。比方说吧，英国固然贬低了币价来对华倾销了，而美元的跌价，可以比英镑跌得更凶，同时它还能利用它雄厚的资金，使中国的银价提高，使得银元的购买力较高；这样英国就无可奈何了。可是美国单是这样做法，也是不见大效的，因为日本还有生活程度更低的劳工，可供资本家的牺牲，它可能使日元的价格降得更低；这样美国又能奈何它呢？

所以，帝国主义者若要全般地控制中国的市场，同时全面地控制中国财政金融起见，它们不得不更进一步在中国的货币



制度上，想个彻底的办法。这就展开了列强对华货币权的争霸战。

原来帝国主义对于殖民地的货币，要使它成为自己的附庸，是殖民地经营中不可少的步骤。只有在殖民地货币同化于宗主国之后；然后主属国间的贸易，以及政治，经济上的投资，可以圆满地发展。这种事例，远者如英国之于印度，近者如日本之于东北四省，都是那么一套。

在另一方面，假使一个半殖民地或者后进的独立国家，一旦它的货币作为某种货币的附庸或者说加入了某个货币集团，那影响就非常大的——特别是这这管理通货盛行的时代。比方，倘使中国的货币加入美元集团了，中国的国币每单位规定等于美元的几分之几；那末中美间的汇兑就变成十分稳定；即使有些涨落，通常也不会超过现送点。于是，中国的进出口商人，就会感觉到向美国买卖商品所负的危险比较的轻；因为他们现在只有物价涨落的危险，而没有汇价涨落的危险。在目前，谁都知道，汇价涨落的程度，还要比物价涨落得利害。如此，美国对华贸易自然可以格外发达了。

其次，在投资方面，汇价的不稳定，往往是一个极大的障碍。在目下假使中国人借美金，一旦金贵银贱，便要吃亏——中国过去所受外债汇兑上的损失是谁都不会忘记的。政治借款可能这样的“饮鸩止渴”，商业借款却谁都不敢这样尝试。反之，假使美国人把自己的美金兑成中国国币借给中国人，他就要负这汇兑上的危险。债权人负了这样大的危险借钱给别人，除了政治上有什么特种原因之外，是不可能的。但是，倘使中国加入美元集团了，那么这重难关，便自然而然地打破，美国的金元资本，就可以大量地输入中国。造成它在中国的优势了。



为什么我们说，加入某个货币集团在目下管理通货盛行的时候，所受的影响尤其大呢？比方说罢，假使在各国没有放弃金本位之前，中国就改用金本位了，那末这种改变可以使所有金本位国家都得着贸易和投资的便宜。即使中国国币可以和某一国货币的比例，合成一个整数（即如中国国币二元等于美元一元之类），那末这样所给予那一个国家的便宜，也只有计算的便利，影响是并不十分大的。所以，在那种情形之下，美国必须再使中国把所有的海外准备金存放在它的国际金融市场纽约，然后，它对于中国才有较大的支配力。

反之，象目下的情形，事态的发展，就大大两样了。公开放弃金本位的国家，如英美日三国等；非公开放弃金本位的国家，如意德等，货币价值的涨落，完全操在政府手里。比方，美金的纯金含量，已经一度的减低百分之四〇·九四，后来又要减到百分之三〇。美元的价值，只要经国会的通过，大总统下一道命令执行，就可以大跌特跌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假若中国加入美元集团，美国的金融寡头就可以通过货币，而操纵中国的经济政治，同样的，假若加入英镑集团，英国的统治者就可以通过货币而支配中国的命运。

上述情形是资本主义总恐慌当中，在第二次大战的前夜，由于各国金融机构的崩坏，所发展出来的新的形态。我们知道了这点，才能了解列强，特别是英美帝国主义在各国货币权的争夺上为什么要这样拚个你死我活。同时也唯有知道了这点，我们才能了解列强，特别是英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货币权的夺取，为什么闹得这样“短兵相接”。

我们在上节讲过，世界上现在有三大货币集团，就是英镑集团，美元集团和金集团。这三个集团之中，在世界的规模上，暗斗明争得最利害的是英镑集团和美元集团。至于金集团



国家，它们自身已像“日薄崦嵫”，几乎无以为继，所以也并没有力量向外开拓阵地，它们能够保持自己集团里面的门士，不要临阵脱逃，已算万幸的了。事实上，正如我们上节所说，金集团之在今日，再不是采取攻势的集团；相反的，它们自身已是英镑和美元争取的对象了。

所以，在远东方面参加货币战的，主要的也只有英镑跟美元。不消说得，用机关枪和大炮为后盾的日元，在这里是必须有份的。关于这，我们在下面还要说到。

事实上以中国货币权的掠取为目标的远东货币战争，早就已经开始。在一九三〇年凯未尔顾问团，远涉重洋替中国计划改行金本位。那时在他们所拟的《金本位币制条例草案》里，订定中国预期采用的金本位币“孙”，就等于美元四角。美国在那时的确企图，在使中国改用金本位之后，大大地发展它的贸易和投资，以完成“金元帝国”在太平洋方面的统治。不幸得很，在上述的《币制草案》发表以后，接着就是一个金贵银贱风潮，使这个计划遭受顿挫；再接着就是“九一八”事变，日美间的矛盾使这个计划只好“束之高阁”。我们也可以说，当时美国势力在远东的猛进，尤其是在东三省投资的企图，是促成日本武力攻袭中国的一个因素。

“文明国家”在“开发”殖民地的时候，自然要运用它们最便宜的威力。所以在美国企图用资本势力征服中国的时候，日本只好用它的大炮和飞机。然而，在日本运用武装势力之后，美国也必然要进一步地运用它的资本势力。所谓白银政策，就是美帝国主义运用它的资本势力，威胁中国的一种手段罢了。

一般人对于美国白银政策的估量往往只是偏面的。有人说，罗斯福的白银政策是在取悦于代表银矿主利益的银派议



员，这是对的，然而是不够的；美国的收买白银政策，如果只是为了银矿主的利益，决没有使它世界化的必要，它只须高价收买国内新产的矿银，至多也只须白银国有就够了。现在它要收买世界的白银，无疑的是有向外攻略的意义的。

那末，是不是要提高什么远东和南美人民的购买力呢？不是的，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饰辞，至多也只代表美国一部份资本家的幻想。在中国，是事实俱在，无需赘言的。美国白银政策之在中国，只引起了空前的金融恐慌；它不单没有提高中国人民的购买力，它是更进一步地把中国人民仅有的购买力都摧毁了。所以假使白银政策的目的真个在提高远东人民的购买力，那末美国早就应该改变它的白银政策。可是美国竟不管中国的再三吁请，还是“我行我素”，这就可以表示所谓提高购买力也者，无非是欺人之谈罢了。

所以，白银政策的终极目标，除掉上节指明的为准备未来大战和在国内加紧通货膨胀之外，最重要的，乃在取得中国的货币权，甚至要控制南美和远东方面，采用虚金本位制各国的货币权。罗斯福总统为要替美国在远东和南美开拓广大的投资场所，替美国的产业资本在南美和远东开拓广大的商品和原料市场，并且为了取得世界最大富源中国的货币权，来决定英镑和美元之争的最后胜败，然后提出这样一个为美国整个资本家层谋利益的白银政策。

那末，白银政策到底怎样能够夺取中国的货币权呢？换句话说，它怎样才能使中国的银洋，连结到美元上去呢？我们现在假定，美国的白银收买到相当程度的时候，可能将白银价格稳定下去。假使白银对于帝元能以一定的比率稳定它的价格，那末，中国的银本位币就可以完全跟着美金的变动而变动，中国也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美元集团。这样，美国对华的贸易和



投资，以及由此而起的政治的控制，一定可以急速地发展和加强起来。至于那些采用虚金本位的国家（国内用银，国际用金），也要因为银质的金本位币含值日增，而有被熔化的危险，或者也只有加入跟白银已经发生固定比价关系的美元集团。

美国期望的标准银价，恐怕是每盎司值美元一元二角九分，适合金银比价一与十六之比。一九三五年一月底的银价还只有五角四五分，距离一元二角九分还差七角五分之巨。这表示美国离开稳定银价的日子还很远呢。

一九三五年四月美国工商业界特派商务考察团来华考察。这个考察团虽非官派，可是所负的使命并不算小。它要调查中国的金融，关税，贸易，而特别关心于中国的币制，谁又能说，这次的考察不是为美国决定其对华货币战术而预作准备呢。最可注意的，是考察团刚到中国，美国政府就将银价从六角四分五猛提到七角一分。以后事态的发展，虽然并不十分显著，可是美国政府在向这个方向迈进，那是无疑的了。

上面我们关于美国的战术已经说了好多，现在我们要讲一讲英国的手法。英国这次应付美国的货币战争，是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英国金融资本在远东的前哨——汇丰银行和它的夥伴麦加利银行，大英银行等等，在美国宣布白银国有之后，当中国的金融界感受严重威胁的时候，当中国人民千呼万唤、要制止白银流出的时候，它们却悄悄地把大批白银从上海装运出口，而且大部份是运到香港屯积起来。当时人们还奇怪为什么白银不流向纽约，而运到香港，谁知道这正是英帝国主义的锦囊妙计。它们这样运银出口，在营业意义上固然可说是提防中国政府干涉白银出口，甚至改革币制（如银元贬值，或发行不兑现纸币），同时也可以赚取一切运银出口的利益。

然而，营业上的估量毕竟尚是其次，最重要的意义，还是



英镑对于美元所取“以退为进”的攻势政策。英国眼见美国白银政策：来势颇凶，它便“计上心来”，故意收回自己在华的资本，极力挖尽中国的白银，先把中国的金融和工商业市场彻底地破坏一下；这样给美国一个警告，即使美国能够取得中国的货币权，它在中国也无从发展它的贸易和投资；因为那时中国的市场已经像败军搜括过后的败落乡村一样，仅剩些破瓦残砾了。

自然，英国方面单是把汇丰的存银运往香港，还不足以彻底地破坏中国的金融业和工商业。此外，它还必须采取别种有力的手段。这便是它一反从来对华投资的态度，暂时地不不再投资于中国的工商业，反而要收回资本了。汇丰银行举行拍卖申新七厂的事件，便是英人这种收回资本过程中的众所周知的一幕。一九三四年年关，上海银钱业工商企业，纷纷倒闭，这里汇丰银行的尽力收回资本，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英国“趁火打劫”的任务完成了，一向以“孤立的繁荣”自豪的中国金融业，竟招致了空前的危机，工商企业更像“秋风落叶”一般纷纷倒闭。在这里，英国还可以使中国民众更加抱怨于美国，认定这是白银政策的结果，而造成一种反美空气，这便可以使美国夺取货币权的企图，受到重大的打击。你看，在一九三四年底中国不是已经有许多学者主张要反抗美国的白银政策吗？而中国白银出口增税之举，不是一般的认为是反抗美国的一种行动吗？

是的，中国当局见白银流出影响财政金融太大，就突然在十月十五日明令徵收银出口税，并加徵平衡税。平衡税的订定，用伦敦的白银市价为标准。这是有一部份英人已经趾高气扬地说，中国已经加入英镑集团了。这种说法，自然不免过于乐观，英国的金融资本也决不因此自满，它当然要采取更进一步



的手段。它对于中国当局征收白银出口税，自始就表示反对，因为这样在某种程度以内，会减弱它对中国市场，也即是对美国的威胁作用。同时它更警告中国：中国才能用自己的纸本位去抵抗美国的白银政策；中国也不能有控制汇兑，夺取外商银行——特别是英商银行——营业势力的举动；中国必须放弃凭藉平衡税，以自定汇兑行市的企图；最后，中国必须加入英镑集团，以反抗美国。

这种面面俱到的以退为进的战术，威吓的力量确乎是很大的。美国曾经表示它对于提高银价，将取更和缓的步骤，这就是它不得不将夺取货币权的过程延长。中国呢，在目下情形之下，要减低币值或采用不兑现纸币本位都是很难办到。因此它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向英国求援。据日本报纸的记载，中国政府在一九三四年九月就向英国当局磋商借款，到后来便有英国愿借二千万镑给中国，维持财政和金融的消息。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的上海《泰晤士报》(Shanghai Times)也用特大号字标题，揭载南京政府拟向列强银团(英美都在内)借款的消息。一九三五年春季国际对华借款的声浪，喊得震天价响，而且中国当局也承认有此一举了。这期间，英国无疑地是占领导的地位。

在这里我们要提到英国沙逊爵士的建议。沙逊爵士是上海沙逊洋行的大班，他在上海的地产投机是不容忽视的，他是上海的大地主，所以他对于英国资本势力的突然退出是持反对的态度的；因为那样要造成中国通货收缩的恐慌，而使他的地产跌价，甚至地租无着。他之不愿吃亏，就使他向美国提议改向印度政府购银。事实上要请美国向印度政府购银，只是沙逊爵士的幻想，或者是一种对付中国人的诡计；因为只有向市面购银，美国才能达到提高银价的目的。这样，美国政府对于他



的建议自然并不理睬；可是另一方面却引起了一种相当可能的猜想，那就是说，印度的存银虽然没有卖给美国，却可以利用机缘，装到中国来做补充的用途。英国对华的借款，假如一旦成功，那末据我们的猜想，帐簿上的英镑借款，事实上是要用印度的存银来支付的；这种存银，经过印度或者中国造币厂，铸成一种银质的中国金本位货币，就可以流通市面。再规定这种金本位币，可以依一定的比率，以英镑为最后的兑现。这样，中国就已经加入英镑集团了。

这种猜想，并非全无理由；反之，它的可能已经由沙逊自己的嘴来证明了。沙逊在一九三五年三月底，又发表了他举世注意的“救济上海金融计划书”。他在这里除了竭力指斥美国的白银政策所加于中国经济的威胁，同时赞成维持白银本位，在表面上“讨好”中国以外，就干脆地怂恿中国对英作英镑借款，发行上海镑券，造成中国的银币英镑并行本位的币制，而实际上便把中国拉入英镑的集团。你看他苦口婆心地劝说：

“英镑刻在世界中，为大多数所采用。……隶于所谓英镑集团之各国，皆较他国更为繁荣，此世人所公认”。谁不知道，两三年以来，英国金融资本利用贬低币值的手段，加强对于国内和自治领殖民地人民的剥削，经济状况确比金本位的国家稍微好些？又谁不知道，假若中国也加入英镑集团，那末，所繁荣的决不是中国的民众，而还是伦敦和侨居上海像沙逊一类的大资本家？瞧罢，沙逊爵士在谎话连篇中（他说“如中国准备担负镑券印刷之经费，而照余所拟计划办理之，则实际上，并无借款之必要”。这不是荒唐极顶的欺人之谈是什么？不先借款设立汇兑资金，果能发行镑券吗？）也有不少天真的自白的。比方他说，“余如私人在此可觅取英镑信用。若欲觅取他种货币之大宗信用，则余知其不易。试举一证以明之，余虽不能以



自由公债，或黄金，或白银，抵借上海银元。但余于数日前能以租界中区之地基，借入英镑，但余不能在上海现有状况中，用此项英镑，若在余所拟之计划中，则余当能使用之矣”。这里，我们可以看得明明白白，沙逊的救济上海金融计划，并不真要救济上海的金融，不过要救济自己的金融罢了。自然，我们倘若以为这个计划，完全出自沙逊个人的动机，那又未免太小看它了。沙逊是道道地地的爱护祖国的人物，他的镑券计划，不但有利于自己，而且还有利于英国一般的资本家。他说，“吾人苟考虑在沪所购之货物，与所享之服务，其来自国外者占大部份。……试以旅馆言，其所有一部份费用归于国外，其所置地毡刀叉等物，须随时更换，其所备之酒类，须来自外洋。……而旅馆所有之收入，出自来沪旅行家之囊中者亦复不少。旅客苟能免除当地汇兑之困难，因其所愿……”。你看，他替他“祖国”的贸易多么体贴入微啊。

沙逊爵士不但在说话上是这样认真，他在行动上也够勇敢的。他在一九三五年初，曾借给中国一笔英镑借款，合国币四百万元。他这笔借款，一面可以补救汇丰银行运出资金过急的缺憾，而一面在卖出英镑之际，也可以使英镑对中国国币跌价。这在货币战争中也可以说是预摆一着棋子。

常识告诉我们，在太平洋角逐的主角，是英日美三国；而日本更俨然以东亚主人自居。中国有事，日本须先顾问，英美有话，应先通知日本，这种情形，远之从田中奏摺，近之从天羽声明，都表现得明明白白。那末，日本对于英美在中国的货币战争，竟能“熟视无睹”吗？

决不是的！事实上，英美在华货币战争最近所以更加白热，一大半原因还是因为中国一半已被吞在日本肚里的缘故。英美帝国主义这时因为不可能用军舰和大炮，把已给人家吞下



的部份，重新把它拉来，它们只好争用资本的势力，把残余的部份抓在自己手里。

然而日本连这一点也不能容忍的。不过，它将怎样办呢？英国要把中国拉入英镑集团，美国要把中国拉入美元集团。日本呢，它把中国拉入“日元集团”吧！不，这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所谓“日元集团”，在今日委实太不像样，要把中国拉进“日元集团”，比把中国拉入中日军事同盟，还要困难百倍，因为在国际的意义上，日本的枪杆子确乎比“日元”要强硬得多。不错，日元在近几年来国际货币战争中，常是占到优势。譬如英镑汇价能贬低四成，而日元汇价则能贬低七成，结果英国的市场竟被日货搅扰得七颠八倒。可是，日元的汇价尽管可以尽量降低，日元的力量毕竟还不够跟英镑美元来几个“照面”的。它的金融组织比起英美来，还不免相形见绌，特别是近年来财政赤字的增加，使得日元的力量更加薄弱。所以，日本要拉中国加入“日元集团”，还是够不上的。

那末，还是借款给中国，徐圆控制吧？是的，日本在过去几个月里，也屡扮姿势，装作要借款给中国的样子。一九三五年三月上旬，华盛顿，伦敦和上海三处，同时传出日本对华借款二万万的消息。当时中国当局似乎一度着迷。而中日经济提携，甚且中日经济同盟的消息，就传遍世界。

英美方面顿时紧张起来，两国要人就慎重磋商。美国国务院方面认为“中日经济提携为两国新政治经济同盟；日本对中国予以金融财政上之援助，独占在华势力，以便实行其亚洲政策，其对国际政局之影响甚大”（华盛顿，三月一日哈瓦斯社电）。那时以英国为主动的国际对华借款便重新热闹起来。且看路透社三月二十二日伦敦电讯称：“闻中国当局去夏（按当时美国还没有实施购银法）曾探询英国借款之可能性，当时英



当局视此建议殊难实行。现有理由可信与中国友好之某团体鉴于中国白银大缺，及远东一般之政局，近复向英国探询借款事。此间金融界之意见，中国关税收入，虽见下落，供借款之担保品，仍不难觉得。惟谓以此种债券售于市场之手续，殊不易决定。众信英国主张由旧日之银行团经手，以免日本从而阻梗”。那时伦敦方面对于远东局势，加以密切的注意。丕尔爵士在上院力称英国要须用武力保障英人在长江一带的势力。

实际上，日本要借款给中国，只是日本当局的一种姿势。日本政府在财政方面还是自顾不暇，至于民间财阀，也多非常乖巧，他们都不如西原（经手那笔一蹋糊涂的“西原借款”的）那样的勇敢了。所以日本对华借款是不可能的。它之口口声声说什么“愿予中国财政经济上之援助”者一面是要“讨好”中国，一面是当作拒绝英美对华借款的盾牌吧了。

要中国加入“日圆集团”，在没有使中国成为它完全的殖民地之前，是不可能的，同时，借款于中国也只是一句空话。那末，日本怎样办呢？唔，它方法多得很呢！中日经济提携不是它的有力武器吗？它要用经济提携的口号，使中国沦为其经济上的附庸，使中国成为它一个农业的殖民地。在货币方面呢，它也用“以退为进”的策略；主张自己改用银本位，而结成中日满间的银集团，——在这集团里，日本是一个当然的领袖。英美的资本，固然强盛，而日本的枪炮至少在远东是可以独霸的，因此英镑和美元在华的火并，将来结果如何，日本还是个决定的因素呢。

第三节 “沦为附庸”呢？ “独立存在”呢？

一九三五年六月就在华北事件闹得滚热的时候，英国政府



决定，派财政经济首席顾问李滋罗斯爵士（Sir Frederiek Leith—Ross）到中国来调查财政金融状况，定于八月启程。其后电讯纷传，各国都将派员来华，会同调查。

大概在三月底罢，英美看到中国一定要举借外债，渡过难局。同时据哈瓦斯社电讯，“当时各关系国承认澄清中国货币局势，为借款之先决条件。因此又复提议在南京召开货币会议”。货币会议的发起召集，自然由英国主动。你看，当时“伦敦金融界人士，关于未来南京货币会议，以为议程中将列入一重要问题，即中国货币究应与黄金，日元，美元抑英镑发生联系是也。据此间金融界意见：中国货币与日元发生联系，因政治及技术上之理由，断难办到。至于美元，则因美国货币政策，尚在试验阶段，亦不稳定。故中国货币与黄金或英镑发生联系。惟两者之中，何所采择，则将由何方贷款中国，以作新货币准备以为断。关于贷款一层，伦敦市场上可能性较大，故伦敦金融界期望中国货币必可与英镑互相联系。此事一旦实现，则于英国出口商人极有利益，盖商业中汇兑涨落之危险，从此可以避免也”（一九三五年四月三日哈瓦斯社伦敦电）。上面一段话已经把英国金融资本家为什么要发起召开货币会议的心理，描写得非常透彻。在他们看来，日元集团是不可能强拉中国加入的。至于美元，则用“美国货币政策，尚在试验阶段，亦不稳定”一句话，把他们最强的敌人轻轻撇开。他们只留着一个目前已经无能为力的金集团来做陪客，（我们知道，法郎帝国也并不是不想染指中国，例如上海的法文日报还鼓吹中国向法国借款，加入最为稳定的法郎集团。只因为金集团本身的式微，以及欧洲情势紧张，不容它多管门外事吧了），安安稳稳地得出一个“中国货币必可与英镑互相联系”的乐观的结论。

后来，根据各方面的消息（例如哈瓦斯社六月九日伦敦



电)，英国发起召开的货币会议，因为跟各关系国谈判的结果，认为此项会议无正式召开之必要，而作罢了。这里，自然是因为日本方面坚决反对的缘故；当时伦敦传来的消息，日本是拒绝参加该项会议的。

英国见日本反对开会，就“顺风转蓬”，改用派员赴华，调查中国财政金融的办法。据当时的传说，除英国派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罗斯来华以外，美法意诸国都要遣派要员到中国调查。甚至说日本也将派有力代表，共同来华考察；这无疑是偏面的宣传，日本是决没有跟在英美之后，来华调查的必要的。就是美国，也“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南京方面传称金陵大学教授卜凯，即奉命在华调查，其任务与维斯爵士相等云云，大概也不见得是事实。注意两国对目前的问题更隔了一层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所谓各国代表来华调查，恐怕也只有英国在那里“起劲”吧。

事实所表现出来的也正是那样，各国代表光临中国的也只有英国金融资本的代表维斯爵士。

维斯最初的行程预备经过美国，不过最后终究改由加拿大到日本，再从日本到中国了。罗斯为什么不经过美国，而要先到日本？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而这个事实却表现了英国对外政策的秘密。我们知道，在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里面。英美帝国主义的的对峙是一个基本的对立，英镑和美元的对立，就是这种对立的一种表现。英国在远东方面一向是拉拢日本，反对美国的。这就是说，日本在某几点上虽然也是英国的对手，可是在反对美国这一点上，英国却可以联合一个较小的敌人来向它最大的敌人进攻的，这是第一点。其次，从“九一八”以来，远东已经换了一个天下了，日本已经以一个口头上的主人，成事实上的保护者；计划中的“田中奏折”，在事实上已经可



能产生一个“天羽声明”，甚至产生最近日本驻华北军多田司令的“华北政策”了。这一点，在英帝国主义是不能不考虑的。英国在华的利益，事实已受到致命的威胁；英国资本家是不能放弃在华的利益的，因为这种放弃，无疑就是英国在远东势力的总撤退。中国不保，难道英帝国的生命线——印度就能够安全吗？这里我们看到英日矛盾的尖锐化。

美国，不错，依然是它最大的敌人，而可以作为友人的日本，却已变成一个心腹之患。英国的统治者该怎么办呢？

这样想吧，现在所谈的是一个远东问题，而日本是目前远东的主人翁。在这里，英美如能结成一个联合战线，共同对付日本，本来是一个上策，无奈英美之间的对立太尖锐了，过去的经验，也证明这个联合战线只是一种幻想。英国想用武力来对付日本吧，可惜它的实力，现在已经担当不起这个英勇的使命，特别从“九一八”以来，日本的力量已扩张得很多，英国在远东，几已无力与抗。关于这；英国海军界的权威早已这么估量过的了。尤其，在目前意阿问题闹得这样凶险，英意双方经已都到“箭上弦头，不得不发”的时候，莫说英伦的舰队不能开到远东，英国驻在远东的军舰还要纷纷调防红海地中海一带。在这时候，英国在远东方面正是防御最弱的时候，它还能梦想什么跟日本武力相见吗？

上面说过，英国对于它在远东的利益是不能不保持的。然而它决没有力量，用“硬”的办法来对付日本的威胁。那末，它除了跟日本妥协，希望在日本的掩护之下，保持它一点在远东的利益，还有什么别的路走呢？在这里，我们所见到的，一面是英日矛盾的尖锐，一面是英国势力的衰弱，因此不得不乞助于日本。

英国这种远东政策，我们可以从英国外相霍尔在下院所发



表的演说（一九三五七月）中看得非常清楚。他说，“英国政府深信欲保持中国秩序安定，迅速进步，则第一步必须先促进中日两国之良善关系，第二步则应使中日两国与抱同样利益及目的之其他各国（首先指英国——著者注）共同合作而后可”。再说，“最近华北事变发生，使英日两国友谊偶起波澜，令人为之不安，此层余苟不提及，则对吾日本友人，殊失诚信之道。然余敢深信，令人尤虑之一章，今已结束，英日两国友谊，今后必可继续发展”。同时，更进一步说，“维持门户开放之原则，并完全承认中国有自行控制其国家运命之权利，二者将始终为英国对华政策之广大基础”。霍尔在这里，把英国一面要跟日本妥协，一面又不要日本独占中国的政策完全表露出来了。

不消说得，英国这种政策本身是包含极大的矛盾的。它要维持中国的“门户开放”原则，或者说，它要不让日本独霸中国，就不可能（至少很难能）跟日本妥协。这种矛盾，我们以罗斯这次西来便可以看得清清楚楚。

英国政府的首席经济顾问罗斯爵士八月十日就从伦敦启程来华。据当天哈瓦斯社伦敦电讯，称：“负责方面相信英国政府派财政代表罗斯爵士赴中国调查，其主要使命，可分为两项：一则谋稳定中国之货币，二则使南京政府获得国际借款，由各外国政府予以担保，俾增强中国政府之地位。就第一项使命而论，负责方面相信中国货币可与英镑发生联系，但如确定中国货币对英镑之比价，则不特保障此种比价，需款过钜，且足以危及英镑集团，殊属不易办到。此外，似可模仿阿根廷货币“贝沙”之办法，以英镑作为表现中国货币涨落之尺度，即作为中国标价基准，如是则当属可行。又此间金融界人士相信，唯有中国经济复兴，中国铁道借款方可恢复偿还本息，……



英国所以主张由国际借款中国，以供建设费用，其故实在于此。唯此两项计划，不免遭遇各项困难，第一即为日本政府之反对态度，此层罗斯爵士当力谋加以克复，彼将游说日本政府，俾瞭解英国此项计划，绝无政治背景，其目的仅在改良中国之商业及财政地位，而日本对华贸易当首蒙其益也”。

果然不出所料，“日本政府”对于英国这种计划，是抱“反对态度”的。所以当罗斯爵士于九月上旬一到东京，和外相广田，藏相（财政部长）高桥悬谈的时候，尽管他声明“此行任务纯为调查中国经济，绝无政治任务”；尽管他说，“英政府拟俟本人调查完毕，获得恢复中国经济办法后，即与日本政府联络，实行对华政策”；同时尽管他否认，“英国并无单独借款之意，并愿与日本合作，进行对华各项方针”，可是东京的政治家们总是摇着头，要请英国政府对于“具有特殊性”的中国经济和金融，加以慎重的考虑。他们反对英国要中国加入英镑集团，反对英国借款中国，同时拒绝日英联合借款，他们坚决地指明，中国经济和金融的救济，要以政治的安定为第一义，言外之意，中国的一切，要先让日本在政治上得到完全的支配以后，然后可以谈到改进。

罗斯爵士提出关于中国门户开放的问题，这就是要日本不独占中国，对于英国的利益须作多少让步。日本回答说，日本的商品正感销路太少，日本的人口正嫌密度太高，所以要叫日本“开放”中国的门户，英国先应当开放大英帝国一切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市场，并且一部份地方容许日本移民。日本这种要求无疑是想摧毁英帝国的生命线；同时英国对日本的要求也很少实现的可能。

罗斯爵士在日本差不多吃了一鼻子灰，至少是并没有受到怎样“友谊”的招待。结果，爵士最后敷衍了一下，说等调查



中国以后，再过东京磋商决定吧。

罗斯虽然在“败兴”之中离开东京，可是当他在九月下旬光降上海的时候，却被热烈的欢迎裹住了。日本报纸说，中国人之期望罗斯，有如大旱之望云霓，这话虽太尖刻，然而中国一部份当局和金融领袖毕竟以为罗斯爵士总能多少给他们些出路的。目前罗斯的调查工作已经在上海华懋饭店正式开始。借款的谈判还在进行之中。日本人反对的声浪，不单没有消失，反在一天一天高涨。传说罗斯爵士建议中英共同承认满洲伪国，以为日本允许英国对华借款的条件；据日本军部的意见，这种条件可算是无用的长物，不能“算数”，那末罗斯爵士苦劝中国对于承认伪国问题，作正当处置（见上海各日文报罗斯抵沪时谈话录），也只算白费一番苦心了。至于近来伦敦传来消息英国金融家视对华借款为笑谈，那不过表现事实确有困难，同时对日本作一种姿势吧了。

罗斯爵士游说日本，没有成功，目前日本政府的“反对态度”，好像终究不易“克复”，所以传说英国现正进行单独借款。同时据日本方面的消息，关于货币问题，先想由汇丰银行设立汇兑基金，来安定中国的币价，这样渐渐地联结到英镑方面去。这一着假使真个实现，那末中国在投资，贸易甚至政治上，可以提供英国很大的便利固然不消说得；假若英意关系闹翻，世界大战起来，那中国还要直接地替英镑惨落负责呢！

在另外一面，华北日本驻军多田司令又在分发小册子，确立他的华北新政策了；他要求华北五省在政治，财政和经济上脱离中央，同时建立独立的行政单位。东京方面也在确立所谓以“中日经济提携”为主干的对华新政策了。罗斯爵士跟中国当局的接洽如果得到相当成功，那末华北甚至华南（广东汕头揭扬已有日舰在借端示威）恐怕又会听到日本的炮声了。



在这时候，美国的态度是很可注意的。它在目前英日在华争斗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它竟保持着空前的缄默。这当然是美帝国主义的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秘密无甚希罕，不过是要鹬蚌相争，自己坐收渔人之利吧了。美帝国主义著名的代言人李泼孟（Lippmann）关于中国问题曾表示过他慷慨的态度，他说：“美国新的立场，必须以下列事实来考虑：美国在远东的利害，仅及英国的六分之一。美国在列强对华投资总额中只占十六分之一。……美国在华北的利益是很少的。在上海，英国的利害大于美国七倍；华南连香港在内，美国的利益只及英国四分之一”（Herald Tribune一九三五、一、二二）。这是告诉英国，日本独占中国的倾向，你所受的打击是顶大的；至于我却不大相干。在这里，他要我们相信美国不想向中国侵略，是不可能的；可是他能叫我们相信，美国让英日去正面冲突，自己袖手旁观，倒是可能的。美国表面上要放弃菲律宾，不是这种策略的表现吗？而现在，在货币问题上，它又沿袭了它的“故智”。我们要相信，它之待时而动是必然的。

帝国主义列强都想把中国的货币沦为它们的附庸，这从而的叙述，我们大概很清楚了罢。那末，中国自己怎么办呢？

——就那样沦为帝国主义货币的附庸呢？

——要“自力更生”，要求独立的存在呢？

中国政府从一九三四年白银问题发生以后，为要解救自身的财政危机起见，确乎已经采取很多“惊人”的方案。中间最重要的一着，自然要推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的改组和扩充。目前这三大银行已成“三位一体”，作为政府的财库了。三行改组之后，因为大部份现金准备已经集中到政府手里，所以政府方面就用全力集中发行，一面限制其他银行发行钞票，一面扩充中央银行的发行，并且在香港，汉口，重庆等处设发



行分局，用最大的力量推行中央银行的钞票。同时中央军队还可以担任推行中行钞票的开路先锋，“师之所至”（过去如四川、贵州、甚至云南），“中行钞票随焉”。一九三五年九月，四川当局遵中央命令，把全省地方银行所发钞票，照八折用中央银行钞票收回，限期肃清。当时四川贸易受了很大的打击；特别是一般农民，他们手头都是些“地钞”，二扣的打击，已经不少，除此以外，他们还要经过重重的回扣呢。这样，民众的不满就日甚一日，重庆邻近的县份，有些地方银行的办事处还被人民打毁呢。

中国政府这样雷厉风行，推广中行钞票；同时因为财政竭蹶，就有人推想政府会走通货膨胀的路。政府当局对此虽然慎重否认，屡次宣布政府要用全力安定货币；可是传说的力量毕竟太大了，一般人终觉得“惶惶如也”。特别是一般靠工资过活的工人，靠薪水过活的职员，靠饷银过活的兵士，他们听了通货膨胀，说要把他们原有的薪工打上一个折扣（因为货币跌价），同时物价又要腾贵（也因为货币跌价），他们还能过活吗？莫说这些大多数的下层人民，就是一部份银行家们也觉得这种办法不妥，因为中国如果真正实行通货膨胀，那就等于滥发纸币，东三省的奉票和山西省的晋票，都是最好的先例。到那时，莫说一般平民过不了，就是银行，钱庄，商铺，也要因为民众极度的不安，市场的彻底破坏，而纷纷关门的。

此外，列强资本家对于中国实行通货膨胀也是反对的。帝国主义列强尽管它们自己愿意行通货膨胀，贬价倾销；尽管它们在华的银行要拚命增加发行；然而这些都和中国自行通货膨胀是不相干的。它们怕自己投资的损失，和贸易的逆转，所以对于中国通货膨胀，绝对不能赞同。你看英国的金融资本家对此问题的意见吧：“此间（伦敦）金融界对于中国通货膨胀之



谣言，意见不一。大多数人以为中国前曾有此谣言，并未实现；今日中国状况，并未较当时更为恶劣，预料在英国经济专家罗斯爵士将游中国之时，中国未必在其通货上作新尝试也。但亦有人以为通货膨胀终不能免，中国现已着手以人为的方法，固定中国币价，使在世界银价之下。目前谣言，殆为货币委员会建议铸造镍质辅币所致。众觉此种建议，未必能辅助中国之财政，公共信任缺乏之增甚，或为大规模代币计划之预兆。众信此种谣言，势必鼓励投机，损害事业，中政府若发表负责言论，消灭谣诼，则殊可欢迎也”。（路透社伦敦七月三十一日电）。

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正式实行通货膨胀，确实也表示反对，可是他们毕竟力量大，威势足，假若中国真个实行通货膨胀（公开地或秘密地），那末外国的货币——尤其是英镑，或代理英镑的港币，就会像日圆之在吾东北，英镑之在吾广东，东方汇理银行钞票（法）之在云南一样，马上就会流到长江流域各省，作为主要支付的工具的。这样看来，中国的通货膨胀，除了对于财政金融是否能够真有帮助，还是一个疑问之外，它对于一般下层的人民，定是一种空前的祸水；同时它又会更快地促成中国货币之殖民地化，那更是无疑的了。

因此，我们说通货膨胀决不是个“自力更生”，争取中国货币制度独立存在的大道。

其次，有人说中国可以采取金本位币。中国政府在一九三四年要求美国当局缓购白银的时候，也提出一个近于滑稽的办法——就是用中国的白银掉换美国的黄金；这样来作实行金本位的准备。谁都知道，中国是用银的国家，黄金的储存可以说少得可怜；再加上近年对外贸易不利，对外支付的黄金，一年多似一年。以这样绝无黄金准备的国家，要想实行金本位制，



莫说人家会笑我们不识潮流，逆水行舟；就是我们自己，连这样的梦也都不敢做的。

此外，很多人主张中国采用虚金本位。这种办法是否能够办到，我们暂且不谈，假若中国真能用自己的力量，完成一种虚金本位（事实上恐怕不要自己的力量，人家会替我们这样办的），那末在通货管理盛行的今日，这种名义上独立的货币制度，不是和金集团连结，定是给美元集团“强奸”，要不然便只有投到英镑的怀里去了。因为在虚金本位之下，中国的货币总要用一种强有力的外币来做标价的尺度的，你用什么做标价的基准，那末你就跌入谁的陷井里面。因此，虚金本位也决不是“自力更生”，独立存在的货币制度。

那末，中国的货币，到底怎样才能维持其独立的存在，怎样才能不沦为人家的附庸呢？

我们以为，这个问题并不能从货币本身来解决。谁不知道，列强对于中国货币权的争夺，仅是帝国主义宰割中国民族的一幕；而中国货币本身的脆弱和紊乱，也只是中国整个经济结构所必然产生的现象之一。谁想单从货币本身来解决中国的货币问题，谁就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庸医。只要中国民族能够真正独立，只要中国工业和农业的生产真能大规模的发展，只要对外贸易的平衡，能够急激地好转；只要黄金的生产能够大量的增进；只要国内的贸易因为大众购买力的扩大，而飞速进展，那末中国的货币就不但能够维持它的独立，那些帝国主义者亦不敢来觊觎了。在这里我们除了英镑美元，法郎和日圆之外，对于那在社会主义的苏联日益巩固的卢布，是有研究的必要的。不过，我们这里因为篇幅有限，不能多说了。



世界经济研究



当前世界经济研究的根本任务^①

我们这次会议是在我们国家正进入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期举行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方针。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所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从今年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来。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我们要为“完成这个伟大的历史任务作出最大的努力”。这就为我们正确开展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这次会议总的任务就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进一步解放思想，总结经验，制定世界经济学科八年规划，推动和组织全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更好地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现在我就当前世界经济研究的根本任务及与此有关的问题，讲几点意见，供同志们参考。

一、必须把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放在 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首位

当前，全党全国人民的工作着重点正在转移到社会主义现

^①本文为1979年7月11日在全国世界经济学科规划会议开幕时的讲话。



代化建设方面来。我们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必须适应这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而且它本身必须实行一个带根本性的转变。为此，首先必须把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放在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首位，明确地把它规定为我们整个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中心任务。这次《规划》修改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把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最为密切、意义最为重要的课题作为我们今后七年研究的重点，以便集中优势兵力，保证这些重点研究任务的完成。

这些重点研究课题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方面：

第一，各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道路、方法和特点。各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为了发展本国经济，实现经济现代化，都采取一些重要的战略决策和战略步骤。研究它们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对于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具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我们既要研究各国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共同存在的问题，对于带有普遍规律性的现象加以科学的总结和理论的说明，又要研究这些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所出现的特殊情况 and 特殊问题。我国实行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因此我们首先必须着重研究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理论、路线、方针和具体政策，同时，也必须研究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的经验，以便有选择地、有批判地为我所用。

第二，从一个部门、一个方面、一个问题的角度，研究各国实现经济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作为我们的借鉴。例如，研究几种不同类型的国家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道路，以及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的方法，这对于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发展整个国民经济，都有极重要的意义。

第三，加强对未来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的研究和预测。这对于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极大。因此，我们要加强对今后五年、十年，以至二十年世界经济形势的近期、



中期、远期预测，加强对当代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特征和作用，加强对战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的新特点等问题的研究。这些课题对于贯彻执行毛主席和周总理为我们制定的外交路线，巩固和扩大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反对侵略战争，争取一个对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关系极大。它们是间接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

我们强调世界经济研究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决不是说我们可以满足于就事论事地总结外国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具体经验，毋须把它们提到理论的高度，探索其一般的和特殊的规律了。恰恰相反，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要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就必须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从中引出客观事物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到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说明。我们占有的资料越丰富，对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了解越深刻，对这种规律性的说明越科学，对四个现代化的借鉴作用就越大，就越能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就研究单位和研究人员来说，便越能起到参谋和宣传员的作用。那种把理论研究和为四个现代化服务脱离甚至对立起来的观点无疑是十分错误的。

由于世界经济在我国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又由于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使这门学科的建设任务在今后七年中显得格外艰巨，格外重要。世界经济不等于外国经济，也不等于国别经济的简单的总和。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是研究世界范围经济生活运动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应当对各国经济和经济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诸如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态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三个世界之间的经济关系、资本国际化及其新的发



展、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及发展、发展中国家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及其前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和具体道路、民族主义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经济一体化和集团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等等），进行综合的比较的研究，以探索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我们要以无产阶级的科学精神和革命勇气，大胆地去创建和发展世界经济这门学科，而这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又必须密切联系实际，在世界经济、政治斗争过程中，在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完成。只有丰富多采的实际生活和斗争才能为世界经济学科的成长提供阳光和沃土。脱离世界经济生活实际，单凭书本，关在书斋里苦思冥想是不可能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的。在今后七年中，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在方法和学风方面必须来一个大的转变。既要克服本本主义，又要克服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真正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基本观点和方法，真正面向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密切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地去研究新现象，解决新问题。这样才能适应当前和今后迅速发展的形势的需要。

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正式确定了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重大方针。根据这一方针，我们经济理论工作者在今后一个时期内，要着重研究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关于国民经济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理论和方法方面的问题。

（二）经济体制问题。包括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的关系，中央、地方、企业之间以及企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计划制度和企业管理制度等问题。



(三) 经济结构问题。包括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工业和农业内部各部门的比例关系，生产部门和非生产部门之间的比例关系，积累和消费的比例关系，交通运输、流通环节的比重，也包括人民生活 and 人口、就业、物价等问题。

(四) 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与现有企业改造相结合的问题，自力更生为主与利用外资的关系问题，以及增加出口与增加进口的关系和增加外汇收入等问题。

在所有这些方面，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都要紧密地结合国内的实际，对世界经济领域内的有关问题，有计划地进行调查研究。在调查研究时，经济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必须密切协作，互相配合。

今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外经济关系和对外学术交流的日益增多，将会有更多新情况和新问题等待我们去研究。我们永远要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这种唯一科学的方法去进行世界经济的研究工作，以期对发展我国的现代化社会主义经济作出应有的贡献。

二、为了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 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粉碎“四人帮”两年多来，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在思想上得到了大解放，特别是经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世界经济研究战线生气蓬勃，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但是，同活生生的客观实际相比，同党和人民对我们的要求相比，我们的认识还有很大差距。如果我们真的而不是假的要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

粗看起来，似乎林彪、“四人帮”设下的所谓“崇洋媚



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那一套陷阱已经统统被挖掉了；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向外国学习，需要研究外国的经验，作为借鉴，这个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但是实际上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在这方面设下的“禁区”，仍然在不同的程度上存在着。

在科学、理论领域里设禁区，其创造发明权并不属于林彪“四人帮”。它是古已有之的。一般说来，这类“禁区”是人们迷信和愚昧的产物。或者说。它们是孪生儿女。这类“禁区”的多少，它的广度和深度，与人们的迷信、愚昧成正比，而与人们的觉悟程度，人们的文化科学水平成反比。人们的觉悟、文化科学水平越高，以及基于这种水平的理论勇气越大，“禁区”就随之越来越小，以至逐步趋于完全消灭。因此打破和消灭“禁区，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必须付出长期的、艰巨的努力。

那么，目前在世界经济领域里还存在哪些未打破或者还未彻底打破的“禁区”呢？

举例来说吧，许多同志现在对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管理和科技发展方面有着可供我们借鉴的地方并不怀疑了。但是，这并不等于在这方面问题已经得到了彻底的解决。比如有的同志承认资本主义国家在企业管理等方面有着科学的、可取的一面，但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完全是自发地盲目地进行的，他们看不到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发展经济的重要调节作用，看不到在拚死相互竞争，扩大无政府状态的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力图在某些方面实行一定的计划，看不到或者不屑于对当代各派资产阶级经济学说对战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作用作仔细的研究，而用“庸俗”、“反动”等帽子，一骂了事。



再如对于第三世界国家在发展民族经济道路上取得的成就，我们给以充分的肯定，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第三世界国家一般都底子薄，人口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他们在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上既有成功的经验，又有失败的教训，都值得进行认真的总结。一提到向外国学习，就只注意学习人家的长处和经验，不注意研究别国的短处和教训；一提到现代化就只注意研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而忽略对第三世界国家有关问题的研究等等，都是形而上学在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中的表现。

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必须完整地、准确地去领会和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基本原则。我们要十分坚定地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基本观点和方法去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但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或词句，以及我们党的某些政策，作为我们研究工作的出发点。我们的出发点只能有一个，就是实践，就是观者存在的实际。如果我们不顾实际情况，只抱住马克思主义个别词句不放，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僵死的教条，而不去对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客观实际，创造性地分析研究，提出新命题，得出新结论，那么我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不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研究工作，而是一种没有用的无效劳动，我们的党和人民决不需要这样的研究工作。同时，如果我们把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任务，只限于搜集外国经济资料来论证我们党的某项现行政策的正确性，而不能随着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出现，跟踪探索，加以认真周密的分析研究，提出适合这种新情况的新观点、新命题，提出解决新问题的新方针、新方法，供党的领导作参考，那么，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就不可能在党和政府进行有关决策时起到应有的参谋作用。在这



里，我们必须正确处理科研与宣传的关系。它们两者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宣传的任务是着重解释和论证已经确定的正确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种宣传也必须结合实际，必须以必要的调查研究为基础。科研的任务，则除了科学地论证党的正确方针、政策外，主要地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基本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当前存在的新现象、新问题，以便形成新论点、新结论，创造性地发展既存的理论，以便指导我们进行适合于新情况、新条件的革命和建设。总之，我们要充分理解党的领导与人民群众利益的一致性，理解理论与实际的统一性，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人民利益出发，创造性地进行世界经济科研工作，为四个现代化作出切实的贡献。

我们所说的解放思想和在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中坚持四个基本原则，相互之间是完全一致的关系。它们是互相促进的。今天我们所说的解放思想就是要摆脱一切非无产阶级的，首先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精神枷锁，回到无产阶级的，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轨道上来。不破不立，又破又立。在破中立，在立中破。而在目前，解放思想首先就要肃清林彪、“四人帮”以极左面貌出现的反革命集团的流毒，批判他们所鼓吹的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专制主义，冲破他们在思想、理论、政策方面给我们设置的种种“禁区”。这样才能在研究工作中真正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也只有这样，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才能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贯彻党的外交路线做出应有的贡献。一方面，我们要防止那种在“解放思想”幌子下，在研究工作中偏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偏离社会主义道路的错误倾向。这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从世界经济研究的现状出发，更为重要的，是要彻底摆脱套在我们脖子上的一切精神枷锁，打破因循守旧的老一



套，既不“唯上”，也不“唯书”，而只“唯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研究世界经济领域内的新现象和新问题，创立新观点和新见解。这就是我们全体世界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主要任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七年左右的时间内，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打一场名符其实的翻身仗。

三、严格按照科研规律搞 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

为了有效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我们必须结合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特点，严格地按照科研规律办事，尽快地把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搞上去。为此，我们需要：

第一，大力加强调查研究，系统地、周密地掌握资料。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和任何研究工作一样，要在大量掌握第一性资料的基础上，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地去发现和认识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然后再在实践中予以检验。但是世界经济研究又和其他研究工作不同，它的研究对象主要在外国。为此，我们在《规划》中强调要做好两项工作：一是有计划地选派科研人员出国考察和进修，就地进行调查和研究，大量地系统地搜集第一性资料；二是加强图书资料工作，逐步地筹建世界经济资料中心，协调各有关部门、单位的资料使用，使已经搜集到的资料得到充分利用。可以说，大力加强调查研究，搞好资料工作，是保证《规划》得以实现的物质基础，是把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搞上去的一项基本建设。

第二，要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和方法去揭示世界经济领域内各种事物运动变化的规律。事物的变化，固然主要地是由于内部矛盾的发展，但外部条件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战后，随着各国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发展，随着资本的进一步国际化，各种



国际经济现象之间的联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我们只有不但掌握了事物运动的内部原因，并且研究了各种外部联系的总和后，才能揭示其发展变化的固有规律。如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再生产周期的研究，我们一方面要从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这一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出发，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过剩的实质，同时又必须看到，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以及通货膨胀等经济因素和各种政治因素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影响，这样才能充分认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再生产周期的规律及其新的特点，作出比较合乎实际的科学预测。

第三，世界经济研究要与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研究相结合。世界经济是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密切相关的一门学科，也可以说，它是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分支科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世界经济研究提供了基础理论，以及一系列经济范畴和经济概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使我们在从事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时候，易于透过事物的现象，抓住事物的本质。因此，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要十分注意学习和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与此同时，对世界经济的深入研究，又可以充实和丰富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二者既密切联系又互相促进。马克思在创作《资本论》的时候，就曾经对英、美、法、德、俄等国家的经济进行了广泛的透彻的研究，用它们的大量的具体事例，极大地丰富了《资本论》所要阐明的原理，在这方面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

第四，必须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鼓励大家发表不同意见，以实践为依据，广泛地开展学术讨论，这是使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欣欣向荣的唯一正确的领导方法。例如，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应该如何研究？三个



世界划分的经济依据是什么？苏联经济改革的性质和效果如何？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是否一文不值，毫无合理的、可取的成分？等等。这些问题都应该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讨论或者辩论，得出比较符合实际的正确看法。要坚决实行“三不主义”，坚决反对“一言堂”。

第五，科学与迷信根本不相容，“科学无”禁区。正如上面所说那样，这一点对于搞好世界经济研究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

第六，要允许科研工作有失败，允许科研人员在研究工作中犯错误和改正错误。在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中，例如对世界性的或某一国家的经济危机的预测，由于实践中出现没有预料到的情况以及其他种种原因，需要改变原来看法的事是常有的。我们对学术上犯错误的同志（是否真犯错误，还要由实践来检验）决不能打棍子、扣帽子、抓辫子。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应当在工作中充分发挥独立思考的作用，努力培养自己独立地、创造性地进行科研工作的能力。要敢于提出有所独创的、哪怕是不成熟的意见。只有这样，才能使那些尽管最初并不完整和完善，但却颇有科学价值的新思想、新理论和新观点，不被扼杀在它们刚刚诞生的摇篮里。也只有这样，才使人们能够不畏艰难险阻，勇往直前地去攀登科学的高峰。

第七，个人研究要与集体协作、集体讨论相结合。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科研制度的优越性。世界经济研究如同其他科学活动一样，都必须经过人的逻辑思维活动，个人的脑力劳动在研究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重视个人独立的研究活动。我们要采取各种有效手段，突破一切旧套子，尽极大的努力去提高现有世界经济研究人员和资料人员的水平。另一方面，在个人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集思广益的集体协作和集体讨论，又是十分必要的。今后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科研手段的现代化，集体研究的成分可能不断增多，愈来愈占重要地位。但个人的独立思考和深入研究仍然是基础。片面地、过分地强调集体研究，常常容易抹杀个人的独创性，不利于科研工作的蓬勃发展。事实证明，许多科研任务只要经过个人努力，个人是有条件去胜利完成的。马克思的《资本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这样一些划时代的光辉著作也都是与马克思和列宁个人进行的艰苦的、创造性的研究活动分不开的，而且突出地表现为他们个人的科研成果和智慧的结晶。我们反对吃大锅饭。但同时我们又强调在一个单位、一个地区、一个方面，在个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分工和协作。如果只有个人研究，而缺乏科学的分工和协作，必然会出现不必要的重复劳动，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不能形成一个科学的研究体系，阻碍一些重大问题的深入研究。这也正是目前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中严重存在的问题。我们这次会议，除了要对《规划》作出修改外，一个重要任务，是落实《规划》中列出的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的承担单位。否则，即使增设了一些机构，也还不能真正形成科学的研究体系。总而言之，我们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科研制度的优越性，使个人研究和集体协作、集体讨论合理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个人和集体两个方面的积极作用。要适当组织优势兵力对若干重大问题进行“攻关”。

第八，科研规划、科研项目要与科研人员个人研究方向、长处、兴趣相结合。就一个科研单位来说，制定科研规划应尽量照顾到本单位科研人员的特点，使规划订得比较合乎实际，切实可行，有利于发挥科研人员之所长，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就科研人员来说，个人的研究又必须为完成本单位规划规



定的任务或国家交给的任务而努力，而且要把后者放在自己工作的首位。那种片面强调个人兴趣，对于党和国家交给的紧要研究任务采取漠不关心、推托敷衍的态度，是对党和人民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很不好的。此外，我们要努力做好世界经济科研战线上各个研究会的工作，进一步调动广大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的积极性，提高他们的研究水平，为完成党和国家提交的任务团结前进。

第九，要保证科研人员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时间是搞好科研工作的极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党中央提出要保证科研人员至少每周有六分之五的时间搞科研，这反映了科研规律的要求，完全正确，非常必要。科研人员整个一生能够从事科研工作的时间是很有限的。而任何一项比较有价值的科研成果，都需要科研人员注入大量的辛勤劳动，从而需要大量时间。伟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研究经济学。尽管他几乎用了大半生的宝贵时间来研究和写作《资本论》，但直到他去世以前，他尚未完成《资本论》的全部工作。《资本论》第1卷于1867年问世后，马克思于1883年即与世长辞，幸有恩格斯整理马克思遗稿，才使《资本论》第2、第3卷得以在1885年和1894年分别出版。我们必须充分了解科研工作的这种艰巨性。现在，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肩负着极其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而我们队伍的平均年龄却已达到四、五十岁。为了使科研人员在有限的工作时间内多出成果，多作贡献，应该尽量保证他们的科研工作时间。科研人员参加一定的社会活动和政治学习是完全必要的，但决不要让他们参加过多的社会活动和那种形式主义的并无实效的政治学习。要尽可能减免他们担负的行政工作和开会时间（学术会议除外）。

第十，党的领导要引导全体科研人员按照科研规律搞好科



研。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能否很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与这个单位的党的领导密切相关。我们建议各级有关党委在领导世界经济科研工作时，决不要单纯地靠行政手段，而应该引导大家按照科研规律来开展科研工作。党委领导同志要尽可能参加一点科研工作，懂得一点科研人员的甜酸苦辣。这是十分重要的。要把政治思想工作渗透到科研业务中去，解决具体思想问题，使科研人员逐步地做到又红又专。行政后勤部门要为科研服务，为完成科研任务创造必要的物质条件，保证科研任务的完成。

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搞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更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则要求我们按照客观的科研规律办事。让我们在党中央领导下，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五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精神，认真地讨论和制定世界经济科研规划，并在各地党委领导下，团结合作，密切配合，坚决贯彻执行这个规划，为服务于我国的四个现代化，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进一步解放思想，落实世界经济 济科研规划

——1979年7月20日在全国世界经济
学科规划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

今天，在全国世界经济学科规划会议即将胜利闭幕的时候，我还想着重讲一下关于进一步解放思想的问题。然后，就与《规划》执行有关的几个问题，讲几点看法。

我之所以要着重讲解放思想的问题，是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得到比较彻底的解决，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发展与进步将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了达到篡党夺权的目的，批了多少年的所谓“崇洋媚外”、“洋奴哲学”、“卖国主义”，把许多人关的关，赶的赶，使世界经济研究领域成为一个重灾区。对世界经济研究领域状况的这种估计，使我们不能不把解放思想的问题放到一个更宽广的范围和提到战略的高度上来，认真地加以考虑和解决。经过这两年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们在解放思想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打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设置的各种框框和“禁区”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我们要一切从实际出发，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研究世界经济的新现象、新问题，寻求其规律性，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理论，有效地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那么，当前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内，有哪些问题还在阻碍



我们思想的解放呢？我认为，这样的问题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对于资本主义世界的估计问题。列宁曾经讲过，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帝国主义的垂死性是否就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将会立即或者很快死亡呢？根据列宁逝世以后半个多世纪的世界实际情况来看，资本主义制度确实进入了老年时期，确实在走向死亡，并且归根结底是定然要死亡的。但是，它在现在和今后一段时期内，却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在阶级社会里，一般都有两个主要的敌对阶级。比如奴隶社会有奴隶和奴隶主，封建社会有农奴（或封建农民）与封建主，资本主义社会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敌对阶级都在实践中间，在互相斗争中间积累经验，增长才干。统治阶级统治的经验在增长，被统治阶级反抗的经验也在增长。比如，在奴隶社会，奴隶主从镇压奴隶的起义里，增加了统治的经验，奴隶则从和奴隶主的斗争中增长了才干。奴隶社会是如此，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在阶级剥削社会，统治阶级总是随着自己的老化，从最初的生气勃勃的新生力量变成一种落后的阻碍历史前进的反动力量。一方面，它变得越来越虚弱，越来越愚蠢；另一方面却变得越来越有经验，越来越狡猾。被统治阶级则一方面越来越受压迫，另一方面越来越觉醒。这是历史的辩证法。目前的情况是，资本主义虽然已经进入了老年和垂死阶段，但还有一定的生命力，在一定时期，有过并且还会有较快较大的发展。这一点，列宁本来已经预见到了，后来却被斯大林否定了。在这点上，列宁是对的，斯大林是错的。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起有落，封建社会何尝不是这样。比方在中国，封建社会存在了两千多年，就曾有过几次大起大落。秦皇朝最初生气勃勃，到后期就不行了。刘邦当了



皇帝，他凭着自己的经验，特别从陈胜、吴广那里学到了不少东西，实行了让步政策，对生产关系进行了某些调整，安定了社会秩序，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汉朝以后，魏、晋、南北朝越来越没落。到隋、唐，又使封建社会得到发展和巩固。特别是唐朝，从农民运动中学到了一点东西，让点步，局部的调整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使生产力得到了发展。唐朝以后，到宋朝，经过南宋，又趋向没落。朱元璋本人是农民起义的领袖，建立了明朝，也局部的调整了封建的生产关系，又强盛起来了。从中国封建社会几起几落的事实中可以看到，封建统治阶级也并不是那么愚蠢的，它会向被统治阶级学习，会在基本上确保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调整封建生产关系，调整上层建筑，使生产力恢复并有所发展。

资本主义也是如此。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发展，起落很多、很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的苏联，同资本主义世界相对立。随后，发生了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资产阶级着慌了。什么社会民主党的改良政策呀，罗斯福的新政呀，直到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等等应运而生，目的都是想挽救资本主义的生命。其中有些措施也确实发生过一点作用。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资本主义并没有真正缓过气来。二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特别在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邦也搞起社会主义来了，这在世界历史上是一个伟大的事件，使国际资产阶级吓坏了。经过一阵慌乱，国际资产阶级又变得聪明一些。他们更多地不是采用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那套法西斯的统治方法，而是采取社会民主党的、工党的改良主义，搞国家资本主义。你们社会主义搞计划经济，我也搞“计划经济”。按照我们传统的概念，资本主义生产就一个企



业而言，是有计划的，但整个社会是无计划的，是无政府状态的。但是，后来，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一方面，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部的计划变得更加周密；另一方面，在国家的干预和调节下，垄断资本力图使社会生产带有一定程度的计划性。这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向社会主义学来的。你搞计划，我也搞计划；你讲改善群众生活，我就搞福利主义，搞高工资、高物价、高消费。物价上升了，工资也提高了，当然，这也是工人斗争的成果。现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也鼓吹经济民主，工人参加管理。例如，日本丰田汽车厂的工人可以参加管理。丰田的厂长、经理们逢年过节还拜访工人家庭。他们让工人买股票，说你也是丰田的主义，丰田是你们的，你们要永远当“丰田人”，使工人当“丰田人”而感到自豪，好永远保护这个厂，保护资本主义制度。你们看，资产阶级不是越老越有经验了吗？今年2月我到瑞士去开会，看到瑞士的所得税达到80—90%。西欧不少国家失业保险基金很高，有的国家失业工人第一年最高可以得原工资的90%，第二年拿80%，第三年拿70%。所以，现在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确实处于低潮时期，因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那一套、改良主义那一套搞得很厉害，欺骗性很大。我们在日内瓦参观时，看到瑞士联邦议会两院开会，除议员席外，还有记者席，外交使节席，还有群众席，群众可以自由列席旁听。在联邦大厦，在议会和政府委员会门口没有一个警察，群众可以随意进出。谁都可以列席议会和政府委员会的会议。当然，他们这种民主是资产阶级民主，是假民主，是一种带欺骗性的民主，因为这种民主的目的是为了维护资本的统治。但是，他们却在十分认真地实行这种欺骗，相当有效地使群众上当受骗。所以我们说，国际资产阶级还有力量，他们老练、狡



猾，他们还拥有强大的生产力，特别是支配着现代科学技术这个强大的生产力。他们确实老了，但还可以吃点补药，还可以延长点寿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福利社会、人民资本主义等等就是这样的补药。这套东西有两重性，一方面使资本主义延长寿命，另一方面，使它更接近于社会主义革命的大门。资本主义是终究要灭亡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终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这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不能把帝国主义的垂死性理解得那么机械和死板，不顾客观实际，肯定它很快就会灭亡。老的资产阶级在挣扎，各种类型的新的资产阶级在产生。现在看来，在短期内推翻全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能性不大。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激烈、最彻底的革命，它要消灭的是整个私有制度和剥削制度，因此，也是一场最艰巨的革命。资本主义推翻封建主义。仅仅是以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它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尚且要花几百年的时间，无产阶级要在世界范围内推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自然必须作长期的艰巨的斗争。在一些国家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还要和国际资产阶级打很长时期的交道。对于这一点，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估计。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从十月革命到现在还只有62年的历史。比起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来，可以说，社会主义还处于幼年或少年时期，初创时期，或者说，还处在探索道路的时期。我们前程远大，但空白和未知数还极多。“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转移”^①，斯大林的这句话是正确的。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国际环境中，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进行社会主义建设，都需要并且可

^①《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文译本，第122页。



能采取不同的形式，方法，走不同的具体道路，尽管它们在本质上和基本原则上是相同的。列宁、斯大林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时苏联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之中，14个国家一下子打了进去。其后不断受到封锁、破坏和威胁。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又向它发动了全面的进攻。苏联的经济管理体制那么集中，那么优先搞重工业，搞军事工业，究竟对在哪里，错在哪里，我们要结合它的具体历史条件作深入具体的研究。我们新中国是打出来的，我们有建设新民主主义的解放区的经验，但建国初期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没有办法，只能学苏联。最初我们几乎是一切照搬。果然有成绩，但同时也出现了问题，农轻重的比例关系不适当，中央集中得太多了。毛主席总结了这一段的经验，提出要以农轻重为序，两条腿走路，要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但我们的体制基本上还是苏联的模式。30多年来，南斯拉夫根据自己的国情，摸出了一条搞社会主义的新路，叫做工人自治或社会主义自治。它最基本的特点是较好地体现了社会主义民主。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如果人民不能真正当家作主，而是由少数领导人作主，这些领导人甚至享受种种特权，由社会的公仆变成了社会的主人，那么，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南斯拉夫叫作社会所有制），就不是名副其实的公有制，至少是不完全的，或者很不完全的公有制。整个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也就会带上大量旧社会的残余。这样，社会主义就一定搞不好，这恐怕是一条非常重要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探索。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党中央强调充分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本原因。

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是多种多样，十分复杂的。据我个人看，总的说，目前是左、中、右；两头小，中间大。这



个“左”就是我们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那个“右”就是有些国家和地区还在保持封建制，甚至奴隶制，实际上还在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中间派是大多数，他们当权的民族资产阶级正在争取和维护民族利益。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有的正在推行国家资本主义，有的正在搞国有化，有的则正在利用外资和外国技术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有的则正在逐步走上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所有这些国家，一般说来，都面临着超级大国和新老殖民主义者，特别是霸权主义的渗透、侵略和威胁。他们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成为目前世界人民反帝、反霸、反殖斗争的主力军。他们是当今世界上一支重大的进步力量，但同时它们主要的又是资本主义的后备军。我们说，在世界范围内生长着新生的资本主义，主要就是指的这部分力量。他们是我们的同盟军，其中多数是可靠的同盟军。在反霸斗争中。要贯彻反霸统一战线的方针，我们同他们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我们是第三世界的一员，属于发展中国家，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反帝、反霸、反殖斗争中，我们和他们生死与共，互相支援。同时，他们有许多经验，包括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借鉴。

在解放思想方面，我们都要努力学习马、恩、列、斯、毛那种无产阶级的革命胆略，那种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革命勇气。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们总是最敢于根据客观存在的实际，创立、革新和发展自己的观点和原理的。他们决不拘泥于自己原有的个别结论，哪怕是重要的结论。他们总是随着客观实际的发展和变化去改变那些不适合当前情况的旧命题、旧结论。1870年马克思曾经说过，巴黎的无产阶级在当时的形势下如果举行起义，那将是愚虚的。但到1871年巴黎工人阶级的武装起义发动后，马克思给予了坚决而热烈的支持。



根据巴黎公社的经验，马克思得出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结论，修改了自己的观点。关于经济危机的周期，恩格斯原来讲是5年，后来根据新的情况，说周期是10年。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设想，无产阶级革命将会在大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但是，列宁根据帝国主义时代历史发展的新特点，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将首先在一国取得胜利的新理论，并在一个封建落后的帝国主义俄国领导革命取得了成功。斯大林根据沙俄帝国和当时欧洲的实际，直截了当地指出，恩格斯的《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一文有片面性的缺点，它“忘记了某些最基本的他非常清楚的事实”，会混淆侵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区别，会使以后列宁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政策成为不可能。马、恩、列、斯都主张通过城市武装起义取得革命的成功。到了中国，毛泽东同志讲，不，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要通过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同志又根据中国的实际，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批评了斯大林的缺点和错误。这些就叫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革命勇气和革命胆略。我们要学习革命导师们的这种勇气和胆略去冲破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设置的种种“禁区”。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和科学体系。但是，对于马、恩、列、斯、毛讲过的话，凡是不适合已经改变了的情况的一些论点，甚至有的重要论点，也应当大胆抛弃。这也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本身的要求。只有这样，才是真正捍卫马克思主义，才能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高举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一定要以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作为我们的光辉榜样，创造性地去研究新现象和新问题，敢想敢闯，去攀登世界经济学科的高峰，切实、有效、具有远见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为了进一步解放思想，我们必须坚持中央提出的“三不主义”，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正确方针。在学术问题上，我们不仅容许而且应该鼓励形成不同的学派，坚决反对压制不同意见和压制“小人物”的学阀，坚决反对“一言堂”。真理越辩越明。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对于我们现在承担的科研课题，如果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也不必强求一致。我们可以就一个问题写出学术观点不同的几本书来。目前在世界经济研究领域内还没有形成一种学术争论的空气，而没有热烈的学术争论的气氛，世界经济的研究要走向繁荣发展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

当然，我们说的解放思想，实质上指的是摆脱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首先是“左”的指导思想以及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精神枷锁，转到无产阶级的科学思想，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轨道上来。这要求我们对内坚持“四项原则”（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个坚持”的核心和基础）；对外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我们必须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在了解世界政治经济形势，争取国际和平环境方面，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肩负着重大的、义不容辞的历史性责任。

现在，我再讲几个和执行“规划”有关的其他问题。

首先，关于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

应当说，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要很好地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必须十分注意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的问题。这是使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兴旺发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

理论来源于实际，反过来又对实际起着指导的作用。因此，只有认真地深刻地研究世界的历史实际和当前实际，



特别是研究世界经济现实中提出的新现象和新问题，世界经济的理论才能得到丰富和发展。否则我们的理论便会成为一种空洞的、无用的甚至有害的东西。如果连外国现实中的问题，我们都不能给予科学的解释，这样的理论又如何能够拿来指导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实际呢？当然，在具体的工作安排上，研究单位比较侧重于长期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实际工作部门的研究机关和人员，比较侧重于完成短期的研究任务。但是，无论前者和后者，都要十分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都要从实际出发研究理论问题。

最近，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提出，为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和从事理论工作的同志要结合起来，大搞调查研究，从而提出双方同意的方案来，作为决策的依据。这是一件有非常重大的历史意义的事，是我党历史上的空前盛举。在我们这次会议上，马洪同志就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布置的调研任务给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出了10个题目，汪道涵同志出了37个题目。对此大家纷纷报名承担。有的组在讨论时，不但落实了长期规划，还主动地提出和落实了中间性产品，例如准备在近期和中期内完成的论文集。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说明我们在理论联系实际方面已经迈出了可喜的一步。我们从事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全体同志要紧张地动员起来，投入这一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斗，踊跃承担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交办的调研课题。特别要有选择地研究若干外国（首先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经济体制改革、经济结构改革、引进外国技术和资金与现有企业改造的关系等方面的经验，争取在今后半年内分两批，写出一些较有份量的调研成果，努力争取成为党和国家制订经济政策的助手，为实现我国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作出贡献。在实现这一任



务的过程中，我们要力争在学风方面来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坚决克服理论脱离实际的不正之风，使我们的科研工作有一个大的提高。在这里我代表广大研究工作者恳切请求实际工作部门和从事实际工作的同志，要为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创造必要的联系实际的条件，尽可能提供必要的资料和方便。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我们可以放松甚至忽略世界经济基本理论的研究了。长期的系统的理论研究和短期的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之间是一种统一的而不是矛盾的关系。离开了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世界经济的基本理论便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同样，离开了世界经济的基本理论，现实经济问题的研究也是不可能深透的。我们在为四个现代化服务的同时，必须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建设和发展，充分发挥理论的指导作用。

第二，要大力加强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综合问题的研究。

从我们这次《规划》的机构设置和世界经济研究队伍的状况来看，对三个世界的研究，在力量的配置方面是很不平衡的。其中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研究最为薄弱。从地区来讲，对中东和非洲这个两霸激烈争夺的地区，以及对拉丁美洲的研究更为薄弱。世界经济是一个各个部分互相联系而又互相制约的整体。由于对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缺乏研究，必然要影响我们对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和特点、第三世界国家反对旧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以及关于跨国公司等问题的研究。在这次《规划》会议之后，希望各地的同志们都来注意加强亚非拉地区经济的研究，注意培养这方面的研究人才，在条件成熟的地方，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增设非洲和拉丁美洲经济的研究机构。同时，我们还要大力加强国际经济关系、世界市场问题、国际金融货币问题以及世界能源问题、世界粮食问



题、人口问题等世界经济领域内综合问题的研究。

第三，关于团结各方人士，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无论和四个现代化对我们提出的要求相比，还是和完成《规划》任务的需要相比，目前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的人数都是十分不够的。我们应该尽可能地培养和扩大世界经济的研究队伍。我们的世界经济研究机构要强调精干的方针，力求培养骨干力量。为了更加有效地发挥这支队伍的作用，我们必须十分强调团结各方面的人士，充分调动各种积极因素。在我们的队伍内部必须增强团结，加强交流，反对各种各样的互相封锁的倾向。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成立了全国世界经济学会筹备小组，希望能够迅速地展开工作，使全国的世界经济学会能够早日成立。这对于我们加强交流，增加了解，对于把世界经济研究队伍中的三个方面军的力量拧成一股绳，有着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注意调动社会上在世界经济或外语方面有一技之长的各种人员的积极性。可以采取特约研究员、特约翻译等办法，把他们吸收到我们的研究工作中来。我建议，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只要具备上述条件，都可在自愿的原则下加入我们的学会，不受任何资格的限制。在那些虽然并不以世界经济的研究为职业，但对我们的研究工作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中间，往往可以发现未来的世界经济研究方面的优秀人才。我们要注意培养人才，特别是要培养出一批40岁左右的世界经济研究方面的骨干队伍，我们也要善于发现人才，包括现在还分散在社会上的世界经济研究方面的各种有用之材。参加这次会议的，有很多是世界经济研究战线上的老将。希望他们在发现人才、培养人才方面多作贡献，多出力量，造福子孙后代，这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第四，关于加强图书资料工作的问题。



为了加强图书资料工作，《规划》主要提出了四方面的措施：一是重视图书资料人员的培养工作，规定到1985年，图书资料人员应增加到与研究人员成一与三之比，其中图书馆系的毕业生应占相当的比例。二是重视图书资料人员的考核和提升，规定这种考核和提升应当“按照与研究人员相当的标准”进行。三是明确规定要尊重图书资料人员的劳动，并通过一定的培训措施，包括出国考察，来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四是采取一系列其他措施来加强图书资料工作，其中包括在北京等地建设世界经济的资料中心。

我们之所以要大力加强图书资料工作，因为这是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一项基本建设。巧妇难做无米之炊。不做好图书资料工作，怎么能做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呢？实际上，资料工作和研究工作之间并无绝对的界限。我们每个研究人员都在程度不同地做着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工作。凡是真有成就的研究人员几乎都是做资料工作的里手。而图书资料人员为了做好自己的工作，也需要熟悉资料，进行研究。随着资料工作水平的提高，资料工作中研究的因素将会增加。每个真正的研究人员，都应当关心资料工作，十分尊重图书资料人员的劳动，因为我们都是同一条世界经济研究战线上的战友。轻视图书资料工作，认为图书资料人员低人一等的看法，是完全错误的，应该彻底克服。今后研究人员和图书资料人员可以适当交流。刚开始做研究工作的同志最好先做一段图书资料工作，练好这门基本功。希望大家都能够向有关领导大力宣传加强图书资料工作的重要意义，相互交流资料，提高资料质量，使建立资料中心的工作能够较快地前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已经决定建立世界经济资料中心，并将为此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条件。

同志们，30年来，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走过了一段曲



折的发展道路。大家都知道，毛主席和周总理历来重视对外国问题的研究。1956年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这一光辉著作中，特别教导我们要认真学习外国。在此之前，毛主席早就强调我们要认真学习苏联，因为我们搞社会主义还没有经验，而苏联是世界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后，全国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也作了许多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因此，总的说来，那时我们在学习外国方面是有成效的。广大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为配合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阶级斗争作出了积极的贡献。特别是1963年，在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的指示和亲切关怀下，成立了一批研究外国问题的机构，更为世界经济研究的组织建设打下了基础。

但是，从1966年后的十多年中，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遭受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严重摧残和破坏，濒临夭折的境地。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也得到了解放。党中央提出要加强国际问题的研究，为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揭开了广阔发展的前途。在我们面前虽然还存在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但它们都是前进中的困难和问题。只要我们认真总结30年来的经验和教训，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实事求是，势力工作，我们世界经济研究这条战线，将和其它战线一样，会发展得更快更好，这是肯定无疑的。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变时期。在这样的时期中，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确实大有可为，前程似锦。让我们积极地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向前看，把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大力搞上去，更好地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势力奋战吧！

（《世界经济》增刊，1979年第3期）



世界经济学





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世界经济学而奋斗

197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北京
市委召开的建国30周年学术
讨论会上的发言

一、30年来我国世界经济 研究工作的基本估计

30年来，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发展过程。

建国后，最初17年在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领导和关怀下，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在国民党反动派留下的一片废墟上，迅速发展起来。我们几乎白手起家地建立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其中包括研究世界经济的机构。1963年经中央批准，又增设了一批研究国际问题的专门机构，从组织上为建立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体系打下了基础。在这17年中，我们培养出了一批研究世界经济的有用人材，组成了我国世界经济研究的基本队伍。他们之中的相当一部分同志已经成为我国世界经济理论战线的骨干力量。在这段时期中，我们在研究和学习苏联的经验，以及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方面，虽然也犯过片面性的错误，但总的说来，我们的方针是正确的。我们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有批判地学习外国的正确原则。广大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为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



献。这是必须予以肯定，并给以足够估价的。

但是，正当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蓬勃开展的时候，我们却遭到了林彪、江青的严重干扰和破坏。在长达10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和外部世界几乎处于一种完全隔绝的状态。研究机构被解散，人员被下放，研究工作差不多完全停顿了，这使我国和国外研究水平的差距扩大了10—20年的时间。

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得到了解放。3年来，特别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关怀下，在全体世界经济研究工作人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比较顺利地走过了一个恢复时期。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1979年7月我们召开了世界经济学科的全国规划会议，制定了《1978—1985年全国世界经济学科发展规划》，规定把为实现我国的四个现代化服务作为今后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基本方针，确定了一批和实现四个现代化关系紧密的重点课题。我们的队伍正在扩大，一批新的研究机构正在有计划地设立。一个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科学体系正在逐步形成。这些都说明，在我国的历史上，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蓬勃发展的新的时期已经开始了。

综观30年来走过的曲折道路，我们应该从这里得到哪些主要的经验和教训呢？

第一，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才能顺利地发展；而当反革命阴谋集团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部分领导权，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横遭歪曲、篡改的时候，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就遭到破坏和摧残。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兴亡盛衰，广大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的科学生命是和我们党和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要走兴旺发达的道路就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党的领导，继续深入地批判



“左”的错误思想，揭批林彪、江青的反革命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

第二，历史的经验还证明，只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才能健康地发展。实际，只有不断发展变化着的世界经济的实际，才是世界经济科学发展的客观基础。我们只有从这个客观的实际出发，而不是从书本出发，从马列主义经典作家的片言只语出发，才能不断地去接触新事物，研究新问题，探索出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为在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多年来，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为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设下了许多“禁区”和框框，我们只有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根据实际情况得出应有的结论，才能有效地、真正地冲破这些“禁区”和框框。如果我们不是从实际出发，进行大量的调查和研究，从中引出科学的结论，那么，即使天天提倡打破“禁区”和框框，这些“禁区”和框框还是不会从人们头脑里完全消失的。我们说解放思想，就是说必须把我们的思想从一切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包括林彪、江青的极左的反革命说教和蛊惑在内）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走上无产阶级的，即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轨道，也就是说，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指导下，根据客观实际，而不是根据任何人的主观意志看问题和办事情。这里，我们必须正确处理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关系。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有义务在我们的研究领域内，认真宣传、解释和阐明党的现行的有关方针和政策。同时，我们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和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客观的实践。对于研究工作讲来，更重要的是研究不断出现、变化和发展着的新情况，探索新问题，供领导制定和修改政策时参考，起助手和参谋的作用。其实，做一切宣传工作也



只有实事求是，与客观实际密切结合，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

第三，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要得到大的发展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50年代，我们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发展较快，和当时关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关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关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等问题的几次大范围内生动活泼的讨论，是直接有关的。为了认真地贯彻“双百”方针，我们必须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在真理问题上的反映，它表现着无产阶级彻底唯物主义的革命精神。在人类历史上，无产阶级是最尊重客观真理，最服从客观真理，最进步、最革命的阶级。只有坚持“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革命原则，才能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供最基本的条件。在世界经济领域，我们决不能搞一言堂。在学术问题上，任何领导人，任何权威人士，任何著名学者发表的任何意见，都要在“百家争鸣”的空气中，经受起群众的批评和辩论。在真理面前是没有什么特权的。在真理面前要特权，恰恰说明真理不在自己手里，是害怕真理，害怕马克思主义的怯弱表现。天下从来没有一贯正确的人。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发展30年的经验和教训说明，我们必须在学术界造成一种敢于敞开思想，放手让不同学术观点展开大争大辩的争鸣局面。这种局面是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繁荣昌盛的标志。必须坚决防止那种一家独鸣、万马齐喑的可悲局面。

第四，必须要有一个科学的规划，在这个规划的基础上形成一个科学的研究体系。30年来，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做了大量的工作，但从整体看，一个根本的弱点是，这种研究还缺乏严密的组织和科学的体系。1956年我们曾经搞了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学科的发展规划，其中也包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



发展规划。可惜的是，这个规划并没有得到落实，以致我们的研究工作基本上处于一种分散的、零碎的、无系统的状况。长期以来，我们对于世界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建设注意不够。世界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将会大大促进整个世界经济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世界经济学的学科建设必须建筑在对世界经济进行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而学科建设本身反过来又会使世界经济的研究工作得到更加具体的理论指导，使这种研究更加系统化，并上升到新的理论高度。

经过了30年的发展，目前，随着全党全国人民工作重点的转移，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新阶段的特点是：在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世界经济研究工作将比我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发展得更加迅速，逐步形成一个合理的、科学的研究体系，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进而为我国的四个现代化和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的贡献。我们一定要善于总结经验和教训，发扬成绩，克服缺点，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努力为实现“四化”，为在国际上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服务，胜利地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

二、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实际

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必须从客观的实际出发。那么，当前世界经济的基本情况是怎样的呢？

我认为大致上可以用四句话来表示，这就是：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但目前它还有一定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建设存在着不同的道路和模式，并且出现了曲折和重大变化；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不同的发展方向，呈现着两头小、中间大的状



态；国际经济关系和国际经济组织得到了空前未有的发展。

先说资本主义的问题。二次世界大战后，50—60年代，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一段高速增长时期。但是，周期性危机还是不断发生，1974—1975年又爆发了战后最严重的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和失业现象愈加重。尽管如此，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完全停滞不前。今后，估计还可能出现一种长期“停滞膨胀”的局面。特别是8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将困难重重，危机四伏，但总的说来，资本主义还将有所发展。在某个时期，某个国家，经济还可能以较快的速度增长。出现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国际资产阶级还能对生产关系进行一定程度的调节，使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还能在一定程度上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方面是在帝国主义时期生产力的发展使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激化的结果，它表明资本主义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的“入口”了。另一方面，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是垄断资产阶级采取调节措施的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念，资本主义生产就一个企业而言，是有计划的，但就整个社会来说，则是无政府状态。二次世界大战前，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情况发生了一定的变化。随着企业的规模越来越大，企业内部的计划性越来越强了。与此同时，由于国家的干预和调节，整个社会生产在某些方面也带有了一定的计划因素。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历来都受到市场不足的限制。针对这一点，资本家大搞扩军备战，搞“高工资、高物价、高消费”，通过发展公共福利事业来增加社会购买力，使市场得到一定的扩展。随着生产国际化的发展，现在更出现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各种国际调节的形式。当然，这些措施都



没有、也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矛盾和消除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但是它们确实一定程度上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到调整，从而容许生产力继续有所发展。

在资本主义企业内部，资本家也在保持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前提下，企图对生产关系作出某些调整。如吸收工人参加管理，让工人买股票，搞什么“共同决定”、“共同管理”。厂长、经理逢年过节拜访工人家庭，甚至把工人生日的年月日用数据存入电子计算机，使工人在生日那天一上班，就能看到一份送给自己的礼品。这些无非是想欺骗和麻痹工人，使工人感到自己和资本家之间似乎已经不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了，似乎工人也有点象是工厂的主人了，借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

资产阶级学到这一套，是付出了相当代价的。一方面他从自己的经验中学，特别从自己的失败中学。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资产阶级感到靠德国、日本那套法西斯统治方法不行了，还是搞改良主义、“福利社会”、“人民资本主义”等比较有效，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又在向他的对立面，即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学习。你社会主义搞计划，我也搞计划；你讲提高人民生活，我就搞“福利社会”；你讲“两参一改三结合”，我就搞工人参加管理。日本人对我们的同志说：“你们尽说丰田、丰田，丰田是从你们那里（按照“鞍钢宪法”）学来的，你们却反过来学丰田！”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的确进入了老年时期，离自己的死亡和社会主义的大门越来越近了，但目前它还有能力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些局部调整，如同老年人服些补药一样，保持一定的生命力。当然，这种改良一般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重工人劳动强度的基础上进行的。

其次，资本主义之所以还有一定的生命力，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过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纷纷取得了独立，走



上了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这些国家按照经济制度，多数属于资本主义范畴。他们除了需要巩固已经获得的政治独立外，都有一个争取经济独立的严峻任务。他们和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成为目前世界人民反帝反霸反殖斗争的重要方面军。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国家正在建设的还是资本主义的经济，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又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后备力量。帝国主义、老的资本主义国家在衰落，新型的资本主义国家又在成长，这是目前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个新特点。

从世界范围看，资产阶级之所以还有力量，还因为，即使在无产阶级已经夺得了政权的国家里，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无产阶级政党如果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或被反革命集团篡夺了政权，就会有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性。

总之，国际无产阶级一方面要认识到资本主义最终必然灭亡这条铁的历史规律，树立共产主义最终必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的坚强信心。同时又必须认识到，资本主义在目前还有一定的生命力。把资本主义的腐朽性解释为毫无发展的可能性，把垂死性解释为资本主义将很快死亡，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实践证明，世界资本主义走向死亡是一段相当长的曲折起伏的过程。因此，我们对于资本主义在走向死亡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新现象和新问题，必须认真加以研究，作出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说明，并且研究同国际资产阶级进行长期斗争的战略和策略。这是我们的一项重要战斗任务。

现在再来说社会主义的状况。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除苏联外，世界上又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采取了不同于苏联的方式和道路。在斯大林领导下建设起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是一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它是按重、轻、农的次序进行建设的。这是一种模式。中国的社会



主义经济建设虽然跟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不尽相同，但基本上是按照斯大林时期的苏联模式进行的。在铁托的领导下，南斯拉夫在社会主义的建设过程中实行了工人自治，社会主义自治，实行广泛的政治、经济民主。他们比较重视市场经济，同时逐步注意计划调节。这又是一种模式。朝鲜、罗马尼亚等则又采取了或多或少不同的形式建设着社会主义。我们要把社会主义建设的各种不同模式，作认真的比较研究，吸取它们的长处，避免它们的短处，来加速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

发展中国家现在是两头小，中间大。所谓“两头”，一头指的是社会主义国家，如中国以及朝鲜、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等友好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是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另一头指的是那些独立后仍然高度依附于外国，实际上继续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的国家。这些国家仍然保持着封建主义，甚至奴隶主义的生产关系，如非洲的某些国家。这两类国家在发展中国家中都占少数。所谓“中间”，指的是广大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它们占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这些国家一般由民族资产阶级掌握政权，通过各种不同道路发展着独立的民族经济。他们对外资还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依赖关系。这些国家的发展方向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它们逐步对外资企业实行国有化或者利用外资而在利用中加以限制，通过这种斗争促使民族经济发展、壮大。它们中间的一部分在一定的有利条件下，有可能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另一种可能是，它们在帝国主义越来越大的压力下，逐步回到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老路上去。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第一种可能性较大。国际无产阶级应该同情和支持这个前途的实现。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还突出地表现在国际经济关系及其组织形式得到了迅速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相互斗争和相互依存的关系大大发展和加强。广大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得到了扩大和深化。世界经济和经济组织采取了各种新的活动方法。主要如：

——跨国公司得到了空前发展，它们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控制着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生活。据估计，目前资本主义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1/3$ 、外贸额的 $1/2$ 左右控制在它们的手中。它们在国内的产值接近，有时还超过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出口总额。整个70年代，跨国公司都继续得到了发展。

——地区经济和集团经济得到广泛发展。现在除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经互会外，广大发展中国家也成立了十多个经济一体化体系和共同市场。

——各种国际经济组织，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纷纷成立，在国际上展开广泛的活动。

——国际贸易、国际信贷、国际资金流转、国际科技交流和转让、国际劳动力转移等都得到了广泛发展。与此相应的是，国际海运、国际航运、国际保险事业等等都有了迅速发展。

世界经济领域内的这些新现象和新问题要求我国的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者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周密调查和深入研究，从中找出其规律性的东西。这样，就把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任务，迫切地提到了日程上来。世界经济学就是在我们对于世界经济这个客观实体的发展、变化作深入调查研究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



三、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世界经济学而努力奋斗

世界市场、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从15世纪末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经过萌芽状态和几个发展阶段，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最终形成了。世界市场，包括商品和货币信贷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是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的基础。到了帝国主义时代，垄断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世界经济建立起来了。资本输出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世界分裂成为走下坡路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和日益上升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这两个部分或两个体系之间既存在着互相斗争的一面，又存在着互相依存的一面。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建立给整个世界经济，其中包括世界市场，带来了新的因素、新的特点和新的性质，使它发生了局部的质的变化。在两大体系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逐步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体系逐步缩小，经过一个相当长期的发展过程，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将最终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社会主义经济体系逐步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过程，也将是社会主义世界市场逐步取代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过程。但是，这一过程并不表现为统一的世界市场完全消失了，瓦解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通过各种方式进行的经济交流，证明仍然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而是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内部发生了局部的质的变化，表现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作用在日益扩大。

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是客观存在，是一种特殊的事物。它有自己的特殊矛盾和特殊的运动规律，它不是各国国民经济



的简单的总和，它的运动规律也不是各国国民经济运动规律的简单的延伸。因此，人们需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分析、研究它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这门学科就是世界经济学。

那么，创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理论依据是什么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虽然没有对世界市场等问题，用专门的篇章展开系统的论述，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及其它著作中，都曾对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等问题作过精辟的论述。比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曾经设想，政治经济学应当分成五个部分，其中第四部分就是“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第五部分则是“世界市场和危机。”^①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世界市场、国际贸易等问题的论述以及关于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经济的大量研究，为我们研究世界经济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以及他关于俄国资本主义发展和市场问题等一系列著作，是我们研究帝国主义时期世界经济的最重要的理论武器。

斯大林在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十分重视世界经济的研究。他曾经多次亲自过问这方面的工作，亲自提出研究课题。他在联共（布）党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中，曾经多次详细地论述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形势。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在理论上提出了资本主义总危机以及这种危机的阶段论，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提出和阐述了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等等。现在看来，斯大林在这些方面的观点，很多是正确的。例如，当年斯大林在批判托洛茨基的时候，正确地指出：“以为社会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1页。



主义经济是一种绝对闭关自守、绝对不依赖周围各国国民经济的东 西，这就是愚蠢之至。”斯大林认为，在目前的世界上，“不能设想一个没有输出和输入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是“绝对不依赖他国的”。但是，承认这一点并不等于否认一个国家的独立性。这里，斯大林明确地指出，“应该把各国彼此间的依赖性和各国的经济独立性区别开来。”^①这些观点对于苏联在30年代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起了积极的作用。特别是，斯大林提出的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是无产阶级进行国际斗争，建设社会主义和创建世界经济学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当然，斯大林的某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例如，他否认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有迅速发展的可能性，这一论点显然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理论，实际上是否认了自己以前的观点，否认了两种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发展经济关系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在这个理论的指导下，马林科夫在苏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认为，两个世界市场之间是“没有联系”的，社会主义市场“一年比一年增大”，而帝国主义市场则“一直在缩小。”当时的苏联学术界还提出，社会主义阵营的每个国家都可以在世界民主市场上“找到发展本国经济所必需的一切”，因此无须和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经济联系。这些都在实践中造成了不良的后果。

毛泽东同志对当代帝国主义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研究和分 析，丰富了人们对帝国主义的认识。他提出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又是真老虎的理论，指出需要树立和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思想，指出了经济危机和世界战争的关系。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①《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118—119页。



后，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中间地带的理论，70年代又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和一系列有关的论述。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认识世界经济形势，发展我国的对外经济关系，都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同志以中国为典型，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经济作了深刻的研究，指出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这对于我们研究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有重要指导意义的。

在经济学界，前人和我们同时代人也已经作了不少工作，为我们创建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建立了一定的基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瓦尔加。特别是在他的前期活动中，他对世界经济的研究作出了很大贡献。但是，以瓦尔加等为代表的苏联经济学界对于世界经济的研究一直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弱点。第一，长期以来，他们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围绕着战争和经济危机等有关问题展开的。对于世界经济研究工作怎样能够更充分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则并不完全明确。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能不能吸取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的成功经验呢？对他们讲来一直是一个疑问。指导思想方面的这种片面性和局限性，限制了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第二，在研究战争和危机等有关问题时，主流是好的，但长期以来对资本主义还有一定的生命力这一点估计不足。直到1961年，在《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一书中，瓦尔加还断言，“就大体上的可能性来说，可以预言：20世纪是资本主义存在的最后的世纪。到这个世纪末，将根本没有资本主义，或者将剩下为数不多的资本主义残余。”认为“20世纪将作为资本主义灭亡的世纪和共产主义胜利的世纪而载入人类史册”，对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形势这种总的战略估计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与此有关的是，瓦尔加认为，战后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发展是战争所造成的“暂时性原因”引起的（比如美国等国家由于机器设备在战时长期没有更新而在战后



造成需求量的大幅度增长)，而这种原因以后是“很难再重复”出现了。有的经济学家，如德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库钦斯基则认为，战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生产的发展“仅仅是依靠军火生产、战争准备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实现的”，实际上是根本否认了垄断资产阶级还可能对生产关系进行局部的一定程度的调节。第三，苏联对世界经济的研究，长期以来，缺乏一个科学的体系。对于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建设，没有给予应有的注意。

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问题，已经在国际上引起了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如匈牙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热莱斯等对于世界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对象问题曾进行了专门的论述。我国经济学界在60年代初也曾经对世界经济学是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及它的研究对象等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讨。这些都为我们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造成了有利的条件。

那么，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呢？

对于这个问题，国内外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们看到的材料中，最早的是布哈林的一个说法。他在《世界经济与帝国主义》一书中认为，“世界经济，即包含世界全体的生产关系及与这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体系”。有的同志则认为，交换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表现形式，不同意把交换关系列入我们的研究对象。有的同志认为，世界经济学不但应当研究生产关系，还应当研究生产力。有人则不同意这种看法。总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究竟是什么，还需要大家继续讨论和研究。马克思曾经认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其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马克思在着重研究生产关系的同时，总是很重视研究生产力和生产力的发



展，重视对上层建筑的研究。他十分重视经济政策。《资本论》第4卷是剩余价值学说史，就是讲意识形态。我们的初步意见认为，世界市场以及它的基础上发展形成的世界经济，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世界经济的论述为基础，从客观存在的实际出发，把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分析、研究它的发展过程，揭示它的运动规律，并利用这些规律，来指导我们的行动，这便是我们同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一道，共同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任务。我们认为，世界经济学的对象就是研究从世界经济形成以来，世界范围内生产方式的总体，就当前来说，主要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种生产方式的本身及其相互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运动形式和规律。我们要研究这些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包括交换关系在内），兼及有关的上层建筑。我们的研究重点则放在生产关系上面。

世界经济科学体系的形成需要有一个过程，而且要不断完善。我们的初步意见是：首先，我们要分析商品、货币和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运动的形式和实质。第二，要分析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在不同国家和民族实现的具体道路和形式，它的不同的动向（包括前进和后退、过渡和蜕变），同时要研究它同世界其它部分的经济关系。第三，要研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向和道路，以及它们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关系。第四，综观世界经济的总体，并且科学地预测它的未来。可以预期，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建立和成长将会促使两门新的经济学科的产生和发展。一门是比较社会主义经济学，它的任务是科学地、详尽周密地对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作比较的研究，分析它们的共性和差别，长处和缺点，以及



发展方向和前途。另一门是比较发展经济学，它的任务是科学地、详尽周密地对不同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作比较和研究，分析它们的共性和差别，研究它们不同的发展道路和模式，阐明它们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并且展望它们的前途。

从世界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实际出发，世界经济学的重点研究课题，我认为至少有以下11个方面：

(1) 对世界市场、世界经济形成和发展过程作历史的考察。

(2) 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内互相斗争和互相依存关系的表现形式及其运动规律。

(3) 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和形式的比较、研究。

(4) 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点，如对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周期（包括长波论）、工人阶级贫困化、社会结构等问题的研究。

(5) 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性及其表现形态和规律性。

(6) 国际贸易、国际货币金融制度和国际资本组织（如跨国公司等）的运动形态和规律。

(7) 经济一体化，区域性经济和集团经济的性质、发展趋势和影响。

(8) 民族主义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及其发展方向。

(9) 科技革命和世界经济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

(10) 第三世界国家为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进行的斗争。

(11) 有关各经济学派对世界经济的理论的研究和评价。

为了明确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还有必要对它和其它有



关学科的关系，作一些探讨。

首先是世界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关系问题。大家知道，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历史上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生产方式，特别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的科学。世界经济学则主要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存在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人们生产关系。两者的区别在于：（1）世界经济学不研究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社会形态中的经济关系，因为那时还不存在世界经济这一整体。（2）世界经济学对世界经济的各个范畴及其相互关系要作更加具体的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则比较概括。政治经济学是世界经济学的基础，它为世界经济学提供基本范畴和基本概念。掌握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有助于我们掌握世界经济生活的本质及其发展的规律。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则又将反过来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其次是世界经济学和国别经济研究的关系问题。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并不是各国经济简单的算术的总和。世界经济有自己独特的矛盾和独特的运动规律。世界经济学研究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经济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和各国经济发展中的一些重大的综合性问题，这些问题如果仅仅从国别经济的角度是无法深入研究的。但研究世界经济又不能离开国别经济的研究，更不排除国别经济的研究。二者既有区别，又紧密联系。世界经济学没有国别经济研究作为自己的基础，就不能深入揭示世界经济生活的运动规律。同样，国别经济研究如果不以世界经济整体作为背景，不纳入世界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不以世界经济学所揭示的基本法则为指导，也就不可能深刻揭示各国经济生活的本质。

第三，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和目前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研究的国际经济学之间的关系。资产阶级的国际经济学是



以资产阶级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着重研究分析国际贸易、国际货币、国际金融等问题，并为这些问题制定许多模式。它的目的是在国际范围内扩大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研究对象要宽广得多，它是以世界经济的整体作为研究对象的。当然，它也要研究国际经济关系，并把这种研究放在一种突出的地位。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目的同资产阶级国际经济学根本不同，它是要揭示社会主义世界经济体系必然取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规律性。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的国际经济学我们应当重视它，认真地批判地研究它，并从中吸取对我们有用的成分。

第四，世界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发展中国家经济学）的关系。发展经济学也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是60年代的产物。它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发展中国家的各种经济关系。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应当批判地吸收发展经济学的许多合理的成分。

最后，我简单地讲一下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方法问题。研究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唯一正确的方法就是唯物主义辩证法。这种方法要求我们在研究世界经济的时候，必须始终遵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基本原则，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具体事物作具体分析。要分析事物具体的内在的矛盾，分析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分析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研究事物的运动和变化，防止僵化和片面性。我们决不能拘泥于若干现成的结论。没有创造也就没有科学，也就没有科学的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为此，我们既要反对教条主义的方法，又要反对经验主义、实用主义的方法，这两种都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是和辩证唯物主义根本对立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创立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过程中，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辩证唯物主义要求我们详



尽地占有材料，对这种材料进行改造，加以消化。也就是说，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这样才能真正掌握事物的本质，抓住错综复杂的世界经济运动和发展变化的规律性。此外，我们要认真吸取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派方法论（如计量经济学、投入产出法）中的科学部分，为我所用。

同志们，在我国，一个宏伟的新的历史时期已经开始了。在这个时期中，我们世界经济研究工作要把为“四化”服务放在首位，同时也要更好地为国际阶级斗争和我国的外交工作服务。这就是我们创建马克思主义世界经济学的目的。让我们在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过程中，同世界各国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一起，为创建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而共同奋斗吧！



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探索

序

1979年7月11日，我在全国世界经济学科规划会议开幕时说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是研究世界范围经济生活运动和发展规律的学科，应当对各国经济和国际经济关系中的重大问题（诸如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帝国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态势、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三个世界之间的经济关系、资本国际化及其新的发展、世界货币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发展中国家为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斗争及其前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不同模式和具体道路、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经济一体化和集团经济的形成及其发展、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技术革命对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等等），进行综合的比較的研究，以探索其发生、发展和变化的规律。我们要以无产阶级的科学精神和革命勇气，大胆地去创建和发展世界经济学这门学科，而这门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又必须密切联系实际，在世界经济、政治斗争过程中，在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才能完成。”^①几

^①钱俊瑞：《世界经济与世界经济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4—5页。



年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制订世界经济这门学科的研究规划，确定编著《世界经济学原理》作为重点课题，并集中组织力量有计划有步骤地努力完成这个任务。

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还处在初创阶段。为了编著《世界经济学原理》，作为准备阶段的第一步，我们从1980年起集中了大批教授和专家编写了一部《世界经济概论》，分上下两册，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其后，1981年，我们为了配合加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教育，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又组织力量编写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纵横谈》一书，从历史发展和理论上阐明社会主义制度确实优胜于资本主义制度，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1983年，为了纪念伟大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们又写了一本题为《马克思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的小册子，首次阐述了整个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和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长期互相依存又互相斗争的规律，由世界经济导报社出版。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作为准备《世界经济学原理》的创作而问世的。

作为准备创作《世界经济学原理》的又一个步骤，同时又作为《马克思与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这一小册子的补充和发展，我们现在又编写这本《当代世界经济发展规律探索》，除在绪论中论述世界经济的几个基本范畴和当代世界经济的历史特点外，分上下两篇：上篇阐明当代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的几个重要的发展规律；下篇分三章，分别就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等三大领域内几个重要的并常引起争论的规律性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贯穿这本书的基本精神是，根据当代特别是二次大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情况，用马



克思主义的立场、基本观点和方法，探索其比较重要的规律，借以说明资本主义趋于灭亡是必然的，绝对的，但它的垂死过程却是长期的，有起有伏，非常曲折，呈波浪式的；同时，社会主义制度最后在全世界范围战胜资本主义制度也是必然的，绝对的，但是它争取完全胜利的过程，却不是平坦的、笔直的，而是曲曲折折，充满着异常艰巨的斗争的。我们把这些观点写出来，目的之一是抛砖引玉，我们迫切期望得到国内外同行和广大读者的补充、修正以至反对的意见，使我们的观点更加符合实际。

绪 论

（一）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它的

几个基本范畴

世界经济是一种历史现象；在观念形态上，它反映为一个历史范畴。它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更确切地说，它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

人类在原始社会后期，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个别地区有了部落内部和部落边界的商品交换。进入奴隶社会后，形成了国家并实行奴隶制生产，部分产品作为商品在国与国之间进行交换，产生了国际商品交换的萌芽。到了封建社会，这种商品



交换又有所发展。但是，由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生产力水平还低，社会分工不发达，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因此，对外贸易比重较小，发展迟缓，国际商品交换还只是个别的、局部的甚至是偶然的现象。在那漫长的年代，还不存在真正的世界市场，更不存在我们所说的科学意义的世界经济。

到十四、十五世纪，资本主义有了萌芽，意大利北部诸城，如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已经成为欧洲的贸易中心。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地理上的大发现，以及海外殖民地的开拓，欧洲贸易中心从地中海区域扩展到大西洋沿岸。葡萄牙的里斯本、西班牙的塞维尔、尼德兰的安特卫普、英国的伦敦等，先后成为繁华的国际贸易港。它们的贸易范围远及亚洲、非洲和美洲。对外贸易的发展，国际交换的扩大，逐渐形成了区域性的国际商品市场。但是，那时国际分工还处于萌芽状态，国际交换关系还没有形成确定的体系，近代的世界经济还不可能真正形成。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科学技术获得了惊人进步。英国、其他欧洲发达国家和美国，相继完成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生产从工场手工业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使工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这场产业革命直接推动着社会关系和国际关系的深刻变革。它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的胜利，并为现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准备了各种物质和社会关系的必要条件，形成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下述基本范畴。

1. 国际分工

产业革命发生后，由于广泛采用机器技术，工业从农业中完全分离出来成了独立的部门，并在工业内部发展进一步的分工，这种分工的规模不断扩大，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进



而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社会分工迅速向国际领域扩展，把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或多或少地纳入国际分工之中，于是，形成了一种同机器大生产中心相适应的分工体系。这种国际分工体系转化为巨大的世界范围的社会生产力。在这个体系中，英国、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等少数资本主义国家是“加工厂”，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广大地区的落后国家成了它们的原料和食品供应基地。更加通俗和形象地说，前者是世界的城市，后者是世界的农村。这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国际分工，一开头就显示出它固有的二重性：一方面，它促进了先进国（或宗主国）和落后国（或殖民地）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它掩盖了前者对后者控制、剥削和掠夺的性质。

2. 世界市场和国际价值

国际分工是国际商品交换的基地。新的国际分工的形成，促进了有关国家生产力的提高，使生产趋于专门化，并在不同程度上加强了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资产阶级为了追逐利润，往来奔走于全球各地，冲破一道又一道的民族闭关自守的屏障，把越来越多的国家卷入世界市场。印度的孟买、中国的广州和香港以及波斯和埃及的一些港口纷纷成为世界贸易的重要港口，使绝大多数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与此同时，大工业为世界市场的沟通提供了现代化的陆海交通工具，铁路、轮船、电报、电缆网等，把世界联结成为一个整体。正如马克思所说：“大工业建立了由美洲的发现所准备好的世界市场。”^①

在世界市场上，各国的社会劳动通过国际交换而成为全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下同）第262页。



界社会劳动的一部分。各国商品进入世界市场，它们在各国内的不同量的价值，通过国际交换，转化为世界范围的社会必要劳动，转化为商品的国际价值。这种商品的国际价值与商品的国内价值不同。它不是由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生产该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而是由“世界劳动的平均单位”^①，即一切有关国家生产该种商品所消耗的 necessary 劳动时间的平均数量来决定。但是，各国社会劳动生产率是不一样的，因此一种商品的国内价值和国际价值是不等量的。在一国范围内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国内商品价值，在世界范围内就变成了个别价值而与在世界市场上自然形成的国际价值相对立。这是价值规律在世界市场上的体现，并使价值规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② 这就会发生如下的情况：“一个国家的三个工作日也可能同另一个国家的一个工作日交换”^③；“处在有利条件下的国家，在交换中以较少的劳动换回较多的劳动”^④。正如马克思说的，“这好比一个工厂主采用了一种尚未普遍采用的新发明，他卖得比他的竞争者便宜，但仍然高于他的商品的个别价值出售，就是说，他把他所使用的劳动的特别高的生产力作为剩余劳动来实现。因此，他实现了一个超额利润。”^⑤ 一种世界商品的国际价值用世界货币的形式表现出来，就是这种商品的国际价格。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世界商品的价值并不决定于它的国内生产成本，而一般地决定于它的国际生产价格，即国际平均生产成本加国际平均利润（预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1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112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112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5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65页。



付资金乘国际平均利润率)。因此,即使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以前,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在它同落后国家(如印度或中国)的国际交换中,必然凭借它的经济优势(如较高的资本有机构成,较高的劳动生产率和对方的低工资等),无偿地从后者攫取巨量的剩余价值,形成自己的超额利润。更何况那时的国际交换常常伴随着暴力和超经济剥削等原始积累型的手段。在这里,应当指出伟大的资产阶级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比较成本(或比较利益)学说所具有的二重性。一方面,这个学说肯定了参加国际贸易的双方都能得到一定的利益,在当时反对封建主义(特别在当时英国“谷物税法”问题上)、扩大国际贸易和促进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确实起过进步作用。即使在今天,它对促进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也还在起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必须指出,李嘉图不加区别地片面宣扬贸易国双方都能得到“实惠”和“幸福”的论点,又有它的欺骗性,因为它掩盖了资本必须以剥削剩余价值为前提的本质,也就是掩盖了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落后国家劳动人民通过实际上的不等价交换实行敲骨吸髓的剥削的实质。

至于到了垄断资本主义时代,国际资产阶级以追求最大的超额利润为目的,世界商品的价格更不决定于商品的国内生产成本(即使在国内市场,价格也不决定于生产成本加平均利润,而决定于垄断生产价格),而是在多数场合(因为还存在着竞争)决定于国际垄断生产价格,即国际平均生产成本加垄断平均利润(预付资金乘垄断平均利润率)。这种垄断平均利润率是以帝国主义时代的国际经济领域既存在垄断,又存在竞争为前提而自然地形成的。由于金融资本的国际垄断,帝国主义国家常常以国际垄断高价卖出自己的制成品,以国际垄断低价买进原料和初级产品,造成越来越大的国际价格的剪



刀差，置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于愈益贫困的境地。有时，垄断资本又以低于国内市场价格的垄断倾销价格，在世界市场上大批抛售自己的产品，以达到其挤垮和摧毁落后国家的民族经济，保证自己获得高额垄断利润的目的。

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战胜竞争对手，争夺世界市场，便展开以保护关税壁垒为主要手段的激烈的贸易战，这是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发展的必然规律。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商品市场和原材料产地，这是资本主义本身内在的要求；这种争夺进行到白热程度，就发展为军事冲突，直至世界大战。

3. 世界货币

世界市场的形成，大大促进了国际交换的发展。据统计，在十九世纪的前七十年中，世界贸易额增长了六倍多。世界货币的出现正是世界经济交往发展的必然结果。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只有对外贸易，只有市场发展为世界市场，才使货币发展为世界货币”^①。随着国际贸易和国外投资的发展，逐步形成适应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世界推行所需要的国际货币体系。

在世界市场上，商品必须找到可以作为它们的一般等价物和它们对立，并进行交换。这种一般等价物，必须是一种特殊商品，具有独立的价值形式，并且摆脱货币的各种地方形式，作为世界货币，同各种各样的商品互相对待。这种世界范围的一般等价物，即世界货币，在它初期的生活史上，就是自然形态的黄金和白银，也就是金条和银块。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商品的自然形态，同时就是抽象人类劳动的直接社会的实现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78页。



形态。它的存在方式，才充分和它的概念相适应。①”

金和银作为世界货币的职能主要有三项：一是充当国际支付手段；二是充当国际购买手段；三是充当国家或世界财富的体现物，由一国转移到另一国。这些职能在国际贸易、国际信贷和储备基金中得到体现。在储备基金中，又表现出世界货币的贮藏职能。②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要求国家银行储备基金保持适当的限度，以保证资金正常的周转和商品的顺畅流通。这是一条规律。

世界货币的体系和作用常常为一个或几个经济强国所支配。这种一个或几个经济强国，在自己国内以黄金和白银为储备而发行和流通的纸币，随着这种支配力的扩大，就作为世界货币的实体形式，在世界范围内（全部或局部）流通着，并且在不同程度上发挥着和金银相同的储备作用。

由于英国在世界市场和国际信贷方面优势的加强，它于1816年首先从金银复本位制过渡到金本位制。后来，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实行这种过渡，世界货币体系就逐渐转变为一个以英镑为中心、以黄金为唯一基础的国际金本位制度。这个制度曾经是一种比较稳定的世界货币制度。它对资本主义和世界经济的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到垄断的过渡，国际金本位制度（它从1881—1914年享有自己的“黄金时代”）对国际金融资本的形成和壮大所起的推动作用是不能轻视的。

英国从二十世纪以来，特别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9年爆发的严重经济危机，它的经济地位日益下降，由它一手维持的金本位制也随之崩溃。1931年9月，它首先被迫停止实行金

①②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25页，第127—128页。



本位制；1933年3月，美国也宣布脱离金本位制。英镑和美元当时是最重要的外汇储备。这两种货币遭到危机，迫使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归于瓦解，致使整个国际金融关系陷于混乱状态。这种情况对于继1929—1932年的世界经济大危机而出现的长期的特种萧条起了促进作用。

在资本主义世界，当一种正常的或者比较正常的货币体系崩溃之后，帝国主义国家便要加强对外汇管制，实行外汇倾销，组成相互竞争、对立乃至对抗的货币集团，进行激烈的货币战。这也是资本主义世界货币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英镑为中心的国际金本位制崩溃以后的情况是这样，二次大战后在美国经济占相对优势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以美元为中心的布雷顿森林世界货币体系于1973年崩溃以后的情况也是这样。

4. 世界资本——资本的国际化

世界货币的确立，和世界货币转化为国际资本，就其萌芽状态说来，是同一个过程，或者说，是同时发生的过程。

有两种不同的商品流通形式。一种是：商品（W）——货币（G）——商品（W），即由商品转化为货币，再由货币转化为商品，为买而卖，目的是取得使用价值，满足消费需要。另一种是：货币（G）——商品（W）——货币（G），即由货币转化为商品，再由商品转化为货币，为卖而买，目的是取得或增殖交换价值。在第二种流通形式中，货币（G）常常不单是G，而是 $G + \Delta G = G'$ 了。这里， G' 中已经加进了原价值以上的超过额（ ΔG ），就是说，已经获得了剩余价值。在这种流通形式中，货币已经不再是单纯地作为货币，而是转化为目的在于获取剩余价值的资本了。世界货币出现在世界市场上，作为购买手段，或者作为支付手段，或者作为贮藏手段，或者作为社会财富的代表，一般地都会经过多次反复，充当获



得剩余价值的手段。因此，世界货币在它出现时，常常立即采取世界资本的形态，就是说，其目的不是为了取得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增殖交换价值，即从国外取得超额利润。

资本国际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要求。这同资本总是力求无限制地要求扩大剩余价值这一客观规律是分不开的。资产阶级为了推销商品，寻求廉价原料和劳动力，走遍世界各地，并且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力求把全世界各个角落的生产和消费，纳入资本主义的体系。他们利用资本的多种形态：货币形态，商品形态，劳务和服务形态，技术形态以至意识形态（办教堂、学校、医院等等），从物质到精神，使一切民族臣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列宁指出：“自由竞争占完全统治地位的旧资本主义的特征是商品输出。垄断占统治地位的最新资本主义的特征是资本输出。^①”当然，早在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期，世界资本的形态已经存在。初期的资本输出，主要采取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的形式，以及一部分证券的形式。从十九世纪初期起，先进资本主义国家逐步在殖民地和附属国兴建铁路和港口，发展采掘工业。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加速了资本的集中和积聚，推动了银行资本与工业资本的结合，形成金融寡头的垄断，产生了大量的过剩资本。这样，资本输出就迅速增长，构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当时国际资本的主要流向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

二次大战后，由于一批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一大批殖民地、附属国获得政治独立，资本帝国主义的活动范围大为缩小；加以科技革命和生产的迅速恢复

^①《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下同）第782页。



与发展，输出资本的数量急剧增加。国际资本的流动主要转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投资的方向进一步转向制造业等生产部门。同时，由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西方国家以国家资本的形态（如外援等形式）输出国外的比重有所增加。

在这里，应该特别指出，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组织新形式的跨国公司，当前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上主宰和瓜分世界的主要工具。这些跨国公司的资本所有权一般是属于一国的垄断资本集团，它们基本上是垄断资本国际化的表现形态。二次大战后，一部分国际托拉斯和康采恩采取了两国或两国以上的私人垄断资本的联合所有制形式，它们的股权为两国或两国以上的垄断资本集团共同占有。这种趋势估计将继续发展，并将成为重新瓜分世界的日益重要的力量。

总之，资本输出和世界资本，是金融资本统治殖民地、半殖民地和附属国的物质基础。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国际化。垄断资本主义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家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实行殖民压迫和经济剥削的世界体系。于是，我们所说的真正的近代世界经济才最终形成。这时的所谓世界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在国际分工、世界市场、世界货币和世界资本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全世界范围的生产关系及与它相适应的交换关系的体系；也就是全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亦即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

这样一种世界经济的形成，归根结底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发生了以蒸汽机为代表的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结果，人类社会从封建主义进入资本主义，形成了国际分工、世界市场和世界货币，使交换



国际化，世界经济开始产生。世界经济的这个初级阶段或萌芽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商品输出。它是和资本主义的自由竞争阶段相适应的。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发生了以电气工业为代表的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结果，自由的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的资本主义，形成了金融资本、国际垄断组织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使经济生活国际化特别是资本国际化，从而世界经济最终形成。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这个成熟阶段的主要特征，是资本输出。它是和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相适应的。

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形成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中起了巨大的进步作用。第一，它消灭了民族闭关自守状态，为生产力的蓬勃发展开辟了广阔途径。第二，它使经济关系国际化，为建立全世界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准备了物质前提。

但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是建筑在资本对劳动、少数帝国主义国家对大多数落后国家的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之上的。它包含着劳动与资本、殖民地与宗主国，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深刻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使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瓦解成为不可避免的。

（二）当代世界经济的历史特点

伟大十月革命的胜利，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从此，世界经济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即从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向统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经济过渡的时期。这一过渡时期将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



迄今为止，世界经济的这个过渡时期已经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从十月革命胜利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世界经济有些什么特点呢？

第一，世界经济的性质和格局根本改变了。

世界经济已经不再是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而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敌对的经济体系同时并存的过渡性质的矛盾统一体。这时的国际经济关系，除了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既互相争夺又互相勾结，以及帝国主义国家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剥削与被剥削、掠夺与被掠夺的旧的经济关系之外，出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互相依存、互相斗争，以及它同弱小国家之间的平等、互利和合作的新的经济关系。

第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发展、壮大。

苏联人民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高速度地发展经济，大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经过几个五年计划，苏联从1928—1940年，国民收入增加了4.1倍、工业产值增长了5.5倍，农业产值增长了30%，从而极大地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力量和国防力量。这种发展速度大大超过了当时的资本主义体系，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第三，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动荡、衰退。

第一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社会主义苏联的诞生，使资本主义体系进入了总危机时期。在总危机的基础上，资本主义经济更趋腐朽，资本主义的各种矛盾更加尖锐。在这期间，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历了恢复、危机（1920—1921年）、相对稳定、大危机（1929—1933年）、特种萧条和危机（1937—1938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为此



承受了最沉重的经济剥削和负担，这就促使它们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日趋高涨。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生的。它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之间的矛盾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空前尖锐化的结果。战争的结果大大削弱了资本帝国主义的基础，大大扩展了社会主义的阵地，大批发展中国家兴起了。这样，世界经济进入了过渡时期的第二个阶段。我们现在正处在这个阶段。

世界经济在这个阶段有什么特点呢？它发生了什么新情况和新问题呢？

这个阶段世界经济的基本特点是：在生产国际化和资本国际化的基础上，国际经济关系有了空前的发展；资本主义体系经历了恢复、高度发展、危机、萧条和停滞；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发展壮大，同时经历了动荡、分化和严重的曲折。上述情况使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间出现空前错综复杂的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斗争的新局面；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兴起和发展，极大地有利于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发展和壮大，但它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道路，经历着曲折和困难。这种基本情况使世界经济面临着许多新现象和新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资本主义体系方面。

应该看到，资本主义体系在当前世界经济中仍然占着优势。二次大战后，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段恢复和整顿，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渡过了一段高速度经济增长的时期。那时，日本、联邦德国等国，经济增长速度超过了资本主义全部历史上的记录。尽管如此，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还是不断发生。1973—1975年爆发了战后一次很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之后，经济回升缓慢，出现了经济增长停滞、通货膨胀



严重和高失业率三者顽固结合的所谓“滞胀”或“衰退增长”的局面。这种局面可能持续一个较长的时期。1979—1982年，由美国带头，整个西方又发生了战后最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其严重的程度接近1929—1933年的世界经济特大危机。从1983年起也由美国带头，西方各国经济先后从危机的谷底爬出来，开始复苏。但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经济回升的劲头除个别国家（如美国）外，一般不大。西方各国首脑，除美国里根总统外，都忧心忡忡。

国际资产阶级有长期的统治经验。他们为了延续资本主义制度的寿命，采取种种手段，对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局部的调节，使生产关系的某些方面，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范围内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当前，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采取的主要措施是：

（1）实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和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通过国家干预（包括计划、国有化、信贷、税收、财政、金融、增加军事订货等渠道），控制和调节国内和国际经济生活的各个环节，以达到垄断资本获取最大利润的目的。战后各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逐步注意制订经济计划，在不同程度上“指导”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同时，为了争夺世界市场，在资本进一步集中的同时，注意发挥中小企业灵活性和适应性较强的特点，提高它们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提倡小而精的富有弹性的工艺。另一方面，大企业本身普遍推行生产经营多样化的战略方针，纷纷建立混合联合企业，以增强自己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

（2）大搞“福利社会制度”、“人民资本主义”和“人道市场经济”。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国际资产阶级大力推行各种各样的改良主义办法，例如“高工资”、



“高消费”、鼓励职工买股票、工人代表参加企业管理、逢年过节给工人送礼、让职工代表参加制订经济计划、资方和职工会协议工资额、提高利润所得税率，等等。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确实进到了老年和垂死的时期。但国际资产阶级不甘心于自己的死亡，他们力图垂死挣扎，对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作些局部调整。当然，这些改良一般都是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重工人劳动强度的基础上进行的。

(3) 十分注意科学技术的发展。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加速经济发展，主要依靠科学技术的新的突破。这些国家的政府和企业，都把大量的人力和资金，投入科学研究和发展部门。自然科学家、工程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常常是政府的重要官员和企业的领导骨干。他们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预测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上半期的经济发展和生产、消费水平，试制将使用于2000年或更远将来的新产品，力争主动地掌握和占领世界市场。

(4) 资本进一步国际化。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一步发展生产专业化和协作化，如组织西欧“共同市场”、多边经济协调委员会等，使它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协调发展；同时，竭力采取新的形式和方法恢复和发展它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如采取跨国公司的新形式进行渗透，以便控制和垄断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命脉。在发展中国家要求经济独立和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方面，有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行一点让步政策，使发展中国家民族经济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以此来维护垄断资本的国际统治。积极向苏联和东欧国家打开市场，通过多种联系渠道，扩大贸易，提供贷款，直至建立混合联合企业等等。对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也力图恢复和发展经济联系。这是战后资本主义国际化和国际经济关系发展



中的新动向。

其次，我们来看社会主义体系的情况。

二次大战后，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各国人民长期斗争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以及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极大地壮大了社会主义体系的力量。它们构成了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相抗衡。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以较高速度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和科学文化，显示出社会主义无比的优越性。以中国为例，尽管十年内乱，遭到林彪、“四人帮”的严重破坏，但是从长期看，我国经济发展速度仍然高于资本主义世界。从1952—1978年，我国工业年产值平均增长率超过11%。同1949年相比，1978年的粮食生产增加1.7倍，棉花生产增长3.9倍。1979年，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达到3,200亿元，相当于旧中国近一百年积累起来的工业固定资产的25倍。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有较高速度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大大提高。

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一批新的社会主义国家，它们积累了三十多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不同模式，从而丰富了整个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宝库。苏联在列宁、斯大林领导下建设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在自力更生基础上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并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这是一种模式。南斯拉夫在铁托领导下，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实行工人自治和社会自治。他们比较重视市场调节，同时逐步注意计划调节。这又是一种模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最初基本上照搬苏联的作法，随后又都根据自己的建设实践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改革，逐步形成适合本国的模式。在南、罗的模式中，对国际分工和国际市场都十分注意，在积极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同时，重视



和利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现在，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丰富多彩了。不同的建设道路和模式可供比较研究，以便扬长避短，互相补充，十分有利于加速各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我国是幅员辽阔、拥有十亿人口和丰富资源的社会主义大国。从粉碎“四人帮”，特别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再经过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二大，我们已经总结了建国以来三十多年建设中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确立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中国人民一定能够通过自己的艰苦努力，健康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功地形成一个独特的中国模式，以丰富世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宝库。

最后，我们来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都是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的枷锁而兴起的新生力量，是当代反霸、反帝、反殖斗争的主力军。它们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国家，处于中间大、两头小的状态。所谓“两头小”，其中一头指的是发展中一批社会主义国家，我们中国就属于这类国家，它们正力求以自己的榜样为第三世界寻找和提示正确的发展方向；另一头指的是那些独立后继续依附于外国，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摆脱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这两类国家在当前发展中国家中都占少数。所谓“中间大”，指的是发展中的民族主义国家。它们占发展中国家的大多数。这些国家一般由民族资产阶级掌握政权，面临发展民族经济、争取经济独立以巩固政治独立的艰巨任务。它们除少数石油输出国和所谓新兴工业国家外，大都处于比较贫困，甚至十分贫困的境地。它们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还在继续扩大。它们中的许多国家既缺乏粮食、资金，又缺乏技术、经验。为发展民族经济，它



们正在开展国际交往，其中大量的经济联系是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由超级大国和国际垄断资本控制的旧的国际经济秩序对发展这种联系极为不利，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已经拿起多种武器（如石油、原材料等），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有力的斗争。它们正在团结起来，以七十七国集团为骨干，为建立比较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而英勇奋斗。这一斗争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它对第三世界的发展、壮大，对社会主义体系最后战胜资本主义体系的斗争是极为重要和有利的。

世界经济作为一个历史的客观实体，它的发展大体上将经历三个大的历史时期。世界经济从最终形成以来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内，大致四十年左右是一种所谓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这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历史时期。这种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发展到十月革命胜利，世界上产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便宣告结束，接着便进入了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第二个历史时期，即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存的过渡时期。这种两个经济体系并存的局面，将持续相当长的一个时期，直到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最后战胜并完全取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世界进入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经济的时代为止。这种从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经过对自己的否定，发展到统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经济，标志着世界经济进入了自己发展过程中的第三个历史时期。这个转变代表着世界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质的飞跃。由于消灭了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克服了国家和民族界限的障碍，从那时起，全世界范围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比历史上任何时期更加迅速得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经济代表着一种在地球上初次出现的完全新型的世界经济，它将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



而在人类面前展现出无限瑰丽的前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世界经济充分发展的时期，从这时方才开始。也可以说，整个人类的真正历史从这时方才开始。在这之前，都只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史前时期”，或者说，整个人类的“史前时期”。这个“史前时期”必将结束，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经济必将葆其无限美妙之青春，谱写人类真正历史的光辉篇章。这是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

由此可见，世界经济作为一个统一的客观实体，有它自己形成和发展的历史，有它自己的特殊矛盾和特殊的运动规律。它不是各国国民经济简单的总和，它的运动规律也不是各国国民经济运动规律的简单延伸。因此，需要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来分析、研究它的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这门学科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经济学。

那末，当代世界经济，作为一个整体，究竟有哪些特殊矛盾和特殊规律呢？



第一篇 当代世界经济若干总的发展规律

第一章 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长期共存，互相依赖又互相斗争的规律

当代世界经济存在着资本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的严重矛盾。这两个体系构成对立的统一体，将在很长时期内同时并存。它们既互相斗争又互相依存。资本主义体系与社会主义体系长期共存，互相依赖又互相斗争直到社会主义制度在世界范围内最后取代资本主义制度这条规律，是当代世界经济的一条根本性的客观规律。

（一）否定之否定

资本主义有它的伟大的历史功绩。它创造出了比它以前的任何社会制度多得成千上万倍的物质生产力和高得多的精神文明。但是它必然要死亡，必然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所取代。这是铁的历史规律。这一点，马克思讲得最清楚、最周密、最精辟。他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斩钉截铁地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为什么呢？因



为“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资本的生存条件是雇佣劳动。雇佣劳动完全是建立在工人的自相竞争之上的。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于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赖以生产和占有产品的基础本身也就从它（资产阶级——引者）的脚下被挖掉了。它（资产阶级——引者）首先生产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①马克思的毕生巨著《资本论》就是用最科学的论据，用自然规律般的严格性，说明了这个道理。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就简明、精确地表达了资本从发生、发展到灭亡的全过程。他说：资本主义的私有财产是建立在剥夺小生产劳动者的劳动条件的基础之上的。“劳动者一旦转化为无产者，他们的**劳动条件**一旦转为**资本**，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旦用自己的脚跟站起来，劳动的进一步社会化，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进一步变为社会利用的、**共有的生产资料**的变化，从而，对**私有者**的进一步**剥夺**，就会采取一个**新的形式**。现在要被剥夺的就不再是自己经营的劳动者，而是剥削许多劳动者的资本家了。”“**资本垄断**，成了这种和它一起，并且在它下面繁花盛开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会被炸开。**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响起来了。剥夺者被剥夺了。**”“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出的资本主义占有方式，**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个人的以本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资本主义生产又以一种自然过程的必然性，生出了它自身的否定。”即从“那种事实上已经建立在社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会生产经营基础上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化为**社会的所有制**”，
“这是**否定的否定**。”^①

我之所以这样比较多地引用马克思的原话来论证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必然胜利的规律，目的有两个。

第一个目的在于说明马克思用他最高度的科学精神和精确性发现和论述了的这个规律，是铁的客观规律。这个规律已经部分地，以后必将全部地被证明为颠扑不破的真理。它并没有过时，也决不会过时。它是绝对真理。因此，一切所谓“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论”、所谓“资本主义永存论”及其变种“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溶合论”等等，在这个支配当代社会发展变化的绝对真理面前，都或迟或早只能碰得头破血流，宣告自己的彻底破产。

第二个目的在于说明，这条规律的发生作用及其体现是一个非常复杂、丰富和曲折的过程。而在全世界范围内求其实现则是个很长的过程。对于这个长期、复杂和曲折的过程（这一过程迄今还远远没有完成）的分析和描述，当然，不能要求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而只能有待于他们的学生和后继人了。

迄今为止，作为马克思的最优秀的学生和最伟大的继承人列宁，随着历史的发展，继承和极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他卓越地分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特征，称它为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它是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夜。列宁根据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他们当时的情况所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必将在全部或多数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的著

^①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841—842页。



名论点，发展成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个国家首先取得胜利的新论点。列宁以他无比的智慧和胆略，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取得了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创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马克思所首创的关于共产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转化为客观的社会存在。列宁还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过渡时期的具有国家资本主义性质的新经济政策，为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现代化，以及为全世界各国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劳动人民的民族民主革命，制定了正确的战略方针和政策。

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在列宁领导下并在列宁逝世后领导全国人民进行了史无前例的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光辉的成就。他领导苏联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干涉，冲破资本主义的包围，并成功地利用了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弱点和危机，引进外资和国外先进技术，招聘西方国家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促进和加强了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建设。他批驳了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坚持一国可以建成社会主义的论断，主张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广泛的经济往来，指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孤立存在，它是与资本主义国家相互依赖的。最后，他领导苏联人民进行了英勇卓绝的卫国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斯大林所提出的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资本主义经济恐慌和特种萧条、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以及在他晚年提出的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等等重要理论观点，尽管有些个别缺点和错误，但其主流是正确的，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的强有力的理论武器，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其巨大的作用。

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同志，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基本原理，与我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和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革命理论和战略策略，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他提出的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关于中国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应当学习外国一切长处的理论和方针，以及他在国际斗争领域提出的“中间地带”论和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规定，都曾起过并将继续起重大的指导作用。至于毛泽东同志的革命军事思想更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成为世界革命人民特别是后进国家劳动人民手中的强大武器。尽管他在晚年的革命理论和实践中犯过错误，甚至严重的错误，但是在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斗争中，特别是在中国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无疑曾经起过并将继续起极其伟大的作用。

除此以外，全世界各国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近一百年来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斗争规律，根据各国和整个世界政治、经济的新情况，作了新的论证，提出了新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些论证和观点都经受并将继续经受人人类实践的检验。

我们的任务就在于：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继承先行者的丰富遗产，对于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的斗争的新形势、新现象、新问题作深入周密的分析，探求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一规律的新内容和新特点，以求在世界范围内有利于这一斗争的胜利进行。

资本主义制度从它的诞生、发展直到现在的老年时期已有



近五百年的历史。它在封建社会的娘胎里发育成长，它逐渐吞噬并最终咬死了自己衰老落后的母亲——封建主义。它在青年、中年到双鬓初白的年代里，逐步占领了全世界。就在它的大好年华里，它亲手抚养了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当它刚刚进入垂暮之年（帝国主义阶段），1871年它的第一位掘墓人——巴黎无产阶级给了它狠狠一击。法国资产阶级为此几乎送了命，幸亏普鲁士以及其他一些国家资产阶级纷纷救驾，才保了它的命。巴黎公社失败了。1905年，另一个强悍的掘墓人——俄国无产阶级又起来给俄国地主资产阶级狠狠一击，结果又被俄国反动派在各国反动派帮助下打下去了。马克思和列宁，先后总结了巴黎公社和1905年俄国革命的经验，大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教育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直到1917年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正酣之际，列宁用他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胜利地领导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接着列宁、斯大林领导人民粉碎了十四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合武装干涉，在二十多年后，斯大林又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凶猛侵犯。在同一时期，在中国共产党和朝鲜、越南、东欧各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人民打败了国外侵略者和国内反动派，建立起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从此，社会主义的声威大振，历史进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你死我活拼搏的时期。当时，即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中期，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的普遍而迫切的问题是：社会主义优胜于资本主义，这可以确定无疑了。但社会主义究竟怎样才能最快地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胜利呢？

我们应该承认，资本主义岁月长，老谋深算，经验丰富（包括它同别的社会制度斗争的经验、自己统治的经验和建设的经验）。这是它的优势。它的基本劣势是：由于不可抗拒的



社会发展规律的作用，它毕竟老了，抵抗力弱了，容易犯大病，只能一天天接近于死亡。

同时我们应该承认，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生存历史还很短，只六十多年，比之资本主义的五百年，封建主义的一、二千年，差了一大截，还只是个幼儿，至多是个少年。他走起路来，跌跌撞撞，做起事来，莽莽撞撞，这是在所难免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我们搞社会主义，前无古人，只能摸索着前进。乖巧一点，虚心一点，肯学和善于学习一点，就少摔一点跤，成功就多些、快些。愚蠢一点，骄傲一点，不肯或不善于学习，摔跤就多些、重些。年幼缺知，这是我们的劣势所在。但我们有自己的基本优势：社会主义以人类历史上最先进的阶级——无产阶级的最科学的思想体系，即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生产资料私有制决裂，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一切剥削制度，是人类历史和人的生活的真正开始。它是初升的太阳，前程无量，必将光照全球，囊括世界。

（二）互相依存与互相斗争

自从十月革命胜利，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以来，人类便进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的基本特点就是两种制度、两类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的互相依存和互相斗争。在这里，依存是斗争的一种方式 and 手段。斗争的最终目的，在资本主义方面是它妄图消灭社会主义，求得资本主义永存；在社会主义方面，则是根据客观历史规律，最后战胜资本主义，使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在全世界获得全面胜利。

历史经验证明，帝国主义国家对付社会主义国家，在前期



常常以武装干涉和军事占领为主，辅之以政治颠覆和经济封锁、禁运和渗透。十月革命胜利后，帝国主义国家对苏联的联合武装干涉，中国、朝鲜和越南革命胜利后，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侵朝、侵越、威胁中国的战争，就是显著的例子。等到露骨的军事进攻一次次失败了，它们便采取以政治、经济、文化的渗透、破坏为主，辅之以必要的和可能的武装进攻。帝国主义列强在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对付苏联的战略便是这样。那时英、德、美、法等国先后和苏联建交，建立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同时积极准备和策划对苏联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但是结果同他们意愿相反，经过苏联、中国和全世界人民的奋斗，终于赢得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出现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促成了第三世界的崛起。

苏联、中国和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在欧洲、亚洲、拉美坚挺地站立了起来，并且顶住狂风暴雨，站稳脚跟，进而发展壮大，这就迫使老奸巨猾的国际资产阶级，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让他们的谋士们从自己的失败中，也从对手（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胜利中，好好学一点东西，搞出点新谋略来，也就是说，开出点新药方来救他们的老命。

（三）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延年益寿”新药方

国际资产阶级及其谋士们找到的新药方有各种各样，经他们择优取用，并且在一定时期内和在一定程度上见有成效的主要有三个：一个叫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另一个叫福利社会制度和人民资本主义，第三个叫新殖民主义。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

国家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下半期就有了，国家垄断资本主



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也就有了。但从二次大战后，国际资产阶级从英国（它实行资本主义国有经济有点成效）特别从美国（在那里凯恩斯主义立了功）的经验中学了些窍门。另外，他们又从苏联以及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看到了两个好东西：一是国家管理经济的强大作用，二是计划经济的良好效果。于是他们大大加强了国家机器与垄断资本的结合，并依据各自的国情适当地实行以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为基础的不同程度和不同方式的计划调节，加强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这样，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便进一步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恩格斯所说的资产阶级的国家是“理想的集体资本家”、是“总资本家”所扮演的那种角色就更加充分和完备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空前强化了。这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状态的约束，经济结构的某些调整，进一步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和尖端产品，增强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性和竞争力，以及对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变形，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局部调整，并且是促成二十世纪五十、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高速起飞的所谓“黄金时期”的一个重要因素，同时也是这些国家在七十、八十年代多次爆发严重经济危机和长期“滞胀”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福利社会制度和人民资本主义

所谓人民资本主义是第二国际信奉者们所提倡的改良主义的变种。这种改良主义原是十九世纪末期、二十世纪初期面对马克思主义蓬勃发展，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空前高涨，国际资产阶级用以对抗和救自己命的一种欺骗手段。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并且表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生命力之后，深谋远虑的国际资产阶级在本国工人运动的强大压力下，总结了由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同



时吸取了社会主义国家一些人民当家作主、切实改善人民生活的经验，并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提出了一整套所谓人民资本主义和福利社会制度的理论、战略和政策。他们鉴于资产阶级法西斯专政失败的惨痛教训，就特别强调所谓“民主”和“人权”的概念。他们提倡高工资、高物价、高消费的所谓“三高”政策来刺激生产，增加就业。他们提高企业和个人的所得税率，鼓励职工买股票。他们在经营管理方面，提倡工人选举代表参加企业董事会，参与公司的决策，甚至提倡职工终身雇佣制（这在日本最突出），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逢年过节访问职工家属，挨户送礼。他们还提倡企业兴办学校，让职工子女免费上学；兴办医院，让职工及其家属免费治疗；设置养老院，让职工安度晚年，等等。所有这些，我们在日本、美国、北欧各国都能看到不少。1982年当我们去日本丰田汽车厂参观时，我问接待人员：“你们那一套管理制度是从哪里学来的？”他们笑着说：“你们总说什么要向我们学习科学管理方法，说实在的，我们还是从你们的‘鞍钢宪法’那里学来的呢！”国际资产阶级实行“人民资本主义”、“福利社会制度”那一套，局部地调整了一些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特别是分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起到了一点缓和阶级矛盾、掩盖资本主义制度面对着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严重挑战的作用。

新殖民主义

老殖民主义如荷兰、西班牙、葡萄牙直至英、日、德、意都是以实行超经济的军事占领、政治压迫、经济掠夺为主的殖民主义。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的兴起，使老殖民主义体系土崩瓦解。然而，帝国主义毕竟是帝国主义。它的存在就是以从国外获得最高的超额利润为前提。国际垄断资本总结了老殖民主义失败的教训和某些后起的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在经



济、文化方面侵略的“成功”经验，同时又借鉴社会主义国家给予发展中国家在平等友好的基础上进行援助和交往而受到受援国的欢迎和赞美这成功的办法，制定和实施着它们的新殖民主义纲领。它们扩展跨国公司的网点，建立各种各样的国际经济组织，双边和多边地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经济援助，进行文化技术交流。有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跨国公司还转让或移置一部分劳动密集甚至技术比较密集的企业于发展中国家，有意识地让它们发展民族经济和买办经济，提高一点生活水平，以利于自己扩大商品市场，扩大廉价原料和劳力的来源，这样来保证自己源源不断地从发展中国家获取超额利润。这些是新殖民主义的主要活动方式。

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体系面对自己的地盘日益缩小，实力日益衰弱的严峻局面，为了挽救和维护自己的生存，采取了增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实行福利社会制度和新殖民主义等战略战术手段。结果，衰老的资本主义虽然没有由于采取了这些手段，从根本上解决它内在的基本矛盾，保证它的永生，但是，必须和应该承认，这位垂死的老人确实因为“服用”了这些人参、鹿茸之类的补药，恢复了一点活力，相当延长了它的寿命。同时，在这里必须指出，资本主义在不少发展中国家播下了自己的种子，它们确乎在生根发芽。这是新生的民族资本主义，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起了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它同它们有矛盾，后者成为前者顺畅发展的严重障碍，前者为了排除阻难不能不奋起斗争。广大发展中国家掀起的石油斗争，特别是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是明显的例子。它们为老牌资本帝国主义添加了困难（例如促发和加深了它们的经济危机）和不安。但是另一方面，某些民族主义发展中国家，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建立国际经



济新秩序的斗争取得某些重大胜利的条件下，可能走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路子，走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从而为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输入新血液，增添生力军。这一因素，是我们在展望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总体构成及其发展前景时不能不加以考察的。同时，这个因素，又将是使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存在着互相依存和互相斗争的关系所以成为持久局面的一个新的重要原因。

（四）社会主义的抉择：取长补短，合作 共处，和平竞赛，争取最后胜利

现在我们来谈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这大致已经经历了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17—1945年），即苏联在全世界范围内还是社会主义孤岛的时期。

在这时期内，苏联首先挫败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反动派发动的内战的破坏，然后先后同资本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发展经济、文化交往。它从内战结束、实行新经济政策，到实行第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先后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下，一面警惕帝国主义的阴谋破坏，一面放手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它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从国外引进资金，特别是先进技术，以促进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

首先，为了冲破经济封锁，苏联力图发展对外贸易。1921年它先同美国进行贸易往来。1923—1924年度，苏美贸易额达到2亿卢布，1924—1925年度猛增到8亿卢布。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相继和苏联发生贸易关系，它们力图加强对苏联的出口，限制从苏联的进口，以转嫁自己的经济危机。1933年



斯大林指出：“我们不能只有进口，没有出口，因为我们没有能够按期付款的把握是不愿意定货的”。^①因此苏联专门成立对外贸易人民委员会和出口委员会，要求增加出口的数量，提高出口货的质量。1929—1933年，苏联进出口贸易达到142.8亿卢布，出口总额达到133.9亿卢布。同期内，苏联还出口粮食1,200万吨，价值4.5亿卢布。

其次，引进外资。建国初期，通过租让制形式引进的外资达4,800万金卢布，其中英国2,000万金卢布，瑞典760万金卢布，德国750万金卢布，日本670万金卢布，美国240万金卢布。苏联从租让企业中得到的收入1924—1925年度为680万卢布，1927年为1,611万卢布，1928年为1,010万卢布。租让企业的产值虽然不大，却为当时苏联提供了相当数量的石油、木材、黄金等重要产品。正如列宁指出的，“租让制政策施行成功，就会使我们获得为数不多、但却具有现代先进资本主义水平的模范的——和我们的比较——大企业”。^②其后，德国是向苏联提供贷款最早和最多的国家，它在1926年向苏联提供3亿马克的政府担保贷款。1929年和1930年，英国和意大利先后向苏联提供担保出口信贷。其他如瑞典、丹麦、挪威等国也相继向苏联提供这类信贷。到1931年底，苏联的外债总额达到14亿卢布。这种信贷大大有利于苏联进口大量的技术装备。

再次，引进先进技术设备。苏联当时从德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引进大量先进技术和设备。作为苏联经济台柱的冶金业，当时的三大钢铁厂（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库兹涅茨克和扎波罗什）就是由美国和德国援建的。1928—1932年间，苏联所有的高炉几乎都是以美、德两国的原型为基础设计制成的。

^①《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246页。

^②《列宁全集》第32卷第340页。



在汽车和拖拉机工业方面，著名的高尔基汽车厂是三十年代初由美国福特汽车公司负责扩建的，斯大林汽车厂的生产设备是由美国和德国制造的；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在创建时，由美国人担任建设总工程师，设备由德国和美国提供和组装。在重型机械工业方面，乌拉尔重型机器厂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厂的主要先进设备也来自西方国家。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的大项目哈尔科夫电机厂由美国通用公司援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电气设备制造厂乌拉尔电机联合企业则是由英、德、美援建的。著名的顿巴斯煤矿和乌拉尔煤矿是在三十年代初由美国和德国三个公司援助建设的。苏联的炼油厂设备有70%以上由外国设计制造。在飞机制造业方面，1932—1940年间，美国有二十多家公司向苏联提供飞机和配件，并给予技术援助。在造船业方面，从苏联建国到1941年，商船船体的72%和发动机的77%是由德国、法国、英国制造的。

苏联在当时还大批招聘外国专家，并且给予重任。1932年在苏联重工业部门工作的各种外国专家达6,800人。美国康恩公司的总工程师曾担任苏联国家建筑委员会的主席。美国费城的一个工程师谢·聂门茨曾担任全苏建筑托拉斯的经理。福特汽车公司的建筑师斯瓦简先后担任过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和哈尔科夫拖拉机厂的总建筑师，并荣获列宁勋章。美国人约翰·卡尔德也因担任马钢的技术经理和巴尔喀什铜矿工程的总顾问等领导职务有功，荣获列宁勋章。不少外国专家因援建有功，领受劳动红旗勋章。

苏联当时还大批吸收外国熟练工人帮助建设社会主义。1931年顿巴斯煤矿就用高工资雇用约2,000名外国工人，其中德国工人占80%；库兹巴斯煤矿曾雇用美国工人1,500人。

同时，苏联有计划地派遣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出国考察和



学习，掌握外国先进技术，并搜集技术情报。他们在短期内学到了许多西方国家长时期内发展起来的先进技术。^①

苏联在这一时期的对外经济技术关系，有力地说明了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互相依赖的关系。资本主义国家为了缓和和转嫁经济危机，争夺国外市场，攫取高额利润，就在武装干涉遭到失败之后，开始积极发展同苏联的经济贸易关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则利用帝国主义国家的内部矛盾，利用它们的经济困境和经济危机，大力推行开放政策，发展对外贸易，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学习他们的科学管理方法，以推进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增强自己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提高自己的经济军事实力，以防御和粉碎敌人的武装入侵。苏联社会主义的建成和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充分证明了当时苏联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第二个时期，从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中期，存在着强大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与世界资本主义阵营相抗衡。

在这一时期，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深受战争创伤，亟需恢复自己的经济，只有独发战争横财的美帝国主义热衷于干涉和推翻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它疯狂地进行了侵朝、侵越和威胁中国的战争，结果都以惨败而告终。但它还不死心，继续霸占南朝鲜和台湾省，对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封锁、禁运和破坏。当时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着力于阵营内部各国的互助合作，从事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52年斯大林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平行的互相对抗的世界市场”的论点。

^①以上材料参见萨顿(A. C. Sutton)所著《西方技术与苏联经济的发展(1930—1945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



这个论点在一定程度上正确地反映了当时两种社会制度相互关系的实质，鼓舞了社会主义国家和世界革命人民的斗志。但是，这个论点毕竟不够全面，它实质上背离了列宁和他本人在十月革命后，特别是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所主张和大力实行的理论和政策，即社会主义国家决不能和世界隔绝，而应该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与资本主义国家广泛地进行经济贸易往来，宁可付出些代价，向资本家纳些“贡税”（列宁），以壮大社会主义的实力，主动和资本主义竞赛，以求最后战胜资本主义。在这一时期，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阵营之间的经济贸易关系进展不大。

第三个时期：五十年代中期以后，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破裂。社会主义大国中国，正当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四十、五十年代的恢复发展、六十年代实行经济起飞的时候，由于“左”的错误，在五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六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经济上受到挫折。这两件事，加上别的一些因素，使社会主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处于十分被动和不利的境地，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受到严重挫伤，社会主义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崇高威望大为降低。

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巨大的优越性就在于它能够凭着人民的觉悟和自身的力量，来克服自己的错误，即使是极其严重的错误。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决彻底地粉碎了“四人帮”，清算了相当长期以来的“左”的错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重新走上了马列主义的正确轨道。这几年来，我国经济实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和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的政策，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

在实行对外政策方面，我们坚决打破了十年内乱时期把自



力更生曲解为闭关锁国的错误方针，除继续大力同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平等、友好、互相合作、共同发展的关系外，还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发展经济贸易关系。我们主张社会主义国家应该积极参与当前的国际分工，打入世界市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利用两种资源——国内资源和国外资源，打开两个市场——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学会两套本领——组织国内建设的本领和发展对外经济关系的本领。所以我们应该把发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贸易交往，也放在重要的战略地位。我们要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积极而又谨慎地引用外国资金，积极和正确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科学的经营管理方法，同时要大力开展国际劳务合作。所有这些，都将大大有利于我们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加速我国现代化的步伐，胜利地开创我国四化建设的新局面。

本着我们党的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近年来我们同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往来已有较大的发展。现在世界上已有174个国家和地区同我国建立和发展经济贸易往来。其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美国、法国、联邦德国、英国等，同我国进行的进出口贸易额和经济合作项目，占很大的比重。例如和日本从七十年代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两国政府和人民致力发展双边经济贸易关系，鉴定了一系列政府间的协定，特别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签订，为发展中日经济贸易关系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础。1980年中日两国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大关，比1972年增加了10倍，开创了两国经济贸易关系的新局面。今天日本已经成为我国的主要贸易伙伴。中日贸易额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所占份额已近四分之一。1983年中日贸易总额超过1982年。我国利用日本的资金也有了良好的开端。日本向我国



的六项重点工程、海底油田勘探和煤炭开发、续建大庆油田和宝山钢铁公司有关工程等，陆续提供了一定数量的优惠贷款。1983年11月胡耀邦同志访问日本后，中日双方正协商由日方给予我国新的大量优惠贷款事宜。1982年我国国际投资信托公司在日本募集了100亿日元的债券。1983年我国中国银行开始向日本投资，把一部分美元外汇基金转为日元资产，先用约两千亿日元购买日本国债和日本存款。1982年下半年已向日本证券公司、长期信用公司和三和银行购买日本国债400亿日元。中日两国石油公司合作勘探开发渤海石油的工程进展顺利。中日合作开发的煤炭项目已有七个，计划年总产量2,100万吨。中日经济技术合作正采取多种形式进行。例如日本本田技研公司按照合同向我国嘉陵机器制造厂提供设备和零件，派遣技术人员实行技术指导。日本三菱汽车工业公司从1982年1月起，对北京第二汽车厂派遣技工，协助我方进行质量管理，等等。

又如和美国，中美自从1979年建交以来，两国间的经济贸易关系，有了相当迅速的发展。1980年2月1日起生效的中美双边贸易协议，为两国相互出口规定了对双方都有利的最惠国待遇，这就为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72年，中美贸易总额不足1,300万美元。到1978年，增加为9.9亿美元。但在建交当年，就一跃达到24.5亿美元，一年间增长近150%。1980年中美贸易总额比1979年增长一倍以上，达到48亿美元，1981年又增加到56亿美元，比上年增加了16.7%。1982年为62亿美元。1983年贸易总额因中美关系有所恶化，维持1982年水平，进口额减少32%。据美国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理事长克里斯托弗·菲利普斯估计，中美贸易额到1985年将达到100亿美元。此外，两国之间还开辟了一些新的经济合作的领域。近几



年来，两国的公司共签署了一百多个合同和协定。仅1982年，双方企业就签订了十项合资、合作经营项目，成交了包括煤炭、石油、电子、仪表、机械、冶金等技术引进项目约50个，双方还签署了一些合资经营和补偿贸易项目的意向性协议。芝加哥第一国民银行、美洲银行、大通曼哈顿银行、汉华实业银行等四家美国银行已在北京设立了代表处。很多美国银行积极支持其客户到中国投资、参加银团或参与美国进出口银行对中国贷款，办理租赁业务。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给中国的贷款，业已发挥作用。中国银行纽约分行已于1981年冬开业。中国银行已同九十家美国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和美国进出口银行建立了代理业务往来关系。到1983年上半年，已有二十家美国公司先后在中国成立合资联营公司，其中包括比阿特里斯食品公司、德雷塞工业公司、福克斯伯勒公司、美国国际集团公司等等，这些公司占外国公司迄今在我国成立的83个合资联营公司的近四分之一。

赵紫阳总理在1983年3月曾对美国众议院代表团说：“中美两国在经济技术合作方面是互有需要的。两国应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贸易、经济合作。这方面有许多事情可做”。赵紫阳总理于1984年初访美，1月12日和美国里根总统签署了一项中美工业技术协定。赵紫阳总理在签署协定前发表讲话说，“这表明中美关系的发展有广阔的前景”。里根总统说，“中国目前正在执行一项宏伟的现代化计划。这项协定将进一步促进我们两国的合作，特别是在被中国列为最优先项目的工业部门的合作。”

再如，我国同西欧各国的经济技术合作近年来也有较大的发展。1950年我国与西欧国家贸易额约1.6亿美元，占我国进出口总额的14%左右；进入六十年代以后，贸易额迅速增长，



由1960年占15.6%上升到1970年占28.5%。到七十年代，双方贸易额一直占我进出口总额的29%左右。1981年我国和西欧地区的贸易额增长到62亿美元，创历史最高水平。1983年，中、西欧贸易额有较大的增长。同时双方还签订或将签订一些重要项目的合同或协议。在世界贸易中占三分之一以上的欧洲经济共同体亦是我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占中国对西欧地区贸易额的80%以上。自1975年我国与共同体建交后，1978年签订了第一个为期五年的贸易协定。从1980年起，共同体对我部分出口商品实行普惠制待遇，使双方的经济贸易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到1982年底，我国和西欧国家达成的补偿贸易协议已达二十多项。此外，我国和西欧的经济贸易关系已进一步扩大到开办合资企业、进行工业生产合作、联合勘探和合营开发海上石油等。我国和西欧国家达成建立合资企业、进行合作生产或经营的项目已有二十多个。其中，有些合资企业设在西欧地区，设在国内的也有十几个，分别经营化妆品、葡萄酒、医药、化工产品、电梯的生产或销售，以及为海上开发石油和发展外贸运输提供服务。1983年英、法和西班牙的六家石油公司先后中标，与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签订在海上合作开发、生产石油的合同。在金融信贷方面，自1978年以来，我中国银行先后与英、法、意、比等七个国家的银行界签订了向我提供买方信贷的协议。比利时、丹麦政府还承诺向我提供长期无息贷款；意大利决定向我提供政府贷款。我国和联邦德国、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国家的企业，在中东和非洲进行劳务合作方面也有了良好的开端。我国也已开始向西欧地区输出劳务。总之，中国同西欧经济技术合作的潜力是很大的。西欧，尤其欧洲共同体是世界商品、技术和资本的最大集散地，今后无疑将是我国对外进行经济合作、技术交流和引进的重点地区之



一。

由此可知，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全可以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发展正常的经济贸易关系。我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是坚定不移的。

除我国外，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贸易往来，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和正反两方面的经验。

这里我想着重谈谈，社会主义国家近年来出于各自的需要，并参照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进行经济改革的问题。

二次大战后兴起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自己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都毫无例外地照抄了苏联的模式。但南斯拉夫在铁托同志领导下从1948年起，就开始寻找自己的独特道路，创立了社会主义自治的模式，并且打开同西方国家广泛进行经济往来的大门，与国际市场挂钩，大量引进外资，同时在国内也更多地实行市场调节。结果，经济搞得较活，生产增长较快，人民生活提高的比较快。这是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尽管它在前进道路上也有许多问题和缺点，但是，应该说，南斯拉夫在结合自己的国情，创造性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作出了特有的贡献。

近二十年来，社会主义国家由于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变化和自身所发生的问题和困难，都在用多少不同的形式和步骤进行着经济改革，并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绩。匈牙利的经济改革更加卓有成效。这些改革都或多或少地借鉴和采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管理体制、经营管理方法和经济结构中某些科学的合理成分。

列宁早已指出，不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好的东西，就不可



能建成社会主义。他说：“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①他还提倡要学会做生意。毛泽东同志在1956年也要求我们学习各国的长处，来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他还说，价值规律是一所伟大的学校。现在，我们已经明确规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要求到本世纪末，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使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使我国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要达到这个目标，我们在各条战线上都要进行改革。其中特别重要的是经济体制和结构方面的改革。

社会主义经济是计划经济，这是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所决定的。但是，单单强调计划管理，不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不运用各种经济杠杆，便会把经济搞得很死，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在这一方面，我国和一切社会主义国家都吃过苦头。资本主义经济是市场经济，它完全受价值规律的支配运动着。由此而造成的问题就是整个社会经济的无政府状态和再生产的周期运动。危机不断发生，最终必将导致资本主义制度的彻底崩溃。但资本主义经济生活一般比较活，生产与市场需要结合紧密，而这恰恰是我们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以往的缺陷所在。所以，我们在改革经济体制中，关键问题之一就是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学会运用价值规律，实施市场调节，使市场调节成为计划调节的极为重要的补充，成为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重要手段。这样，才能真正做到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使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真正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有计划、按比例地循序发展。其他如在财政体制，外贸和商业体制，银行金融体制，物价和劳动工资制度，以及交通运输体

^①《列宁全集》第27卷第285页。



制等方面，资本主义国家那种比较注意结合工农业生产和人民消费、机构精干灵活、效率高、运用最现代化工具等优点（当然，它们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剥削，增加利润，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根本方面是和社会主义国家恰恰相反的），都值得社会主义国家参考。

在经济结构方面，社会主义国家现在开始注意了多种经济成分存在的问题。历史上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纯而又纯，只容许一种经济成分存在，而是在一种社会制度支配下，由一种经济成分占绝对优势，容许其他一些辅助的经济成分同时存在。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保留着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独立劳动者的小生产，在最先进的工厂里还保留着手工劳动，甚至奴隶制的东西，而所有这些都为资本主义服务，帮助它“延年益寿”。过去我们只容许全民所有制（或国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存在，而且主观主义地追求“一大二公”，以为越大越公便越好，强迫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小全民向大全民过渡，乃至强求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过渡等等，都不过是一些不切实际的“左”的幻想，是根本上违反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状况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则的。对于这些，我们吃的苦头已经够多够大了。现在我们提倡和鼓励在全民所有制经济的领导下，以决不容许恢复任何剥削制度为前提，根据社会生产力的实际状况和人民的觉悟水平，容许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取长补短，互相促进。在这方面，日本、法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鼓励中小企业改进技术装备，使之成为高度技术密集、内涵性增长的基层组织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借鉴。

以上种种都说明了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互相依存和互相斗争的关系。这种关系已经存在了六十多年，今后将



在很长的时期内继续存在。全世界无产者和劳动人民在总结过去斗争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必然会牢固地树立起持久战斗的战略思想，克服速胜论的错误思想，结合各国的实际，分别地采取正确的斗争路线、方针和政策。在两种社会制度长期并存的过程中，尽管道路是曲折的，情况是复杂多变的，但其基本趋势必然是资本主义制度一步步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制度一步步取得胜利，最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经济。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全人类才开始生活在一个真正平等、个人全面发展、自由、幸福的崭新世界。

第二章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

当代世界的另一条带普遍性的重要规律是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是绝对规律。这条规律在当前世界经济领域是不是还在起作用呢？是的，它还在起极为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在战后资本主义世界还表现得十分显著和强烈。但是，单是这个规律已经管不住当代整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变化了，它只能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一个局部。这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产生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出现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社会主义国家，并一度形成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与此同时，全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许多原来属于帝国主义管辖的殖民地、附属国纷纷取得了政治独立，



从而出现了一大批新生的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因而不平衡发展的规律，基本上不适用于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它们由于国情不同，所以采取不同的模式，建设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只要不是有严重的失误，它们的发展相互间是应该而且可以基本上平衡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即使在经济政治发展上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平衡，其性质和后果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根本不同。这也是当前世界经济生活中的一个规律。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包括着多种性质的国家，情况复杂，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在那里是起作用的，但是它的表现和作用又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当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的内容包含着下述四个方面：（1）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2）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3）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4）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现在依次说明如下：

（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

二次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十分突出和明显。战后初期，美国作为一个很少受到战争创伤的大战胜国，驾驭西欧、日本，俨然世界霸主，君临一切。它掌握了资本主义世界贸易和国际金融、投资市场的支配权，同时对社会主义国家实行封锁和侵略。但曾几何时，它侵朝、侵越战争相继失败，便一步步走着下坡路。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联邦德国和日本利用了美援和其他有利的因素，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在五十年代（1950—1960年），日本和联邦德国的



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16.7%和7.5%，①六十年代（1961—1970年）分别为13.6%和5.8%。②五十年代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8.2%和7.7%，六十年代分别达到10.8%③和4.9%。④六十年代末，日本和联邦德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跃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位和第三位。⑤与此不同，美国在五十年代（1951—1960年）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4%，六十年代只增为4.9%；它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五十年代为3.3%，六十年代只增为3.9%。⑥

七十年代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不平衡进入了新时期，出现了一些新特点。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与前一时期相比，普遍下降。但其下降的幅度有所不同，其中以联邦德国下降的幅度为最大。从1970—1980年，联邦德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下降到2.8%，低于美国同期的年平均增长速度3.1%，唯独日本在同期仍以5%的年增长速度向前发展。⑦

还有一个特点必须指出，即在二次大战前有些还没有跻身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行列的后起资本主义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在二次大战后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五十年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9%和4.3%，特别是到六十年代又分别上升到5.2%和5%，⑧远远超过美国同期的增长速度。在七十年代，它们的增长速度仍然分别保持在3.9%和3.3%的水平上。

①②《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年第101页。

③④⑤对外贸易部国际贸易研究所编《国际贸易比较统计》1981年第38页，第21页。

⑥⑦均为1950—1960年、1960—1970年和1970—1980年的数字。

⑧均为1950—1960年、1960—1970年和1970—1980年的数字。



但是,有一种情况必须指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互输出资本和商品,不仅表现它们之间发展的不平衡,甚至还有使对方殖民地化的倾向。例如美国1951—1970年间资本输出增加了7倍,加拿大工业投资量的58%在六十年代已被美国资本为主的外资所掌握。无怪有人说:加拿大实际上已经沦为美国的殖民地了。^①

以上情况表明,战后,不仅老牌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在日趋加剧,而且老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后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也很不平衡。估计上述趋势在八十年代还可能继续发展。因此,这种错综复杂的不平衡发展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并且正在导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形成多极化中心,例如美国、西欧和日本。同时它们之间各自为了摆脱当前和今后长期难于摆脱的经济危机和“滞胀”的困境,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必然随之加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必然更趋激化。因此,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军事形势也将随着它们之间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的加剧而更趋动荡不安,甚至可能由于某些特殊或偶然因素的触发,导致不同规模的战争。

(二) 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 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

从资本主义社会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在无产阶级的先锋队领导下,生产资料收归公有,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解放了生产力,人民真正当家作

^①《美国经济、政治与意识形态》(苏联俄文版)1973年第5期第45页。



主，消灭了阶级压迫和欺凌。这种社会主义制度代表着整个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比资本主义制度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必然大大高于资本主义国家。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开始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即从1928—1932年末，工业总产量增长了219%，而在同一时期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量：美国降低了56%，英国降低了80%，德国降低了55%。在这个时期，苏联农业集体化完成了60%，1932年末苏联政府征购到的粮食达到12—14亿普特，超过1928年的征购量120%，而从1929—1932年美国农业总产量减少了50%以上，其中粮食产量减少68%，棉花产量减少70%。可见，当时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经济发展大大好于资本主义国家。诚然，上述时期是苏联刚刚实行工业化和紧张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时期，而资本主义国家恰恰处于世界性经济大危机的时期。那末，我们再来看看大危机已经缓和，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已经回升的时期（1934—1938年）的情况吧。以各国工业总产量为例。以1928年为100，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美国1934年为66.4，到1938年增为72；英国从1934年的98.8增为1938年的112；德国从1934年的79.8增为1938年的125；日本从1934年的128.7增为1938年的165。都增长不多，而且上升是曲曲折折的。苏联怎么样？它从1934年的238.3增加到1938年的477，恰恰翻了一番，而且直线上升。^①社会主义国家只要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不犯大的错误，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高于资本主义国家。

^①上述数字引自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总结》、《在苏联共产党（布）第十八次党代表大会上中央委员会工作的总结报告》。



二次大战后，中国和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诞生。它们的发展速度一般高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例如，我国1949—1980年工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9.4%^①；朝鲜的工业发展速度1957—1979年平均每年增长15.9%^②；罗马尼亚1950—1978年国民收入增长了12倍，平均每年增长9.7%；^③南斯拉夫1953—1978年社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④

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远低于上述社会主义国家。据统计，在1951—1960年、1961—1970年、1971—1980年三个时期内各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平均增长率，美国分别为3.3%、3.9%和3.1%，^⑤联邦德国分别为7.7%、4.9%和2.8%，^⑥法国分别为4.8%、5.8%和3.6%，^⑦意大利分别为5.5%、5.5%和3.1%，^⑧英国分别为2.8%、2.7%和1.9%。日本的发展速度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是最高的，它的增长率分别为8.2%、10.8%和5%，^⑨一般也低于上述社会主义国家。

从农业和工业的增长速度分别来看，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和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情况如下表：

①②③④《世界经济年鉴》1981年第55页，第151页，第411页，第461页。

⑤⑥⑦⑧⑨《国际贸易比较统计》1981年第38页。



东欧国家与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农业增长速度对比(1971—1976年)①

东欧国家	年平均增长率%	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年平均增长率%
捷克斯洛伐克	3.3	美国	3.4
匈牙利	5.0	联邦德国	1.1
民主德国	3.2	英国	1.3
波兰	0.5	法国	1.9
罗马尼亚	8.3	意大利	1.2
南斯拉夫	4.1	日本	0.6
保加利亚	2.3	加拿大	2.9

东欧国家与西方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工业增长速度对比(1950—1980年)②

东欧国家	增长倍数 (1950=1)	主要西方国家	增长倍数 (1950=1)
保加利亚	2.4	英国	2
匈牙利	8.4	意大利	6.6
民主德国	9.4	美国	3.3
波兰	1.4	联邦德国	5.3
罗马尼亚	3.3	法国	3.9
捷克斯洛伐克	8.4		
南斯拉夫	1.2		

诚然,从人类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幼年或少年时期,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各项建设的经验还很不丰富。因此,在它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一些挫折和困难,也

①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生产年鉴》1979年。

②《苏联1980年统计数字》第57页。



难免发生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例如，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初期，我国犯了“大跃进”和一平二调那样的“左”的错误，使我国经济陷入了三年困难时期；特别是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十年“文化大革命”，使我国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但是社会主义国家由于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它们对于前进过程中的挫折和错误迟早总能由自己来克服和纠正。历史已经证实并将继续证实这一点。例如我们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以来，我国的经济很快地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党的十二大制定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目标，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二十年间，国民经济将以平均年增长7.2%的速度向前发展。而与此同时，资本主义世界五十、六十年代的所谓“黄金时期”将很难重新光顾。七十年代开始的危机与“滞胀”交织的低速发展局面，估计在整个八十年代直到九十年代都将难以从根本上克服。当然，这里并不排除个别或极少数国家有短暂时期的高速增长。

战后初期，苏美两国的实力对比无论在经济上或军事上，美国都占绝对优势。1955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3,990亿美元，而苏联当时的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530亿美元。^①但从六十年代起，美苏经济实力的差距逐渐缩小，而且苏联经济的发展速度常常超过美国。1965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6,880亿美元，^②联苏为3,290亿美元，^③将近美国的一半；1970年和1976年，又分别上升到52.5%和55.4%，^④到1979年已经达到

①苏联不发表国民生产总值的数字，此系美国总统国际经济政策委员会估计数字。

②《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年，第87页。

③《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年第87页。

④根据《世界经济统计简编》数字计算。



了67%。^①在工业生产方面,1965年苏联工业生产产值达到美国的62%,1975年上升到80%,1979年超过80%。^②从经济发展速度看,1960—1970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3.9%,苏联则为6.9%,^③几乎超过美国一倍。七十年代以后,美苏两国的经济发展速度都有所下降,但是,苏联的经济发展速度仍高于美国。从1970—198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年增长率为3.1%,而苏联仍保持4.6%。必须指出,目前苏联有一些工矿产品的产量已经超过美国。1980年,苏联的原油、钢、纯碱,棉织品和水泥的产量分别为美国的142%、147%、357%、180%和192%。^④美苏两国经济实力的差距日趋缩小,在某些方面苏联会进一步超过美国,估计这种趋势今后将继续下去。这对于今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必将产生重大的影响。

六十年代以来苏美展开了剧烈的军事竞赛,它们的军事开支都有较大幅度的增加。到1975年苏美两国的军事开支旗鼓相当,分别达到611亿美元和642亿美元。^⑤从军费开支的年增长速度看,苏联远远超过美国。1961—1970年美国军费开支年平均增长率为2.7%,苏联则高达6.8%。^⑥从1972年起,苏联的军费开支总额开始超过美国。1972年苏联该项开支达到844亿美元,美国为776.2亿美元;1978年苏联为1,480亿美元,美国为1,051亿美元。1978年,苏联军费开支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11—14%,美国只占5%。估计今后这种趋势还将继续下去。

^①此数字为国民收入的比例。引自《世界经济年鉴》1981年第890页。按国民生产总值计约为65%。

^②《世界经济统计简编》1978年第86期,《世界经济年鉴》1981年第840页。

^③《国际贸易比较统计》1981年第38—39页。

^④《世界经济》1982年第1期“统计资料”。

^⑤《世界经济导报》编印《世界经济统计选编》1977年版第185页。

^⑥《世界经济导报》编印《世界经济统计选编》1977年版第185页。



(三) 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

二次大战后，广大亚、非、拉国家，经过自己的艰苦奋斗，摆脱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统治，纷纷赢得政治独立，并进而运用各种有利条件，发展民族经济，取得了巨大成就。由广大发展中国家组成的第三世界的崛起是当代世界的头等大事，在一定意义上讲，它是今后世界政治、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

五十、六十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增长速度一般超过了发达国家。1961—1970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①而当时处于所谓“黄金时期”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也只有5.8%。^②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速度都有所下降，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仍然高于发达国家。如在1971—1975年，发展中国家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6.2%，^③大大高于发达国家的3.2%。^④从1960到1970年，发展中国家（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除外）的工业总产值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比重由11.1%增长到12.65%，^⑤到1979年又升到15.4%。^⑥发展中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占资本主义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1960年的16.3%上升到1978年的18.7%。^⑦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实力的增长，它们在世界经

①《世界经济统计选编》第18—19页。

②③④《世界经济统计选编》第18—19页。

⑤⑥⑦据《世界经济》1981年第10期“统计资料”计算。



济发展中的作用将会越来越大，成为未来世界经济繁荣的希望所在。同时，它们在世界政治舞台上，也将具有越来越大的发言权，成为从根本上改变世界经济秩序和政治格局的主力军。

然而，我们也应当看到，由于长期以来受帝国主义的残酷掠夺和剥削，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比较甚至十分贫穷落后的国家。它们的工业化程度一般还低。1965—1969年，农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14%，而发展中国家为53%，其中亚洲为61%，非洲为63%。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量有88%集中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①

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其中最严重的是债务沉重、粮食不足和国际收支恶化，等等。造成这些困难的主要原因就是那种极不公正、极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还继续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重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和转嫁经济危机的恶果，极大地阻碍着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顺利增长。因此，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起来，以集体自力更生为基础，全力加强南南合作，开展和加强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争取建立比较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是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经济能够继续以较高于发达国家的速度顺畅发展的关键。

（四）发展中国家内部经济发展不平衡

二次大战后，发展中国家在政治上取得了独立，为发展民

^①匈牙利约瑟夫·尼拉斯教授主编《世界经济的理论问题和当前的结构变化》，1976年英文版，第245页。



族经济扫除了外部障碍。所以这些国家的经济在不同程度上都有所发展。但由于各自的自然资源条件、社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的差异以及各自采取的发展战略的不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和经济实力有很大差异，从而使它们之间的经济发展很不平衡。从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实力来看，发展中国家大致可分为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两大类。

所谓较发达的发展中国家主要包括石油输出国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七十年代中期以来，石油输出国曾大幅度地提高石油价格，它们的石油收入猛增，手中掌握着大量石油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一批最富有的国家。它们拥有的储备在资本主义世界官方储备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73年的7.9%猛增到16.6%。^①此外，它们的进口支付能力也大为增强。1973—1978年，它们的进口额在资本主义世界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3.7%猛增到8.1%。^②进口的增加使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在利用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有较快的发展，也大大改善了人民的生活，与此同时，发展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积极利用新的国际分工，除了继续生产和出口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以外，从七十年代以来，逐渐发展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从而使这些国家的制造业迅速发展。其中尤以巴西、墨西哥等国以及东亚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更为突出。1979年巴西的国民生产总值已达2,085亿美元；^③墨西哥也达到1,213亿美元，^④它们在世界各国国民生产总值中分别位居第十位和第十四位。^⑤又如南朝鲜，197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610亿美元，人均国民

①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1979年4月。

③④⑤《国际贸易比较统计》1981年第21页。



生产总值达到1,634美元。^①

一些欠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南亚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某些非洲国家，由于种种原因，经济发展比较慢，有些是很慢，这类国家中有些还没有完全摆脱殖民地附属国的地位，保留着一些前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国民收入很低，人民生活很穷苦。

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这种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还可能继续加剧。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发展中国家正在发扬集体自力更生的精神，建立一体化组织，加强南南合作，并以此为基础，推动南北对话，以求有利于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建立，这是第三世界国家当前最重要的共同的战略措施。

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也是绝对规律。由于它的作用，某些发展中国家，例如某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或者别的国家，它们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争取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取得某些重大胜利的条件下，可能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另外某些发展中国家，则在一定条件下，特别是在经济发展较快，现代无产阶级成长和觉悟程度的提高较为显著的条件下，其革命形势有可能成熟，取得革命的胜利，从而走上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些正是发展中国家之间政治、经济不平衡发展所可能造成的结果。当然，在当前主要由于苏美在第三世界的剧烈争霸和挑拨利用，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有发生不同规模的战争的可能。这种不幸的悲惨情况，在亚洲、非洲、拉美都曾经和正在不断出现。发展中国家必须百倍提高警惕，防止和抵御超级大国挑拨离间的阴谋，通过和平协商方式

^①《世界经济年鉴》1981年第157页。



解决一切内部分歧，加强团结合作，保证自己民族经济比较顺畅的发展。

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在当代所起的作用日益强化的结果，必然在政治上导致革命和各种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战争。

第三章 科学技术进步推进世界 经济发展和变革的规律

（一）科学技术推动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科学技术是直接和间接的生产力。它的进步推动和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和革命对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大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说，它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从十八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中叶二百多年间，人类历史上经历了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每一次科技革命对于世界经济都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都使国际经济关系发生相应地深刻变化，从而使世界经济出现一些新现象和新特点。

十八世纪中叶至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首先在英国发生的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即产业革命，使社会分工具备了超越国家界限发展成为国际分工的条件，从而导致国际分工的产生和世界市场的形成，并为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准备了物质基础。这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由于机器和蒸汽的应用，分工的规模已使大工业脱离了本国基地，完全



依赖于世界市场、国际交换和国际分工。”^①大机器工业“拿来加工制造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它们所出产的产品，已经不仅仅供本国内部消费，而且供世界各地消费了。”这样，大机器工业就在不同程度上把很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国家卷入了国际分工，纳入了世界市场的轨道。“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相互依赖了”。^②于是，近代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就逐步形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世界经济体系是在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的基础上开始形成的。首次科技革命为世界经济的开始形成提供了物质生产力的基础。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以发电机和电动机为标志的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作为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资本输出即资本国际化成了它的主要特征，垄断资本集团和帝国主义列强分割了全世界，从而使世界经济变成由金融寡头垄断的无所不包的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真正意义上的世界经济从此最终形成。

二次世界大战后，以原子能工业、电子工业和高分子合成工业为标志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出现，空前地促进了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使战后世界经济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和新现象。

首先，战后科技革命促进了各类国家社会生产关系的重大变化。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第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促进了资本和生产的集中和垄断统治的加强。垄断资本采用了由科技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9页，第47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9页，第470页。



革命所导致的日新月异的技术设备，使生产专业化和自动化的程度、企业管理水平和资本的有机构成都有很大的提高，从而使劳动生产率、相对剩余价值率和垄断组织的竞争地位都空前地增长和加强。资本对劳动者的剥削大大加强了。同时生产的集中和垄断进一步超越国界，更加具有世界规模，这集中地表现为战后跨国公司的迅速发展。战后科技革命又加速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这是因为由科技革命引起的生产力大发展迫切地要求对整个社会生产过程进行有计划的管理和调节。这就必然导致两种结果：或者是无产阶级起来革命，炸毁资本主义的外壳，实行社会主义，以便对经济进行全面的计划管理；或者是垄断资产阶级还有能力以其有生之年，对现存生产关系作局部的调整，更加强有力地运用国家机器干预经济生活，对社会生产作有限度的计划调节。战后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显然没有为前者提供可能，而只能造成第二种结果，这样就使国家垄断资本获得了高度发展。

——在社会主义国家，发展科学技术是为了社会主义生产现代化，其最终目的是满足社会和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因此，战后科技革命果实的利用和生产的发展强有力地促进了社会主义关系的完善、巩固和发展，提高了全体劳动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并有利于“三大差别”的逐渐缩小和最终消失。

——在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通过贸易、资本输入和经济合作（同社会主义国家或其他发展中国家），引进先进科学技术，促进了民族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也跟着发展起来，封建生产关系和其他前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正在逐渐趋于瓦解或萎缩。某些发展中国家在实行自己的发展战略过程中，未能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过多地借用外资，对引进的先进装备，又未能运转消化，



结果常常负债过重，反而增强了对外国的依附和发展民族经济的困难。所有发展中国家对此应引以为戒。

其次，第三次科技革命促使国际分工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加速发展。国际分工的地域范围大为扩充。国际分工的部门和分支更加专门化和多样化，从而使世界上已经存在着的不同类型国家自身之间（如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和相互之间（如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关系空前地加强了，也就是说，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使得世界各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除了决定于本国条件以外，还在不同程度上决定于世界经济的发展。因而，在科学技术进步突飞猛进的条件下，各种类型国家之间经济关系的空前密切，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程度的空前提高，就成为战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再次，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促使国际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例如，作为国际经济关系突飞猛进发展的标志之一，二次大战后世界贸易的发展速度是空前的。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世界贸易总额增长了十多倍。从1950—1973年，世界出口贸易量增长4倍多。各国对外贸易额在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大大提高。从1950—1979年，世界出口总值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比5.5%增长到15.2%；其中美国从3.6%增为7.5%，联邦德国从8.5%增长到22.4%，日本从9.4%（1960年）增为12.5%（1980年），加拿大从18.1%增为26.2%，南朝鲜从0.9%（1960年）增为25.1%，菲律宾从9.5%增为15.3%，苏联从3%增为9.7%。^①

最后，第三次科技革命，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促使战后世界经济领域里资本主义再生产和经济危机的周期发生了一定的

^①《国际贸易比较统计》1981年第26页。



变形。这是因为，一方面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进步使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设备不断革新，使生产规模和产品产量高速扩大和增长，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生产与市场的矛盾，导致生产的相对过剩，另一方面，科技进步不断地缩短固定资本更新的期限，从而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有所缩短，造成经济危机的频繁化。再加上战后金融资本的统治更加强化，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急剧发展，大大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从而造成了生产长期停滞、高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三者紧紧抱成一团的所谓“滞胀”这一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极为难治的痼疾。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经济的发生、发展的趋向，在很大程度上是同科学技术的发展紧密相关的，或者说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科学技术进步状况制约的。由此可知，科学技术的发展状况推进和制约着世界经济的发展，这是一条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下面我们进一步来谈谈科学技术和生产之间的辩证关系。

（二）科学—技术—生产的加速循环机制

科学、技术和生产三者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们都有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发展规律，但它们又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这一点已经是人们公认的事实。但是，对于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详细过程和机制，却是一个人们争论不休的问题。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古斯塔夫·拉尼斯认为，在这三者中，“比较容易解决的部分是技术与发展的关系。在这个领域，主要是由经济学家进行了大量的工作——理论和经验的。可以相当明确地提出结论：技术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



系，确实是密切而牢固的，一个社会的工艺和产品质量上的变革，同经济增长有高度的联系。但是同经济增长有关的技术变革的确切性质，依然是‘对我们无知的测度’……我们对科学与其他两者关系的理解更不可靠。有些人相信，科学必然先于技术，技术造成发展；其他的人则看不出有什么证据，证明科学与技术之间有必然的联系，因此他们把科学看作只有富国才能从事，而穷国则可借用其成果。”^①很显然，上述这些观点具有很大的片面性，有的还露骨地暴露了他们狭隘的剥削阶级的立场。他们都没有看到科学、技术和生产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我们认为，在科学—技术—生产这一有机联系的链条中可以明显地看到：科学研究为技术革新开辟道路，而技术革新则通过调整社会组织和管理方式，使较新的技术在生产中得到广泛应用，从而促使经济发展，这是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反过来经济发展的新水平又会向技术领域，从而向科学研究提出新的任务，新的课题，造成科学技术继续发展的外部动力和气氛，并提供更先进、更完备的观测、实验仪器和研究手段，推动科学研究的新发展。如此循环不已，相互促进。并且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个循环的周期越来越缩短了。我们有的同志用“循环加速机制”^②来描述这个过程，我认为是合适的。

科学技术史和世界经济史都证明了上述过程是客观存在，也是一条客观规律。牛顿力学以及约瑟夫·布莱克关于“比热”和“潜热”的理论，如果对萨弗里和纽可门的蒸汽机还没有产生

^①引自杨敬年：《科学·技术·经济增长》，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6页。

^②金观涛、樊洪业、刘青峰：《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科学传统与文化》，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页。



重大影响的话，那它至少为瓦特的发明开辟了道路。但是，恰恰是瓦特对蒸汽机的重大改革，使蒸汽动力的工业应用成为可能，并促成了近代第一次产业革命。这次产业革命又反过来向科学技术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准备了更强大的手段。正如恩格斯所说：“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① 蒸汽动力日益广泛地应用于产业，要求不断改进和完善蒸汽机，这无疑大大地推动了傅里埃热传导理论以及“卡诺循环”理论（它实际上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最初表述形式）等等的研究，为热力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另外，第二次产业革命时期的情况也是这样。法拉第、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为电气技术开辟了道路，而工业电气化的那些伟大成果又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科学革命奠定了物质技术基础。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克鲁克斯管无疑是电气技术的一个极为精巧和杰出的成果，围绕着它进行了非常密集的研究，并直接导致伦琴射线的发现、对放射性的研究、电子的发现等等。这些伟大的发现又为二十世纪初量子理论和其后的量子力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和实验的基础。这样的例证在科学技术史和世界经济史上是不可胜数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相互联系的循环过程中，科学研究成果的技术化和技术的产业化过程都越来越迅速，从而使循环过程不断加快。第一次自然科学革命比第一次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超前几乎两个世纪，十九世纪初开始的自然科学的黄金时代比以工业电气化为标志的第二次技术革命仅仅超前半个世纪，而本世纪初开始的现代自然科学革命（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为标志），几乎同第三次技术革命同步发生，仅仅因为第二次世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5页。



大战的爆发，使科学成果主要用于军事目的，暂时推迟了产业方面的技术革命。战后，科学—技术—生产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日趋加速，例如，象激光、电子计算机、遗传工程等等研究的成果几年十几年就产业化了。非常清楚，这种循环加速机制是一种规律性的现象。

（三）决定经济增长诸因素中科学技术作用递增的规律

在决定经济增长诸因素中科学技术作用递增这一规律，是以马克思的如下原理为根据的。马克思指出：“而现在，对于由必要劳动变成剩余劳动而生产剩余价值来说，资本只是占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或者说现存形态的劳动过程，并且只延长它的持续时间，就绝对不够了。必须变革劳动过程的技术条件和社会条件，从而变革生产方式本身，以提高劳动生产力，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来降低劳动力的价值，从而缩短再生产劳动力价值所必要的工作日部分。”^①由于竞争，这个原理必然表现为“资本的内在的冲动和经常的趋势”。^②这个趋势，即提高劳动率以增加相对剩余价值量的趋势，还由于工人运动以及社会主义革命运动的发展，使得资本对绝对剩余价值的榨取遇到越来越大的种种限制而加强。因此，对于现代资本主义来说，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就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剩余价值生产的这种变化所造成的一个必然结果就是，“一旦资本主义制度的一般基础奠定下来，在积累过程中就一定会出现一个时刻，那时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③我们

①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50、355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82页。



知道，积累是扩大再生产的源泉，既然如此，社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必然成为经济增长最为强大的动力。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开辟了无限广阔的途径。“同样数量的劳动力，在同样的劳动时间里，可以生产出比过去多几十倍几百倍的产品。社会生产力有这样巨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有这样大幅度的提高，靠的是什么？最主要的是靠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①因此，科学技术对经济的增长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科学技术作用递增规律的另一个根据，就是由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过程不断加深这一内在机制决定的。这一机制不是说科学、技术和生产失去了各自的相对独立性和差别，而只是说在这个综合体中，以科学为主导，正日益呈现出三者相互渗透和相互融合的过程，而这里的关键是科学的渗透作用。

马克思曾经把劳动过程的三要素规定为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及劳动者。这也就是生产力的三要素。在人类文明的早期，生产力主要取决于劳动对象，例如土地的肥沃程度、自然资源的丰度等等。人类早期的科学技术活动也主要是围绕着充分利用自然的丰度，并主要是用依靠经验的方法进行的。中世纪以后，特别是近代产业革命后，劳动资料日益成为生产力的决定因素，而劳动资料的发展也日益取决于科学技术的进步。马克思指出：“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②可以设想只有在人类发展的未来，劳动自身才可能从必然到自由，真正成为生产力中占决定性统治地位的因素。这除了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前提外，还必须以关于人的科

^①《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第8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23页。



学，譬如思维科学、心理学、人体科学、组织管理的科学等等这些更为高级更为复杂的科学的充分发展为重要条件。这个发展过程充分说明，科学将在人类生产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在近代第一次科学革命的前期（它以哥白尼1543年提出的天体运行理论和牛顿力学为代表），科学革命和技术、生产的联系还是那么间接、迟缓、曲折。它似乎是在更大程度上从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革命，而不是从社会的需要获得动力的。十八世纪上半叶开始的近代技术革命的成果，例如萨弗里和纽可门的蒸汽机、淮亚特纺纱机、哈格里夫斯的“珍妮机”等等并没有自觉地应用自然科学的成果，而主要是来自经验和技艺的经验密集型技术。近代第一次自然科学革命后近二百年的漫长岁月中没有引起什么技术上的重大变革。但是，第一次产业革命后的技术进步大多数是科学密集型的，如果没有对自然科学规律的自觉应用，那这些技术成果是不可思议的。反过来，现代科学技术如果脱离社会需要，没有现代技术提供的先进科学研究手段也是不可能的。关于这一点，我们在前一节提到的克鲁克斯管导致伦琴射线、放射性、电子的发现，从而对量子理论的建立所起的巨大作用就是最好的证明。特别是科学对生产组织管理的渗透，使得任何现代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都必须以科学的重大突破为先导。同时，现代化的科学研究，如人工受控热核反应、粒子物理学、宇宙飞行、重组基因、大气和地球物理、海洋工程等等，一开始就是一个巨大的科研—产业综合体。我们可以看到，以科学为主导，科学—技术—生产的一体化过程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大大加强了。这正是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作用递增规律的内在机制。

从前面的论述，我们从原则上定性地说明了马克思相对剩



余价值生产的原理和科学—技术—生产一体化的必然趋势，怎样决定了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递增规律。但是，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所作的贡献的精确计量，是一件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情。西方经济学家采用的方法也很多，一般认为比较好的计算方法是爱德华·丹尼森在1974年出版的著作《美国经济增长核算：1929—1969年》中采用的方法。丹尼森用这种方法分析了1929—1969年间美国促进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各种因素，其中知识进展及其他——综合地衡量把任何一种新知识（技术的、管理的和组织的）体现在生产中所增加的产量——所做的贡献为：1929—1941年33.8%；1941—1948年50.8%；1948—1953年52.8%；1953—1964年44.6%；1964—1969年71.9%。而美国的国民收入，在1929—1948年平均每年增长2.75%；1948—1969年平均每年增长3.85%，其中教育和知识进展的贡献为37%和56.2%。^①虽然这种计算方法还不能说是很精确的，但是，科学技术对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国民收入的增长所做的贡献逐年递增的趋势是非常明显的。在欧洲，这个比例还要高些，例如1950—1962年科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挪威约为70%，意大利约为72%，法国约为75%。另外，据美国经济学家统计，在美国农业发展中，1939—1972年用于科学研究、试验设计和工艺工作消耗支出的回收率为1比4。^②这也表明在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进步的巨大作用。如苏联工业，六十年代在工业劳动生产率提高总额中，大约有40%是由于采用新技术和科学的劳动组织措施而获得的；到七十年代，则上升

^① 参见杨敬年：《科学·技术·经济增长》，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53页。

^② 参见(苏)B·H·杰米亚年科：《农业中的科研》，《美国》月刊1983年第7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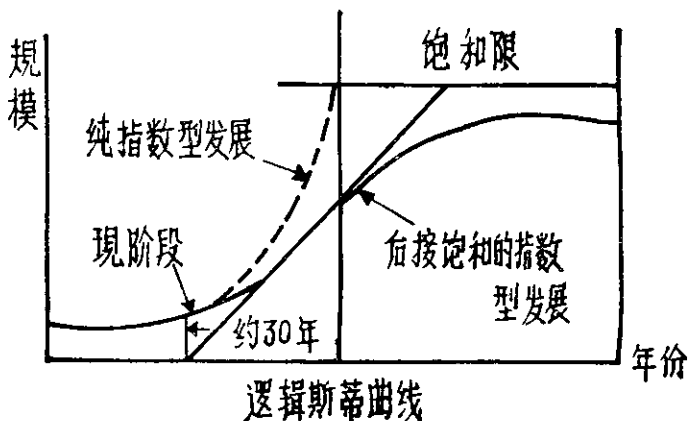


到66.7%，可见在苏联科学技术作用的增长是相当迅速的。

(四)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

日本学者汤浅光朝提出：在人类发展史上，科学技术中心不断转移，其路线和科学高潮期是：巴比伦→埃及→古希腊和中国（十六世纪以前）→意大利（1540—1620年）→英国（1660—1750年）→法国（1760—1840年）→德国（1840—1910年）→美国（1920年至今），而在近代现代每个民族的科学兴隆期约为八十年左右。这个规律人们称为“汤浅现象”。我们认为，“汤浅现象”在资本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也只能在资本主义时代），是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的科学描述。它和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相吻合。同时，在每个国家紧接着科学兴隆期后都必然相继出现技术革命和经济飞跃，因此，伴随着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也必然导致世界经济中心的转移。因此，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对科学技术的交流、借鉴和融合，对于世界经济的形成和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至于引起“汤浅现象”的原因，普赖斯氏的研究可供参考。根据他的研究，一般国家在科学兴旺期和技术革命时期，科学技术成果呈指数型增加，并保持这一速率，到某一点后曲线开始反曲，曲线的发展速率放慢，逐渐接近一“饱和限”，进入科学技术发展的成熟期，这就是科学技术发展的逻辑斯蒂曲线，如图所示。以后当新的科学技术中心形成，发生阶跃，便进入另一个新的逻辑斯蒂曲线的发展阶段。在接近饱和限的科学技术发展成熟时期，由于：（1）科学技术人员的老化，（2）在兴旺时期居于权威地位的科学家和科学理论对创新科学的保守态度，（3）技术革命期建立的工艺产业体系和“技



术惯性”往往压制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4)科学技术兴旺期后相继出现的经济繁荣对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会起一定的缓冲作用，所以，在旧的科学技术中心也很难产生科学技术的新突破。而这时在其他国家，特别是相对落后的国家则往往更容易出现哲学革命、思想革命、教育革命乃至社会革命，从而为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创造特别有利的环境，如果再加上一些民族的、历史的、地理的具体条件等等，就可能成为新的科学技术中心，从而产生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

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汤浅现象”成立的话，那末，从1920年开始的美国科学技术兴旺期到本世纪末时会逐渐走向衰微，而让位给其他国家和民族。现在，这种趋势似乎已初见端倪。它首先表现在近几年美国学生的学力有所下降，特别是数学、自然科学和中等理科教育水平的下降。据统计，“有四分之一的高中生中途退学”。①美国工程教育协会事务局局长麦

①江崎玲于奈：《美国的教育危机》，1983年6月8日《读买新闻》。



劳也说：“如今在消失的教师队伍，落后于时代的设施、规模过于庞大的学级，随便举出哪一个都能说明工科教育系统不符合国家的经济要求。每年诞生的获得工学博士学位的人最近从3,500人减少到2,500人，其中竟有1,200人不是美国公民。”另外七十年代后研究与发展支出的削减也表明了美国科学技术衰微的征兆。《华盛顿邮报》曾指出：“美国正在丧失自己在技术上的竞争能力，因为美国工业在研究和发展上的支出减少了，联邦政府在阿波罗空间计划完成和越南战争结束后，减少了对企业研究的支持。”^①进入八十年代后，里根政府全面削减社会文教支出的政策，无疑也将对美国教育和科研产生消极影响。丹尼森还提出美国人的独创性减少和美国技术的退化。相反，象日本那样的国家科学技术的崛起，给人以十分深刻的印象。

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必然首先以科学思想和人才的交流和转移为前提。因为一个民族或国家如果不充分利用、创造性地发展原有的科学技术，便不可能使科学技术乃至经济增长有任何突破。远些来讲，如果说“世界贸易和世界市场在十六世纪揭开了资本的近代生活史”，^②那末，正是指南针在航海中的应用才真正揭开了世界贸易的历史。另外，造纸术、火药和印刷术通过东西古航路，或者通过“丝绸之路”传到欧洲后，对于欧洲摆脱中世纪的蒙昧和黑暗，对于文艺复兴运动，以及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无疑起了非常深刻而巨大的作用。因此，科学技术中心从东方转移到西方，从中国转移到意大利也许可以看作是近代资本主义的先声。

在世界科学技术中心从西欧转到美国之前，美国于1775年

^①1978年6月21日《华盛顿邮报》。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67页。



(独立战争)——1861年(南北战争)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时,英国、法国、德国在科学技术兴隆时期积累的现成的科学技术成果大量输入美国,同时美国独立发展自己的实用技术。正是由于欧洲先进科学技术成果乃至科学人材大量被引进美国,推动了美国的技术革命,加上其他一些政治、经济因素,为美国科学技术的兴隆创造了非常有利的环境。也正因为欧洲的科学技术被移植到美国这块肥沃的土壤上,使得这些科学技术成果生根、开花、结果,从而确立了美国在世界科学技术的中心地位。因此,世界科学技术中心的转移是世界各民族科学技术人材和成果交流、融合和创造性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推动科学技术乃至世界经济的强大动力。

(五)科学技术进步与世界经济危机

在西方,最早研究科学技术革新同经济危机的联系的是韦克赛尔,但是最有代表性最完整地研究这个问题的是熊彼特。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包括(1)引入新产品,(2)采用新的生产方法,(3)新市场的开辟,(4)获得新的原料来源,(5)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因此,熊彼特的“创新”概念和科学技术成果在生产、组织管理上的应用,有非常直接和紧密的联系。熊彼特认为,当一个远见卓识的企业家采用一种创新活动时,他就可以凭借垄断地位获得大量的利润,并且由于竞争规律,将有许多模仿者争相仿效,触发一个“创新”浪潮,造成对银行信贷和对生产资料的扩大需求,引起经济高涨。但是,当仿效者扩散到一定程度时,必定打破垄断,形成利润的均衡,盈利机会趋于消失。于是,对银行信贷和生产资料的需求便减少,经济开始收缩。资本主义经济活动便显现出繁荣和



衰退两个阶段，不断地打破均衡，又创造新的均衡，周而复始，循环不已。熊彼特叫做“创造性的毁灭”。熊彼特还认为“创新”活动直接影响经济危机周期。由于“创新”活动的规模和程度不同，同时，有些相互依存的“创新”会结合成一个较广泛的大的“创新”过程，因此，存在着各种不同的周期。大致可分为长波（康德拉季耶夫周期），中波（米格拉尔周期）和短波（基钦周期）。譬如，长周期就是由于产业革命和重大的科学技术革命引起的。熊彼特“把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分为三个长周期：（1）从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到1842年，这是产业革命的发生、发展阶段，纺织工业的“创新”起了主要作用。（2）从1842—1897年，他称为蒸汽和钢铁时代。（3）1897年以后（到1950年）是电气、化学和汽车工业时代。”^①

熊彼特注意到科学技术的重要作用，特别地研究了“创新”活动同经济危机周期的有机联系，这还应该说是具有创见的。但是，他把经济危机的根源仅仅归结为“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却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完全抹煞了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的矛盾——这是决定经济危机最深刻的内在动力。因此，他直接用“创新”活动的周期来解释经济危机周期也就是不科学的。

一般说来，重大技术革命的周期和经济波动长周期是相对地一致的。根据哥哈德·曼恩的材料，重大革新相当集中地发生在1785、1851、1895、1940年左右，都在长周期从衰退到高涨转折点后五至七年。这种相当稳定的滞后现象也恰好说明技术革命是资本主义经济扩张的直接后果。经济危机周期是由资

^①胡代光、厉以宁：《当代资产阶级学说主要流派》，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60页，并参看克雷门斯和多迪：《熊彼特体系》，纽约1966年版，第20—21页。



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基本矛盾，以及极为复杂的内在机制决定的，不能简单地用“创新”活动来解释。

但是，科学技术革命会以如下的方式影响经济危机周期，即由于循环加速机制和经济增长中科学技术因素作用递增的规律，在科学技术革命的兴旺时期，革新成果的指数型增长，会以越来越大的规模和速度加速生产力的发展，经济系统的投入量会急剧增加，从而破坏资本主义经济的稳定性，使较小的波动表现为临界周期，因此，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有缩短的趋势。这一点是马克思早已预言了，并且为本世纪特别是二次大战后的事实所证明。

另外，由于科学技术革命一般会改变世界经济结构，引起世界市场和国际贸易的扩张，大大加强世界经济体系的开放性和相互依存性，这些因素的综合便会引起各国经济周期的同步变化，从而导致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典型的同步发生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一般都在科学技术革命的高潮期。例如：1857、1873、1900、1907、1929年，以及战后1958、1974、197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都是发生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兴旺期。

(六)新的技术革命及其 对世界经济的挑战

七十年代起，资本主义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滞胀”的阶段。1973—1975年和1979—1982年两次世界性经济危机相隔只有短短四年，这也是资本主义史上罕见的。1982年底开始复苏的西方经济，仍然被高利率、高失业率高赤字这一“三高”链条捆得紧紧的，不得动弹。出路何在？这成了西方当前经济思潮最为关注的一个问题。于是相继出现了所谓“电子技术时



代”、“后工业社会”、“第三次浪潮”、“信息社会”等等对未来社会的推断。1983年4月科图拉克又提出了所谓“第四次产业革命”^①的理论。这些观点大同小异，都是说世界科学技术正面临一场深刻的变革，这些变革正引起社会经济、政治结构，乃至生活方式的重大变化，从而产生一种新的因素、新的动力，使现在危机四伏、风雨飘摇的资本主义经济走上无忧无虑、持续增长的道路，并为人类开创一个全新的未来。在这里我们不想对他们涉及的所有问题作出评价，而只着重讨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及其对世界经济的影响问题。

近代产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在建立它的强大物质技术基础的同时，建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包括国际分工、世界市场、资本输出和国际货币金融机构的世界经济体系。但是，七十年代的世界石油危机以后，世界经济的技术产业结构日益受到能源和原料短缺，以及地球生物圈的严重限制，同时，由于社会主义的壮大、第三世界的崛起等等世界经济、政治的新发展，现存的国际经济秩序已经完全成为陈旧过时的了。阿尔温·托夫勒这样写道，“确实如此，世界大公司赖以稳定贸易关系的全球结构正在摇摇欲坠，而且面临即将分裂的危险。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关税和贸易总协议都在遭受沉重的打击。”“所有这一切，都是和资源供应不稳定的短缺或过剩，消费者，工人和经理们态度激烈转变，贸易急剧的不平衡，特别是非工业国家的好斗精神等混杂交织在一起，使形势更加恶化。”^②总之，“第二次浪潮”在经济、政治、文化、价值观

^①西方所谓“第四次产业革命”或“新产业革命”，一般是指以电脑为轴心的一系列新兴工业的崛起，其中包括微处理机、生物工程、光导纤维、新材料、新能源、海洋开发、宇宙航行等等领域。

^②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97页。



念等等方面都处于危机之中。因此，托夫勒认为，工业文明正在消逝，而一个“伟大的历史潮流”——“第三次浪潮”却正在危机和崩溃中产生。那末，这个新的潮流是什么呢？托夫勒认为，现代科学技术正面临着一次革命，它将兴起一种全新的“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prosumer）的经济，带来真正新型的生活方式、行为准则和独特的世界观，并且，“这个新文明，既然对旧的文明挑战，也必将推翻官僚制度，削减民族国家的作用，在帝国主义后期的世界上，兴起半自治的经济”，^①从而创造一个崭新的未来的文明，云云。

我们认为，当前世界科学技术正孕育着一些重大的新的突破，酝酿着一次新的科技革命，这是毫无疑问的。这些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内容是：（1）以可再生的和不污染的能源取代以石油煤炭等燃料为主的能源结构。（2）微处理机、“人工智能”、光导纤维等科学技术成果正导致一个“信息时代”。（3）遗传工程的产业化，利用重组基因技术培育具有固氮能力的谷物等等农业技术的革命。此外还有海洋工程、生态学、宇宙工艺等等的发展。这些革命性的发展将深刻地影响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以及整个社会生活。这一点也是我们在前面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所阐明的，那是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而这些结果只不过更加证明了整个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对经济实行全面计划管理的历史必然性。因为，这些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的高度发展，必然加剧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从而使剥夺剥夺者，炸毁旧的生产方式成为不可避免，而且更加迫切。同时，先进的信息传输、加工、存储手段，也使得精确的、符合客观

^①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3页。



经济规律的计划成为更加可能和有效。因此，这一切都更加坚实地奠定了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行将到来的新技术革命和所谓“第四次产业革命”的酝酿和发展对社会主义国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正成为极其强大的动力。

但是，托夫勒却只字不提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国家或社会对经济的计划调节，而仅仅从所谓“自助运动”，自己动手干活这些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微不足道的生产—消费行为，侈谈什么“产消合一”，“市场化行将告终”，等等。这些经济观点只能是引人走向邪路和完全不可能实现的社会乌托邦。道理很简单，如果不消灭生产资料的私有制，那么为销售而进行的生产就是不可避免的，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生产和消费的合二为一，“市场化”也更不可能终结。既然如此，社会对经济的调节只能听任盲目自发的价值规律去摆布，人类对那些最基本最重要的信息都不可能为着自己的利益而加以有效的运用，那末，又怎么能谈得上真正自由的“信息社会”和“信息时代”呢？

提出这种未来发展模式的西方学者们都认为，“第三次浪潮”，或者说“第四次产业革命”正以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作用于世界经济，使世界经济的面貌发生巨大的变化。“巴黎小组”的法国学者施赖贝尔写道，“向新社会的这种进军是和它的世界性分不开的；没有世界性，它所实现的进步，它所增加的能力，它所派生的活动，就将在发展过程中显得残缺不全。在新的全球方程式中，巨大的财政耗费、内部为社会团结而付出的努力和外部的互相依存是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新的全球方程式，要求‘富裕’但受到削弱的发达社会，拥有财富却仍然得不到发展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以及一切都需要创造的第三世界共同采取新的、革命的发展形式。”目标就是“信息化社会的这



种‘全球化’”^①。因为，从本质上说，信息革命是不能最终由几个发达国家孤军深入地推进，信息的交流和传播要向国际开放才是可能的。因此，首先就是使第三世界国家能够掌握这一取之不尽的唯一的资源：信息、知识、精神。信息社会正使世界经济从一场争夺狭窄的市场贸易战过渡到一个促进生产和交流的世界体制，从而建立一个真正平等互利的国际经济秩序。

托夫勒干脆认为，在第三次浪潮的冲击下民族国家正受到上下的压力，一方面跨国性的机构和“一体化”的超国家组织正把民族国家的权力向上转移，另一方面居于国家之下的区域和集团又从下面把民族国家权力的基础抽掉。因此，民族国家正在崩溃，而代之一一种新的世界体系。“看来要出现的既不是一个由公司支配的将来，也不是一个全球性政府，而是一个远为复杂的体系，它相当于我们看到在某些先进工业中兴起的矩阵组织。我们正在组织的，是把具有共同利益的不同机构组织起来的网络或矩阵组织，而不再是一个或几个金字塔形的官僚机构”^②诸如空间矩阵组织、粮食矩阵组织、能源矩阵组织等等。而在争取未来世界经济结构的“超级斗争”中，支持第三次浪潮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结构，其中有大学的首脑，用户至上主义者，环境保护主义者，女权主义者，以前的“花癩派”。他们不可能构成一个“阶级”，也不是一次阶级行动，当然也不可能把消灭阶级作为自己的口号，云云。

对于托夫勒和施赖贝尔等人的上述设想，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方面，我们知道，国家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产物，这是

^①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世界面临挑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5页。

^②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400页。



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也是每一个不带偏见的人必然得出的结论。只要存在阶级和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国家就是必不可少的。“要使国家完全消亡，就必须有完全的共产主义”。^①但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成以来，资产阶级已经把国家机器发展为更加巧妙和完备的形式。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所以资本一掌握（通过帕尔钦斯基、切尔诺夫，策烈铁里之流）这个最好的外壳，就能十分巩固十分可靠地确立自己的权力，以致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中，无论人员、无论机构、无论政党的任何更换，都不会使这个权力动摇。”^②迄今为止，无论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新发展，还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国际形式，即发达国家之间的“一体化”过程，都绝不是削弱国家机器，而是在强化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托夫勒也承认，“近期的将来，会有日益增长的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动荡。在许多国家将进行尖锐的政治斗争，不仅是谁从工业社会的残余中获取利益，而且是谁参与塑造和最后控制自己的接班人。”^③因此，在爆发一次能源革命、技术革命、世界范围的信息革命、家庭生活革命等等的同时，要想避免一场爆炸性的政治革命，甚至是流血的革命，是完全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大谈“民族国家的消亡”只能是一个虚妄的幻想。

我们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当前世界政治、经济的新形势，就可以看到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军备竞赛和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日趋激化，民族国家之间的局部战争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发展中国家为争取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政治独立而同霸权主义和国际

①《列宁选集》第3卷第252页。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181页。

③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507页。



垄断资本的斗争风起云涌。一方面科学技术的新发展使世界经济走向一个更加开放，更加国际化，更加相互依存的系统；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国家机器、贸易保护主义、民族利己主义却都在强化。在资本主义世界每个地区，社会机体的每个方面，矛盾都空前地严重。军备竞赛、能源、环境、生态、人口、原料、城市、两性和家庭、教育和伦理等方面都酝酿着爆炸性的危机。因此，仅仅依靠什么未来的“信息社会全球化”，“非群体生产”，“电子家庭”，“民族国家的衰亡”来开创未来世界经济的“矩阵结构”等等，都只能是一枕黄粱。即使在西方思想界，许多人也并不认为这是使危机重重的资本主义世界走出困境的途径。例如，被称为“再工业化之父”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米泰·埃齐奥尼就认为：“如果说，在一个急剧变化的世界上，我们要确定需要我们优先采取行动的领域的话，那么我们应该放在首位的，就是能源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使我们不得不依赖他人；还有国防问题，因为苏联扩张主义又重新抬头了。”他根本不认为科学技术的进展能够解决美国面临的问题，他对电子学、信息化不置一词。而埃齐奥尼自己开的药方则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对公私消费实行紧缩和限制，这个时期很可能延续到十年左右。”^①很明白，这是很合乎里根总统的胃口的。所谓的“里根经济学”试图冶供应学派、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于一炉，进退两难，矛盾百出，其目的无非是：维护垄断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向劳动人民开刀，同时肆意扩充军备，加紧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要执行这样一项内外政策，当然非有一个最忠诚于美国金融寡头利益，并由美国大资产阶级的合格代表们组成的政府不可。今天的里根

^①让-雅克·塞尔旺-施赖贝尔：《世界面临挑战》，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28页。



政府就是这样的一个政府。请看它的组成成员：据美国财政部报告，总统里根，拥有资产100万美元以上；国务卿舒尔茨，拥有资产180万美元；国防部长温伯格，拥有资产150万美元；财政部长里甘，拥有资产180万美元以上；商务部长鲍德里奇，拥有资产130万美元；农业部长布洛克，拥有300万美元的农业资产；运输部长多尔（女），拥有资产130万美元；专管工人阶级事务的劳工部长诺万，拥有资产140万美元，等等。因此，“再工业化之父”也不会那么欣然首肯“第三次浪潮”那种天真而有害的幻想的。现在改革旧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绝不可能仅仅通过“信息社会的全球化”，或者通过虚构的“民族国家的衰亡”来实现。它必然是一个长期、曲折、充满矛盾和斗争的历史过程。首先通过第三世界国家和全世界劳动人民的长期艰苦奋斗，建立一个比较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至于一个完全合理和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则必须以社会主义在全世界范围的胜利为前提。

以上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而且是更重要的方面则是，西方学者提出的所谓“第三次浪潮”或“第四次产业革命”，实质上是指第四次科学技术革命，它确实是在酝酿之中，而且必然要来临。随着微型电脑的推广和普及，遗传工程、光导纤维、激光应用、海洋工程和宇航工艺等等方面在本世纪八十、九十年代特别是下世纪初可能有重大突破。所谓“第四次产业革命”，即一次伟大的新的技术革命，确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这对于世界经济，特别是对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建设，既是一个严重的挑战，又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对于这个挑战，我们必须奋起应战。这种机会又稍纵即逝。它来之不易，弃之实在可惜，而且会给国家和民族带来很大的不幸。回顾过去，在世界第二次科



技革命时期，日本就能迎着挑战，来个明治维新，日本的科学和国民经济就能跟上世界潮流，很快走入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而当时我们中国，在前清王朝腐败统治下，奄奄一息；光绪和康有为、梁启超也想来个维新，却被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一棍子打了下去，结果使旧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里愈陷愈深。新中国成立后，第三次科技革命席卷全球，中国人民、首先是广大知识分子在五十年代曾勇敢地接受这个挑战，努力跟上，在科学技术的普及、提高和创新上，都作出了可喜的成绩，缩短了我国在科技水平上同发达国家的差距。我国经济建设也蒸蒸日上。但当六十年代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科学和经济蓬勃起飞之际，我们这里却来了个“文化大革命”。除了别的灾祸外，它真实地大革文化之命，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统统成了重灾区，拒绝了参与和享用世界第三次科技革命成果的大好机会，把我国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的差距可悲地拉大了。直到粉碎了“四人帮”，特别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才重新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党和政府十分强调科学技术的现代化，强调科技现代化在四个现代化中处于领先地位，及时地确立了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科学研究要面向经济建设，要为经济和国防建设服务的战略方针。鉴于过去两次惨痛的历史教训，我们应该严肃地接受所谓“第四次产业革命”即新的技术革命的挑战，迎头赶上，充分参与当前世界科技革新的高潮，大胆利用它的科技成果，再不要夜郎自大，固步自封，重蹈十年内乱的覆辙。《第三个浪潮》作者托夫勒认为，今天第三世界国家也许可以不经第二个浪潮的发展而采取全新的路线，达到第三个浪潮的文明。我们应该十分重视他的这个观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第三世界国家都应该结合本国的实际，认真学习和吸收最新科学技术的成



就，特别是微型电子计算机、生物工程、光导纤维、激光等方面，应该尽可能优先采用，加以消化推广，并与各国科技界人士进行学术交流，共同创新。就我们中国来说，要从生产技术多层次的特点出发，在经济结构上允许劳动密集、资本密集、知识技术密集三种形态并存，并迎着新科技革命的浪潮，努力使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步增加，以保证我们更快地提高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实行这一方针，我国沿海城市应该带头，中心城市尤其要发挥信息中心的作用，并积累经验，推动全国经济的增长。如果这样做了，我们党和国家确定的到二十世纪末我国工农业年总产值翻两番的战略目标就可以得到更加确切的保证，从而使我国在二十一世纪上半叶雄健地跨进世界最先进国家的行列。

第四章 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 互相作用的辩证规律

（一）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的辩证关系

经济是政治的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不仅在一国国内，而且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也是适用的。

世界政治舞台上的风云变幻，必须从世界经济中去寻找它的基本动因。同时，世界经济领域中的重大变化，或迟或早也会反映到世界政治的斗争和国际政策中去，而这种斗争和政策



又反作用于世界经济。离开这个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国际问题就会迷失方向。

资产阶级政治家和学者们，对纷繁复杂的国际斗争或者迷惑不解，如堕五里雾中，或者本末倒置，做出完全错误的判断，根本原因往往在于囿于阶级偏见，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政治与世界经济的辩证关系。在他们看来，“经济只是一种借口，或一种合理化的说法”而已，世界政治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性”、“人的权欲”、“人类权力的驱策”，或者在于某种抽象的“国家利益”。有些资产阶级学者甚至运用牛顿的“力学平衡原则”或者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来解释世界政治现象。

我们认为世界政治的根基在于世界经济，但这并不等于说前者只是后者消极和被动的“反映”。相反，以世界经济为基础而产生的世界政治，反过来又给世界经济以重大的反作用。实际上，在一些复杂的国际事务中，政治和经济往往互为因果，彼此制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特定的条件下，政治还起决定性的作用，经济服从于政治。这在战争时期表现得最为明显。例如，在第一、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的经济完全服从于军事的需要，或者受战争的严重破坏。

总之，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之间的关系，决不是简单的机械的“一元方程式”。在整个国际生活中，经济与政治的相互作用是十分复杂和多样的，即有时是直接的，有时是间接的；政治有时以当前的经济利益为背景，有时与长期经济战略相吻合；有时政治行为以预期的经济变动为出发点，有时经济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政治上的反应却出现所谓“呆滞”。凡此种种，说明了世界政治对于世界经济来说，带有一定的相对独立性。世界政治有其自己的内在规律性。它不仅和



世界经济密切联系着，而且还和世界军事、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等等相互影响着。但是，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经济是一切重大政治事件的终极原因；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一切显著变化，总会在世界经济中引起深刻反响。

（二）当代世界经济格局与世界 政治格局的关系

由于战后第三世界的崛起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创建与分裂，当前世界经济分成相互间关系错综复杂和多变的四大片，即：（1）美国等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2）苏联和其他大部分经互会国家，其中极大多数是社会主义国家；（3）中国以及朝鲜、南斯拉夫、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国家；（4）广大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这四大片的存在是一定条件下的历史现象，它们是在多种形式下和向多种方向变化着的。它们的发展情况大体如下：

第一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高速发展的所谓“黄金时期”，进入七十年代初期以后危机与滞胀交织的时期。经过了两次严重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后，从1983年年初起，美国首先从危机谷底爬出来，开始复苏，西欧、日本先后跟上。对于这次复苏的快慢、幅度，世界各国当局和学者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乐观，有的悲观。我们的看法是：八十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总的说来将处于走走停停、时起时伏、基本上低速增长的局面。国际债务问题如解决得不好，可能触发世界金融危机乃至全面的经济危机；各国庞大的预算赤字（特别是美国），可能促使通货膨胀率回升；实际的高利率难以降下来，阻碍着投资扩大；发展中国家经济困难，



债务累累也会影响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因素对于西方经济复苏的快慢和幅度都会发生影响。当然，在八十年代也不能完全排除某些西方国家高速增长的可能。这要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如微处理机、遗传工程和宇航工业的发展等等，它们可能引起新兴工业部门的更大兴起，使经济结构起较大的变化。形成经济相当高涨的局面。但八十年代科技方面这种重大突破的可能性并不很大。此外，局部战争可以促进某些西方国家军火工业和一部分重工业的发展，从而使它们获得一定程度的经济高涨。而世界大战的爆发，将会极大地改变世界经济的局势，但在八十年代，这种可能性不大。

第二片，苏联、东欧国家：它们在八十年代将在经济改革中前进，其经济可能以较前为低的速度持续增长。苏联由于致力于同美国争霸世界，着重发展武器生产，限制了它在轻工、农业方面的发展。同时这种情况又要求继续保持权力高度集中，因此，它的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将是十分有限的和缓慢的。但是它还将稳步改革，它的经济将持续发展，速度可能较前降低一些，总的说来，仍将高于西方国家。

第三片，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它们在进行经济的调整和改革。各国都有自己的优势，也各有程度不等的困难。它们都在困难和问题中寻找办法来调整和改革。它们在八十年代将会以较高的速度持续稳步地增长。它们的增长速度可能超过第一片和第二片国家。

第四片，广大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它们的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由于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存在，西方国家向它们转嫁危机和困难，当前它们的经济一般处于严重的困境。当然，其中一部分国家，例如多数石油输出国和所谓新兴工业国，仍然可能以较高速度发展；但大多数国家经济发展速度将减慢。极少



数国家（如南亚和撒哈拉以南的一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可能是负增长。

当前世界政治形势的基本格局是怎样呢？

从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整个世界在政治上形成了鼎足而立的三个世界：美苏两国是第一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其余的国家，主要是美国以外的发达和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属于第二世界。七十年代中期毛泽东同志作出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规定，科学地反映了六十年代以后世界政治的基本格局。

当前三个世界划分的世界政治格局与四大片划分的世界经济格局的关系怎样呢？

四大片经济格局的划分主要根据社会经济制度的异同，同时也依据一定的政治因素；而三个世界的划分主要根据三类国家的政治、军事地位和战略，同时也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实力。一般地讲，前者（经济格局）仍然是后者（政治格局）的基础。各类国家的政治战略基本上是以它们保卫各自的社会经济制度和经济利益为出发点。

（三）军备竞赛与世界经济

1981年全世界支出的军费总额达5,500亿美元。估计在八十年代，全世界的军费有可能达到15,000亿美元这样一个天文数字。

现在，世界上拥有8万颗核弹头，相当于一百多万颗在广岛爆炸的原子弹的力量，地球上每个人平均3.5吨梯恩梯炸药。全世界的核武器，90%以上操在美苏两国手里。从数量上讲，目前拥有的核武器火力已经足够摧毁世界数次。但是，每天还



在增产更新式、更精密、杀伤力更大的武器。军备竞赛象癌细胞一样大量吞噬着社会财富，并把人类拖向毁灭的边缘。

从根本上来说，军备竞赛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世界的一种具体表现，又是它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两个超级大国为了建立以自己为主宰的世界政治秩序，必然要建立听命于自己的世界军事秩序。在它们看来，扩军备战正是实现这一目标的物质基础。从军费的构成来看，苏美两国的军费预算占全世界军费总额的一半。它们每年的军费增长额占全世界总增长额的70%以上。他们不仅自己扩军备战，还通过制造紧张局势、挑起军事冲突和出口军火，把别的国家，特别是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拖入军备竞赛的漩涡。

军备竞赛给世界经济带来极为重大和深刻的影响。实现国民经济军事化历来是帝国主义为摆脱危机、调节经济而采取的手段；直接和间接的军需生产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最主要的产业部门。扩大武器生产可以暂时地或部分地扩大就业机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起到延缓危机的作用。用于军事目的的研究成果，可以推广到非军事的科学、技术和生产领域，并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军备竞赛的消极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首先，军备既不能当饭吃，即不能用于社会和居民的消费，也不能搞建设，即不能用于扩大再生产。它是对大量社会劳动的虚掷。它使国家相当大一部分人力和物质资源脱离民用经济领域。军工生产的开支增加，一般靠压缩满足社会迫切需要的国家开支来实现。这既损害了居民的社会福利，又夺去了大批劳动者的就业机会。此外，军工产品的实现归根到底要加重劳动人民的赋税负担。其次，能够推广到民用经济领域的军事技术及其装备只是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军事研究，民用经济发展是不需要的。这种科技研究的军事化方向，严重地影响科



学技术的正常发展与进步。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那些军费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所占比例较高的国家，积累水平和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比较低。反之，军费负担较小的国家，经济发展就比较快。在这方面，战后日本经济发展一般快于美国是个明显例子。美国沉重的军费负担是造成国际收支逆差和庞大财政赤字的一个重要因素。它使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受到损害，因而又是导致国际货币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这种货币危机曾加剧世界经济局势的动荡。

军备竞赛也拖住了苏联经济发展的后腿。据推测，如果苏联现在的军费开支持续下去，到八十年代下半期近80%的金属加工部门要为军需服务。为了增加军费，苏联1983年年初曾被迫使近百个大型民用企业的基建工程下马。可见，经济的军工化，使苏联社会再生产的基础遭到损害，经济结构畸形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难于提高。

目前，人类的四分之一正生活在极度贫困中。但与此同时，又把四分之一的研究和发展经费用于研究和制造新式杀伤武器。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这种不合理的现象每天在重演，并以扩大的规模进行下去。世界经济领域的阻滞和世界军工机制的强化，形成了恶性循环。

（四）世界经济、战争与革命

战争是私有制度的产物，是“用以解决阶级和阶级、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政治集团和政治集团之间、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矛盾的一种最高的斗争形式”。^①随着近代资本主义

^①《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155页。



世界经济的最终形成，世界政治范畴中的战争在上述一般规律的基础上，开始出现一些新的特点。

帝国主义把世界上几乎每一个角落都卷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但是，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既要垄断世界市场，又要兼并和瓜分世界。正如列宁所说：“兼并是必然从资本主义中产生的大银行统治的政治表现和政治形式”。^①因此，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在金融资本统治世界经济的整个时代，势必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战争。

十月革命开辟了人类的新纪元。无所不包的金融资本统治体系被打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金融资本在世界上的政治版图进一步缩小。随之而来的是，民族解放运动势不可挡的洪流冲垮了旧殖民主义体系。这些历史性的变化，一方面使帝国主义之间在缩小了的资本主义范围内的竞争更加激烈和紧张，增加了在资本主义世界内部爆发战争和对社会主义国家、新兴民族独立国家武装入侵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阶级力量对比不利于帝国主义的变动，又相当当地束缚了他们发动战争的手脚，限制了他们把战争强加给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民族独立国家的能力。同时，国际垄断资产阶级鉴于两次世界大战都产生了革命，产生了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教训，他们对于发动新的战争，特别是世界大战，不能不稍加小心。为了对抗社会主义国家，为了避免发展中国家脱离资本主义体系，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协调对外政策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并想方设法，采取措施，避免内部矛盾升级，对发展中国家较多地用经济压力来代替直接军事干预。这些情况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和资本

^①《列宁全集》第25卷第15页。



主义国家之间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上述两种趋势的并存，已为战后的历史所证实。

在认识战后世界政治范畴中的战争特点的上述变化时，应当充分认识和估计世界经济发展对战争的影响。战后，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传统的国际分工经历着一个变化过程。以制成品生产国与原料商品生产国的分工为主导形式的国际分工，亦即世界城市与世界农村的国际分工（它以自然资源为基础），正逐步被以工艺技术为基础的世界工业分工为主导形式的国际分工所代替。以跨国公司为主要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企业内部的有组织有计划的分工，已经扩展为世界规模。国际分工的发展使整个世界范围内各个国家、各个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更加密切了。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往来和相互投资正在他们的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中占有优先地位。跨国公司已经能够通过各种途径把发展中国家纳入自己控制的国际分工体系之中。

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经济一体化趋势的增强，以及国与国之间经济调节的频繁和具有日益重要的作用，使帝国主义国家之间有可能加强政治上的协调，减少了经济危机转化为政治危机并导致彼此间战争的可能性。同时，基于国际分工基础之上的经济联系的加强，使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可能性增强了。正如列宁所说：“有一种力量胜过任何一个跟我们敌对的政府或阶级的愿望、意志和决心，这种力量就是迫使他们走上同我们往来的道路的全世界的共同经济关系。”^①这是世界经济发展变化影响战争的一种客观趋势。

^①《列宁全集》第33卷第128页。



但是，必须指出，当代还存在着世界经济发展变化影响战争的另一种趋势。垄断金融资本绝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它对高额利润的追求，不可能改变由此而来的支配世界的趋向。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斗争仍然十分尖锐，金融战、贸易战不时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西方已经出现了美国、西欧和日本三个经济中心。新的以经济联系为主的经济中心之间的对抗正在不断强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集中了资本主义世界大部分的财政、生产、科技和劳动资源的力量。它自恃手中握有极大的经济实力，依靠母国军事和政治上的保护，漠视所在国的法律，干涉所在国的内政，阻挠那里的社会改革，破坏那里的生态平衡，俨然“国中之国”。这就势必加剧同所在国之间的矛盾，孕育着战争的危险。

本世纪初期，第二国际的机会主义首领考茨基曾经鼓吹所谓“超帝国主义政策”，宣扬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国际联合的金融资本共同剥削世界，就能够消灭战争。世界经济与政治发展变化的现实有力地驳斥了这种谰言。战争依然是资本帝国主义无法摆脱的伴侣。

现在最主要的潜在战场首先是欧洲，其次是中东。美国坚持在欧洲部署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式导弹，苏联退出限制中程核导弹谈判会议而坚持在东欧增强部署核导弹，欧洲形势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在中东，特别是黎巴嫩，由于最近美国和以色列加强战略合作，美国飞机轰炸由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驻黎巴嫩的叙利亚军队；苏联则在加紧援助叙利亚。苏美直接对抗越来越公开化和尖锐化了。如果这与旷日持久的海湾两伊（伊拉克和伊朗）战争联系起来，局势便更加严峻了。这是一方面，而且是主要的方面。另一方面，由于美国与北约其他成员国存



在着重重大经济矛盾（西欧迫切需要同苏联、东欧做生意^①），特别是由于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各国人民强大的反核运动，以及美国人民的恐惧和反对，欧洲的核导弹危机也有可能得到暂时的缓和。在中东，由于阿拉伯国家的努力和全世界人民的关注，战局也可能不致继续扩大。

现在来讲世界经济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

世界经济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将顺次经历以下三个历史时期：（1）统一的无所不包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时期；（2）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并存的过渡时期；（3）统一的无所不包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经济时期。由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世界经济意味着在全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实现共产主义大同。它本身就是一场无比深刻的世界革命。

世界革命的具体历程，正如十月革命以来的历史所表明的那样，是一个十分曲折和复杂的过程。无产阶级实现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必须经历在一个一个国家、一批一批国家中赢得革命胜利的过渡阶段。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不同国家无产阶级革命成熟的时间不同。同时，在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成为一种世界体系的条件下，无产阶级革命已不单纯是个别国家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同时是帝国主义阵线整

^①参看1983年11月27日《华盛顿邮报》德罗兹迪亚克题为《使北约破裂是为了解救它：美国导弹把里根和欧洲拆开》的文章。作者说，“美国政府高兴地看到它坚持部署导弹的态度被证明是有道理的，而欧洲盟国则认为它们的忧虑刚刚开始。普遍的心情是这些新导弹消除不了人们对安全的不安，而是将加剧紧张局势。”“由于微电子革命所引起的美国和欧洲经济越来越大的悬殊，使政治上的漂流趋势更为突出。欧洲技术方面的弱点和重工业需求呆滞，迫使各公司、政府向相对来说不发达的东欧集团国家寻求今后可靠的市场。”



个链条在其最薄弱环节破裂的结果。

无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内部条件的成熟和帝国主义最薄弱环节的暴露，同世界经济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经济危机给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资本家把危机中所遭受的损失千方百计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使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不仅如此，经济危机也使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部的矛盾尖锐化。帝国主义各国之间互相转嫁危机，争夺原料产地、销售市场和投资场所的斗争更加激化。这就使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受经济危机打击最重的国家作为薄弱环节暴露出来。此外，世界经济危机也常常成为战争的先导。

在探讨世界经济和革命的关系时，还应当清醒地看到，国际垄断资产阶级从全世界收取“贡税”。他们从攫取的垄断高额利润中拿出一部分，收买工人贵族，培植机会主义，加之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所采取的社会福利政策，腐蚀工人运动，从而延缓了革命的进程。但是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第三次技术革命的推动和新科技革命的酝酿，社会生产力以史无前例的速度和规模扩大着，它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制的基本矛盾越来越尖锐。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本国际化已经接近顶峰。过于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越来越濒临全面爆炸的边缘。

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空前高涨，旧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给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斯大林同志和毛泽东同志曾经高度评价民族解放斗争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作用，把它看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看作无产阶级社会主义世界革命的同盟军。这种估价，是十分正确的，至今仍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在，帝国主义用新殖民主义政策代替旧殖民主义政策，更多地用经济手段对取得政治独立的发展中国



家进行剥削和控制。广大发展中国家正积极投身于反对国际经济旧秩序、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伟大斗争。从目前来看，这场斗争的目标还限于建立比较公平比较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实质上是民族解放运动的继续，属于民族民主革命性质。但它同当前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全世界人民反对霸权主义、保卫世界和平的斗争汇集一起，形成当代无比强大的反帝、反霸、反殖的革命洪流，把世界推向前进。

总之，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但它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它的伟大的历史目标一定能实现。



第二篇 当代三类国家经济的 若干规律性问题

第一章 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规律的 变形与贫困化

(一) 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规律及其变形

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过程，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下的再生产过程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再生产，周期性地被经济危机所打断，形成一种特有的再生产周期重复现象。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力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发展起来，使生产的社会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日益发生矛盾。这一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必然表现为各个企业生产的组织性（没有这种组织性，资本主义的社会化生产便无从运行）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以及生产的无限扩大趋势与社会购买力的相对缩小之间的矛盾。因而，恩格斯说：“市场的扩张赶不上生产的扩张。冲突成为不可避免的了，而



且，因为它在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炸毁以前不能使矛盾得到解决，所以它就成为周期性的了。资本主义生产产生了新的恶性循环”。①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详尽地论述了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性的物质基础问题。他指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生产资料的变换加快了，它们因无形损耗而远在自己有形寿命终结之前就要不断补偿的必要性也增加了。可以认为，大工业中最有决定意义的部门的这个生命周期现在平均为十年。但是这里的问题不在于确定的数字。无论如何下面一点是很清楚的：这种由若干互相联系的周转组成的包括若干年的周期（资本被它的固定组成部分束缚在这种周期之内），为周期性的危机造成了物质基础。在周期性的危机中，营业依次通过松弛、中等活跃、急剧上升和危机这几个时期。虽然资本投下的时期是极不相同和极不一致的，但危机总是大规模新投资的起点。因此，就整个社会考察，危机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个周转周期的新的物质基础。”②

以固定资本的更新为物质基础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一般包括危机、萧条、复苏和繁荣（高涨）四个阶段。它们是互相联系和互相制约的，每一个阶段都由前一个阶段孕育出来，又为后一个阶段的到来准备条件。其中，危机是周期的基本阶段，是上一个周期的终点，又是新的周期的起点。

下面，来考察战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变化。

第一，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历史发展

从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上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曾经起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06—207页。



巨大的进步作用。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后的一个历史时期内，不但没有发生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而且还促使生产力获得空前的发展。但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逐步成熟，经济危机就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早在十八世纪下半叶，资本主义生产比较先进的英国，就已经出现频繁的经济危机。如从十八世纪八十年代末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四十年间，英国就发生过七次危机。但是，由于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还不发达，固定资本的再生产还没有成为影响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这一时期的经济危机还没有形成带规则性的和普遍性的危机。

资本主义生产的进一步发展，使机器大工业对整个社会经济具有了决定性的作用，从而使固定资本的周转成为社会再生产周期的物质基础。此后，从1825年英国出现第一次周期性经济危机开始，资本主义再生产便进入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历史阶段。

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过程中，随着国际分工在广度和深度上不断发展，以及国际贸易的扩大，逐步形成了统一的资本主义世界市场和世界经济，极大地加强了各国在流通领域和生产领域中的联系，从而使资本主义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日益成为世界性的经济危机，使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日益取得世界性的形态，即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再生产周期越来越具有同步性。事实上，从十九世纪中叶开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几乎都在同期发生，并构成了周期基本上相同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1847—1848年爆发的经济危机，是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此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周期的同期性已表现得异常明显（见下表）。



二次大战前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周期性危机开始年度

世界 各 国 危 机	英国	美国	德国	法国	俄国	日本
	1825					
	1836	1837				
1847	1847	1848	1847	1847		
1857	1857	1857	1857	1857		
1866	1866	1865	1866	1867	1866	
1873	1873	1873	1873	1873	1873	
1882	1882	1882	1883	1882	1882	
1890	1890	1893	1890	1891	1890	
1900	1900	1903	1900	1900	1900	1900
1907	1907	1907	1907	1907	1907	1907
1920	1920	1920	—	—	—	1920
1929	1929	1929	1929	1930	—	1929
1937	1937	1937	—	1937	—	—

资料来源：《世界经济》1983年第8期。

第二，战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变化

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规律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客观经济规律。但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由于具体条件的不同，再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所表现的形式便有所不同。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打断了原来形态的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周期，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出现了若干新的现象。

二次大战结束以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迄今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而每一个阶段的再生产过程都有一些不同的情况。



(1) 二次大战结束到五十年代初,是资本主义经济的恢复时期。大战结束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除美国以外,国民经济都遭到很大破坏。作为战败国的德(联邦德国)、意、日的经济需要重建,英、法等国的经济也需要恢复。美国经济也有一个由战时向平时转变的问题,但美国的经济经过短暂的调整后即以较高的速度向前发展,使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霸主。到五十年代初期,多数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已先后恢复到战前水平。在这一时期,由于各国经济恢复快慢不同,各国经济危机成熟的时间也就有所不同。美国早在1948年8月就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而英国则在1951年6月,联邦德国和法国在1952年1月,日本在1953年年底才先后发生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

(2) 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初,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获得巨大发展的时期。在这二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大多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在资本主义发展史上是罕见的。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速度,一般都在5—6%以上,有的(如日本)甚至高达16—17%。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二十多年生产的产品,超过了过去二百多年生产的产品的总和,即年平均产量约增加了10倍。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因而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这是有一定根据的。在这时期西欧各国加强了自己的经济力量,日本的经济实力更是迅速崛起,而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地位则相对地削弱。这表现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在这一时期里,资本主义生产虽然取得了空前的发展,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并没有消除。相反,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过几次程度不同的经济危机,就连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日本,其间也发生过三次经济危机。



(3) 七十年代初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进入了所谓“停滞膨胀”的时期。战后资本主义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只是昙花一现。从七十年代初起,特别是1973—1975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长期处于一种缓慢发展的停滞状态,同时一直被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失业所困扰。这种滞胀局面加剧了它们之间的争夺和矛盾。在这一时期,发生了两次严重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形成经济危机与通货膨胀相结合的并发症。它明显地表现出资本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垂死的趋势。

二次大战以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但严格地说,形成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的,从五十年代迄今主要是如下三次:

第一次是1957—1958年的经济危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经过1955—1957年的经济高涨后,随即进入1957—1958年的危机阶段。这次危机首先在美国爆发,紧接着加拿大、日本、英国、联邦德国、法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也都相继发生危机。美国在1957年3月,工业生产开始下降;到1958年4月为止,工业生产下降幅度达13.5%,其中钢铁产量下降51%,小汽车产量下降48%,失业率达7.5%,日本的工矿业生产从1957年8月开始下降,到1958年6月,下降幅度为10.7%。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矿业生产和出口贸易额,1958年比1957年分别下降3%和5%。

第二次是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这一时间都爆发了经济危机。在危机期间,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美国为13.8%,日本为14.1%,联邦德国为12.2%,英国为12%,意大利为22.3%;失业人数大幅度增加,美国增加125%,日本增加114.4%,联邦德国增加443.1%,法国增



加132.2%，英国增加73%。这次经济危机不仅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发生，而且几乎席卷了这些国家的各个经济部门。

第三次即最近的一次是1979—1982年的经济危机。这是二次大战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危机。这次危机也是从美国开始，迅速蔓延到英国、日本、联邦德国、法国、意大利和加拿大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连经济一向较为稳定的北欧五国和瑞士也无一幸免。这次危机从1979年开始，经过1980年和1981年连续两次下降，从1983年第一季度起才开始陆续回升。不仅持续时间长，而且危机的严重程度也超过战后的前两次危机，接近1929—1932年的资本主义特大危机。特别是企业破产率高，如1982年1月至12月中旬，美国已有24,000家企业破产，破产率达0.85%，为193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联邦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企业破产率也达到三十年代以来的最高峰。同时工人失业急剧增加，1982年11月份，美国失业人数为1,200万，失业率为10.8%，为近四十多年来的最高点；欧洲共同体十国的失业率也高达10.5%。

从二次大战以后的情况看，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和经济危机的表现形式发生了如下一些明显的变化：

(1) 危机的频率趋于缩短。

战前，经济危机大体上十年左右发生一次，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周期也保持着很大的同步性。战后，经济危机发生的频率增加，周期相应缩短。如一般认为，美国和加拿大已发生过七次危机，西欧和日本也发生过六次危机，大约五年左右发生一次危机。而且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周期出现很不一致的情况。除了三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外，个别国家或部分国家曾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



(2) 再生产周期各阶段的区分趋于模糊。

战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周期并不象战前那样，**明显地表现**为危机、萧条、复苏和高涨四个阶段。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一般情况是，危机阶段过去后，萧条阶段很短，**也不明显，不易**与复苏阶段相区别，因而只能把这两个阶段通看为回升阶段，构成危机、回升、高涨三个阶段的循环更替。同时在危机阶段，生产下降的程度有所减轻。如战后生产幅度下降最大的一次危机即1973—1975年的危机，工业生产下降的幅度，美国、英国、法国分别为13.8%、12%、14.1%；而战前比较严重的1920—1921年的危机，这些工业国家的工业生产分别下降32%、55%、24%，更不用说1929—1932年的大危机了。

(3) 伴随着经济危机，没有发生货币和信贷危机，但通货膨胀严重。

战前，在经济危机爆发的同时，往往爆发货币信用危机。战后，迄今的历次经济危机中，都尚未相伴发生严重的周期性的货币信用危机。而且在危机期间，同战前不同的是，物价不但没有下跌，反而大幅度上升。从美国发生的7次经济危机看，只是在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初的两次危机中，消费物价稍有下跌，而在以后各次危机中，消费物价都是上涨，并且上涨的幅度有扩大的趋势。特别是从七十年代以来，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陷入了生产发展滞缓、通货膨胀严重、物价猛烈上涨的状态。

由此可见，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形。马克思早就提出过周期变形的**问题**。马克思在修订《资本论》法文版第一卷时曾指出：“直到现在，这种周期的延续时间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绝不应该把这个数字看作是固定不变的。相反，根据我们以上阐述的资本主义生产的各个规



律，必须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数字是可变的，而且周期的时间将逐渐缩短”。^①战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变形，验证了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得出的上述预见。

第三，导致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变形的主要因素

战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变形，是由于受到多种多样因素影响的结果。其中，主要的因素如下：

1. 科学技术革命的影响。

二次大战后发生的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对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有着深刻的影响。

甲、科技革命促进了固定资本的更新和扩大。战后，在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固定资本获得大量的持续的增长，使固定资本投资波动的幅度有所减轻，如在1973—1975年的经济危机中，固定资本投资下降的幅度，美国为16.6%，日本为28%，联邦德国为18.8%，英国为21%，虽然超过战后前几次危机期间下降的幅度，但比战前历次危机期间下降的幅度小得多。固定资本投资波动小，就减轻了经济危机本身的严重程度。同时，科技革命一方面提高了机器设备在固定资本构成中所占的比重，相应地降低了不易于损耗的厂房建筑所占的比重，另一方面又加速了机器设备无形损耗的过程，这些都显著加快了固定资本更新的时间，从而导致经济危机的频繁化和再生产周期的缩短。

乙、科技革命引起产业结构的变化。由于在原子能、电子、化学和航天技术等方面的重大突破，一批新兴的工业部门迅速发展起来。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分工的深化，有些环节从生产过程中分离出来，使整个非物质生产部门特别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5页注。



是服务行业迅速扩大，吸收了大批由于物质生产部门机械化和自动化排挤出来的工人，并扩大了社会购买力。这些也起到了缓和危机和促进复苏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在新兴工业部门兴起的同时间，一些传统工业部门，如纺织、钢铁、小汽车等部门，相对衰退和萎缩，特别是建筑业的波动，常常成为触发和加重经济危机的因素。

2. 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次大战后，科技革命的兴起和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使生产的社会性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进一步尖锐化，推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以空前的广度和深度发展起来。与垄断资本紧密结合的资产阶级国家，不仅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保护者，而且作为经济活动的承担者，以“总资本家”的身分直接参与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过程，采取多种形式干预经济生活。

(1) 扩大国营垄断企业。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实行国有化和国家投资建厂扩大了国营企业，并通过“参与制”发展国家与私人合营的企业。这些企业主要是钢铁、煤炭、电力等基础工业企业，铁路、公路、港口、机场和邮电等公共事业企业，原子能、宇宙航行等现代军事工业企业，国营银行、其他各种国营金融机构，以及科学研究机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发展国营或国家私人合营企业，挽救那些濒临破产的企业，接受那些无利可图的企业，经营那些需要巨额投资的企业，同时，并为私人垄断资本提供廉价的原料、燃料、动力和运输等方面的优惠，以及提供其他有利的经营条件。而当一些国营企业变得有利可图时，又往往采取非国有化的措施，低价卖给垄断资本家。

(2) 加强国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采取了多种形式加强对国民经济的调节，如利用财政、



税收、信贷等杠杆以及实行一定程度的经济计划来影响再生产过程。如进行大规模的国家采购或订货，特别是军事订货，提供大量国家优惠贷款，发放各种名目的国家补贴，调整税收制度等等。

由于各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不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各国的具体实现形式也有所不同。如西欧各国，国营企业获得较大的发展，经济计划也运用得比较广泛，而美国则是更多地利用财政、信贷手段来干预经济活动。在日本，国家很有效地运用计划和各种经济杠杆管理国民经济。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巨大发展，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缓和危机严重程度，促进经济回升和高涨的作用。但是，从根本上说，它又加深了垄断资本主义所固有的各种矛盾，因而从较长的时期看，必然会使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长期性的生产停滞以及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使资本主义经济的腐朽性更加明显。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已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3. 国际经济联系的加强。

战后，在科技革命和生产力猛烈发展的推动下，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空前加强，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如1948—1980年间，世界贸易量增长了7.2倍，超过了世界生产的增长率；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更以惊人的速度发展，1945—1975年的三十年间，资本输出总额增长了十倍多。引人注目的是，作为现代国际垄断组织的跨国公司和多国公司广泛发展，使生产和资本的国际化水平迅速提高。特别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开始向国际领域扩展，实行由国家出面组织的经济联合，即国家之间的经济一体化（如欧洲经济共同体组织），更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再生产过程进一步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这种生产和资本的



国际化，一方面有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借助国际条件来扩大市场、发展经济、缓和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又加剧了它们之间的竞争，助长了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不稳定性，往往成为诱发经济危机的一个因素。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同发展中国家以及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经济关系，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再生产周期也有双重的作用，即既有有利的作用，也有不利的影响。例如，在同发展中国家的关系中，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对自己有利的国际贸易条件，向发展中国家推销商品，输入原料和燃料，同时通过向发展中国家输出资本，特别是通过跨国公司在发展中国家经营企业，利用当地廉价的原料和劳动力，占领当地市场，这显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用来促进本国经济发展和转嫁经济危机的重要途径；另一方面，这种不合理的国际经济关系，使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收支逆差不断增长，外债负担日益沉重（1983年底达8,000亿美元）财政经济情况越来越困难（如发展中国家每年所付外债的利息，已从1975年的87亿美元上升到1982年的600亿美元），这反过来又加重了国际经济的困难和动荡，不利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复苏。

上述各种影响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再生产周期的因素，并不是孤立地存在的，而是在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中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本身，又往往兼有两种相反的作用。正是上述这些因素所起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作用，使战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发生了明显的变形。

第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反危机措施及其后果

从1825年英国首次爆发普遍性的经济危机以来的一百多年间，资产阶级虽然千方百计地力图摆脱经济危机的困扰，但当时主要还是表现为各个资本家所采取的行动，并没有发展成为



广泛地直接利用资产阶级国家力量的形式。

1929—1932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给资本主义世界造成了重大的破坏，迫使资产阶级不得不由代表其利益的国家这个总资本家出面对经济进行直接干预，以图防止和克服经济危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了一套所谓新的货币、利息和就业理论，为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特别是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三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总统实行的新政，实际上就是凯恩斯主义的一种尝试。从三十年代开始，特别是二次大战后一段时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奉行凯恩斯主义，由国家采取一系列的反危机措施来防止和缓和经济危机，加速经济的复苏和高涨。

战后，资产阶级国家所采取的反危机措施，主要有如下两个方面：

1. 财政方面。

资产阶级国家在财政方面所采取的反危机措施包括税收和支出两项。这就是，在经济繁荣时期，国家一般增加对企业和个人的税收，同时压缩财政支出，使有效需求不致过度扩大，以遏制经济过度膨胀，防止经济危机的爆发；在经济危机时期，国家一般采取减免企业和个人税收的办法，同时增加财政支出，以刺激投资和消费，扩大有效需求，起到缓解危机、促进复苏的作用。

2. 货币金融方面。

资产阶级国家在货币金融方面所采取的反危机措施，主要包括三项：（1）通过中央银行提高或降低贴现率和再贴现率，影响金融市场的利息率水平，以引起信贷的紧缩或扩张。（2）通过中央银行调节商业银行现金准备的比例，即提高或降低这项不许动用的准备金的比例，以收缩或扩张信贷。（3）由



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证券，以增加或减少流通中的货币量，扩张或收缩信贷。国家通过这些办法来控制 and 调节金融市场，使货币信贷得到扩张或收缩，从而起到刺激或遏制投资和生产的作用，达到防止或缓和危机的目的。

资产阶级国家采取的上述反危机的政策措施，确实可以在一定时期内和一定程度上起到缓和再生产过程中的某些矛盾、减轻经济危机严重程度的作用。但这只是一种饮鸩止渴的办法，从根本上说，这些政策措施并没有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因而不仅不可能制止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发生，而且蕴藏着导致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因素。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用来克服这种危机所采取的办法，“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①。

二次大战后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的运转情况证明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英明论断。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一个较为迅速发展的时期，而且这一时期所发生的经济危机在严重程度相对地有所减轻。这表明资产阶级国家采取的反危机措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好景不长，进入七十年代以后，不仅发生了1973—1975年和1979—1982年两次严重得多的资本主义世界性经济危机，而且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陷入了具有如下特点的滞胀状态：

1. 生产发展滞缓。进入七十年代以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普遍出现下降趋势，如以七十年代同六十年代相比，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的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从5%、2.8%、5.3%、4.9%和13.7%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页。



下降为3%、0.5%、1.8%、2.9%和4.4%。从再生产周期运转的情况看，1973—1975年危机过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基本上没有出现过生产投资高潮，这与战后前几次危机过后的情况大不相同。法国、美国和联邦德国的工业生产，直到1976年下半年和1977年上半年，才先后恢复到危机前的最高点；日本和英国则一直拖到1978年上半年才勉强踏上危机前的最高点。这些国家经历的这段时间比战后任何一个周期中的相应阶段长得多。同时，越过最高点之后，不仅增长仍然缓慢，而且仅仅经过短短两年，在1979和1980年又相继陷入危机之中。

2. 失业现象严重。七十年代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问题日趋严重，不仅在危机时期失业率上升，而且危机后的复苏和高涨时期，失业率也保持在水准上。如欧洲共同市场国家的失业人数，1976年为467.4万，1977年增加到576.9万，1978年进而增加到588.9万；美国的失业人数，由1955—1956年的280万增加到1977—1978年的600万，同期失业率由4.1—4.4%上升到5.8—6.0%；英国在五十年代经济高涨的年份，失业人数为20多万，失业率为1.1—1.2%，到七十年代经济高涨的年份，失业人数达到61.9万，失业率为2.7%，1976—1978年失业人数更增至130—140多万，失业率高达5.7—6.2%。

3. 通货膨胀严重，物价猛烈上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战后以来就存在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进入七十年代以后显著加剧。六十年代，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法国和日本国的消费物价平均上涨率，分别为2.8%、3.9%、2.5%、4%和5.7%，七十年代则上升到7.8%、13.7%、5.1%、9.1%和9%。1976、1977和1978年，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物价总平均上涨率，分别达到9%、8.3%和8.5%；1979、1980和



1981年，美国、英国、法国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消费物价上涨率，连续三年都高达两位数。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当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货膨胀还不很严重的时期，出现了一种为物价上涨辩护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英国经济学家菲利普斯于五十年代末提出的所谓失业率随货币工资率上升而下降的理论。所谓菲利普斯曲线，就是这种理论的形象表述。这种理论认为，当失业率较高时，物价轻度上涨就能使失业率显著降低；当失业率较低、接近“充分就业”水平时，要再使失业率下降，物价水平就需要有较程度的提高。这实质上就是说，减少失业、繁荣经济必然伴随着物价上涨。这种理论在六十年代曾经风行一时。但是，到七十年代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不但物价连年汹涌上涨，而且失业人数急剧增加，失业率迅速提高。在这种物价和失业率同时上涨的现实面前，西方经济学家们也不得不哀叹菲利普斯曲线失灵了。

七十年代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出现严重通货膨胀的现象，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反危机措施，普遍地长期地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根据凯恩斯主义的理论，经济危机的发生是由于有效需求的不足，而为了弥补这个不足，有效的办法就是扩大政府的支出，特别是超过财政收入的支出，即实行赤字财政。因此，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中，政府开支的比重一般只占到10—14%；而到七十年代中期，这个比重在联邦德国、意大利和英国已高达45%以上，在美国也高达35%，比较低的日本也达到25%。1951—1979年的二十八年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出现财政赤字的年份，意大利为二十八年，英国为二十六年，法国和联邦德国各为二十



五年，美国和日本各为二十三年，加拿大为二十二年。为了填补巨额财政赤字，它们一方面增发纸币，一方面举借国债。这就造成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

严重的通货膨胀越来越不利于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转，引起社会上的普遍不满。这逼使资产阶级的国家不得不既要反经济危机，又要反通货膨胀。它们试图抛开凯恩斯主义，转而采取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主张。货币主义认为，造成通货膨胀的原因主要在于货币供应量的增长超过了经济的增长，因而主张严格控制货币发行以克服通货膨胀。尼克松于1969年就任美国总统后，就宣布通货膨胀是“头号敌人”，以货币主义的主张作指导，实行紧缩金融、削减政府开支以控制通货膨胀的政策，甚至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尼克松在任期内，虽然一再发誓要“打断通货膨胀的脊骨”，但始终未能见效。在尼克松之后的福特和卡特两位美国总统任期内，通货膨胀继续发展，并且与生产停滞和严重失业交织在一起。到卡特离任的1980年，美国的经济增长率几乎接近于零，失业率达8%，而通货膨胀率更高达13%。

里根接任总统以后，他推崇供应学派的主张。供应学派认为，美国当前经济上的根本问题是税率太高，压抑甚至削减了企业投资和私人储蓄，阻碍了经济活动，因而主张降低税率。里根把供应学派和货币主义的主张捏合在一起，提出了他的所谓“经济复兴计划”；一方面要大幅度减税，大量削减政府开支；另一方面，要提高利率，紧缩金融。他宣称通过这个计划的实施，可以使美国摆脱经济滞胀的困境，实现“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有人吹嘘这个计划为“里根经济学”，认为简直是一付灵丹妙药。但里根复兴计划执行的头两年，不仅没有实现经济增长和充分就业，反而使全国陷入新的



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而为了适应同苏联争霸世界的需要，又大量增加军费开支，使财政赤字节节上升。美国联邦政府1982财政年度的赤字高达1,107亿美元，突破历史最高纪录，使里根许下的他当总统后将消灭赤字的诺言完全落空。在这种情况下，里根不得不违反初衷，于1982年8月说服国会通过在今后三年增税730亿美元的法案，这标志着里根已从供应学派向后倒退了一大步，重新部分地采用了一些凯恩斯主义的政策。

英国撒切尔夫人的保守党政府，自1979年5月执政以来，推行了一套货币主义的政策。但在生产停滞不前、失业急剧增加的情况下，撒切尔夫人政府也不得不调整其经济政策，放松对货币供应量的控制。

与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不同，密特朗的法国社会党政府自1981年5月执政后，名义上推行所谓“自治管理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推行了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加强国家干预，扩大政府开支，以期通过刺激消费来重振经济。但仅仅执行一年多的时间，就由于失业人数增加、国际收支恶化、通货连续膨胀而不得不改弦易辙，决定从膨胀政策转向紧缩政策，主张控制财政赤字，紧缩预算开支，实际上是向货币主义靠拢了一步。

由此可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政策几乎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凯恩斯主义所发挥的效用已成强弩之末，而且还引起一系列新的矛盾。实行货币主义和供应学派的主张，目前虽然起到一些作用，使这两年来来的通货膨胀率有比较明显的下降（如美国的通货膨胀率已由1980年的13.5%降至1981年的10.4%，又降至1982年的3.9%），美国经济经历1979—1982年的危机后已开始了周期性的复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也在陆续回升，但是，这种反通货膨胀的紧缩政策，只能



是一种顾此失彼的政策，不仅通货膨胀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解决，而且许多问题接踵而来，如失业现象仍然严重存在，财政赤字越来越大，通货膨胀也有卷土重来的可能。现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问题的处理，实际上已经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要刺激经济，采取扩张政策，就会导致通货膨胀加剧；如要控制通货膨胀，实行紧缩政策，则又将导致生产萎缩、经济停滞，直至可能触发新的危机。即使作为治标之术，资产阶级也难于找到一个比较长期有效的药方了。对现代资产阶级来说，“防止危机的手段”不仅“愈来愈少”，简直可以说是完全没有了。这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固有矛盾加深的反映。植根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基础之上的资本主义再生产周期规律，绝不会由于资产阶级及其国家所实行的任何政策而丧失其作用，它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的被炸毁而消失。

（二）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 无产阶级贫困化

第一，无产阶级贫困化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普遍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周密地考察和研究了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揭示了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下，随着资本的积累、无产阶级贫困增长的规律。资本主义雇佣制度使广大劳动者沦于无产者即雇佣奴隶的社会地位，从而决定了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处于生活贫困和苦难的状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不但使无产者陷入并经常处于不同形式的贫困状态，而且随着资本主义积累的发展，无产阶级的苦难与贫困也在不同形式上不断增长。

马克思用“贫困化”一词概括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



的贫困状况和贫困增长。他说：“政治经济学只是说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或者也可以说，雇佣劳动，即从本身中异化出来的劳动的本质，这种劳动创造的财富作为别人的财富和它相对立，它自己的生产力作为它的产品的生产力和它相对立，它的致富过程作为自身的贫困化过程和它相对立，它的社会力量作为支配它的社会力量 and 它相对立。……使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在理论上作了这种毫不留情的表述的那同一种现实的发展，又发展了现实本身所包含的实际矛盾，特别是发展了英国日益增长的‘国民’财富和日益增长的工人贫困之间的对立”。^①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的积累规律对工人的命运产生最重要的影响。在资本主义积累过程中，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反过来成为加强对工人进行剥削的手段。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与扩大，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部分在资本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减少，而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部分在资本总量中的比重不断增加。这种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的趋势，造成了越来越大的排挤工人就业的客观力量。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在生产资料与劳动力相分离的条件下“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不断再生产着资本主义的相对过剩人口，并使之成为无产阶级贫困化的决定性因素。马克思曾经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资本财富在资产阶级一极积累，而在另一极则是无产阶级的苦难和贫困的积累。而由于失业工人形成的“产业后备军的相对量和财富的力量一同增长”，工人阶级的贫困随之增长，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Ⅲ〕第284—2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708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各个物质生产部门的资本有机构成继续不断地提高。值得注意的是，资本有机构成这个范畴的意义在于揭示资本构成对活劳动的直接关系，它是由资本物质要素中的物化劳动（生产资料）和活劳动（劳动力）的比率决定的，这一比率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的物质构成或技术构成。资本的有机构成是由资本的技术构成决定并反映技术构成的资本价值构成。战后由于工资成本的提高，原材料价格的降低，资本的价值构成与技术构成有较大的偏离，所以技术构成更直接明了地显示出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产生的排挤工人力量的极大加强。据计算，从1948—1973年，美国制造业的资本价值构成提高了27.3%，技术构成提高了72.7%^①。这种由资本技术构成和价值构成的提高而造成对劳动力需求的大量缩减，在采矿业和农业部门中尤为明显。在这些部门固定资本投放量大幅度地增加，劳动生产率也大幅度地提高，而就业人数却绝对地减少。美国从1950—1973年，煤炭产量增加了一倍多，而煤矿工人却从48万人减少到13万人，即减少了73%；在五十年代农业劳动力平均每年有617万人，而到1978年只有340万人，减少了45%。

六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更多的有较高文化科学技术水平的熟练劳动力，形成了相当严重的结构性失业的现象，其中青少年的失业率特别高。1983年6月，美国经济已经从危机中回升数月，失业率已有所下降，但仍高达10%，其中成年人失业率为9%，而16—19岁的青少年的失业率达23.6%，黑人青少年的失业率更高达56.6%。近年来，西方各国使用自动化新技术，设计、制造和使用越来越多的“机器

^①详细计算参见高峰：《马克思的资本有机构成理论与现实》，《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